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

碩士學位論文

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

——以韓國基督教傳教士為例

(Xi Jinping's Religious Policy – The case of
Korean Christian Missionaries)

指導教授：王 韻 博士

研究生：白禧尹 撰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七月

摘要

本研究透過韓國基督教傳教士的事例，探討習近平的宗教政策對韓國傳教士產生的影響如何。中國共產黨自建國以來，對宗教一直堅持統一戰線戰略的觀點，並實行着這一政策。但是習近平執政後出現的宗教政策，比之前中國領導人實行的政策更加細緻和強化，特別是習近平對基督教的管理也比任何時候都更為加強。因為基督教是近代從外國傳入的宗教，外國傳教士對本土教會的影響特別凸出，因此，通過新的外國人管理法律、以及透過修改宗教事務條例、合併統戰部下屬機關、強化宗教中國化等措施來實現強化管理。透過被分類為外來宗教的基督教實行的政策，可以更加明確地觀察到。因此，筆者想透過習近平時期，韓國傳教士被驅逐的原因是什麼來分析習近平宗教政策的特徵與策略。

在中國國內居住着許多韓國人，其中有不少傳教士。然而，習近平執政後，被驅逐出中國的韓國傳教士數量迅速增加。本論文透過中國內政因素、中韓關係因素、以及韓國傳教士內部因素三個假設，分析習執政後為何出現驅逐韓國傳教士的現象。本論文透過各假設的文獻介紹其背景，並分析實際在習近平時期是如何適用的。特別是本論文以在中國直接傳教後出國的韓國傳教士為對象進行採訪，以採訪內容為基礎，分析和研究習近平的宗教政策如何運用在實務上。

根據訪談內容，韓國傳教士被驅逐的最大原因是中國內部因素。尤其是習近平執政後，關於宗教政策改變成更細緻化、更具體化的法律，對宗教管理加強黨的領導力。認為基督教是外部勢力干涉中國的渠道，因此開始更加嚴格的管理。由此可見，習近平追求中國社會封閉性的意圖，造成驅逐外國傳教士的決定，尤其，對驅逐人數最多，且地區較近的這些韓國傳教士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關鍵字： 習近平時代，中國宗教政策，中國基督教，韓國傳教士

Abstract

This study studied how Xi Jinping's religious policy affected Korean missionarie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untry,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as maintained the perspective of unified front strategy on religion and has implemented the policy accordingly. However, the religious policies after Xi Jinping's reign were relatively more elaborated and intensified than those implemented by previous Chinese leaders. In particular, Xi Jinping's pressure on Christianity has also become more intensified than ever. This is because Christianity is seen as a religion introduced from abroad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foreign missionaries remain important to local churches. As a result, missionary management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through introducing new laws on foreigners, revising the religious affairs regulations, promoting the policy of religious Sinicism, and reconstructing the United Front Work Department. In response to this phenomenon, I would like to understand it through analyzing the causes of the deportation of Korean missionaries during Xi Jinping period.

Although many Koreans live in China and many of them are missionaries, the number of Kore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has soared since Xi Jinping took power. This paper analyzes through three propositions: the internal political changes in China, the changes in Korea-China Relations, and, problems within missionaries. This thesis introduced the background through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behind each propositions and analyzed how each factor could actually affect Korean missionaries during Xi Jinping period. In particular, the author interviewed Korean missionaries who left China after personally missioned in China, and based on the interview, the author examined how President Xi's religious policies were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According to the interviews, the biggest reason for the expulsion of Korean missionaries was from internal factors in China. Especially after Xi Jinping came to power, the religious policy was becoming more detailed and producing more elaborated regulations, which strengthened the party's leadership on religious affairs management. For believing Christianity was a channel for external forces to intervene China, Xi has begun to managed it more strictly. It can be seen that Xi Jinping's intention to pursue a closed society accounts for the decision of expelling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it has had a decisive impact on the expulsion of Korean missionaries who presented the largest number and from

the closest reg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era, Chines religion policy, Chinese Christianity, Korean Missionaries



目錄

| | |
|------------------------------|-----------|
| 第一章．前言 | 1 |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背景 | 4 |
| 第二節．研究問題 | 6 |
| 第三節．研究貢獻與目的 | 8 |
| 第四節．章節安排說明 | 9 |
| | |
| 第二章．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 10 |
| 第一節．研究假設 | 10 |
| 第二節．文獻分析法 | 14 |
| 第三節．深度訪談法 | 15 |
| 第四節．研究範圍與限制 | 16 |
| | |
| 第三章．歷史文獻回顧 | 17 |
| 第一節．韓國派遣至中國傳教的歷史 | 17 |
| 第二節．韓國的傳教政策與方法 | 19 |
| 第三節．中國內部因素 | 21 |
| 第四節．國際關係因素 | 24 |
| | |
| 第四章．韓國與韓國教會內部因素 | 27 |
| 第一節．韓國基督教的歷史 | 27 |

| | |
|-----------------------------------|------------|
| 第二節·韓國的海外傳教歷史..... | 34 |
| 第三節·韓國教會的傳教方法與政策..... | 42 |
| 第五章·中國的基督教..... | 48 |
| 第一節·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運動歷史..... | 48 |
| 第二節·中國的宗教政策..... | 55 |
| 第六章·習近平執政後出現對基督教的態度變化..... | 69 |
| 第一節·中韓關係與國際情勢變化的影響..... | 69 |
| 一. 薩德部署事件..... | 70 |
| 二. 南北韓關係與中韓關係..... | 73 |
| 三. 韓國總統彈劾事件..... | 76 |
| 第二節·法律體制上變化的影響..... | 78 |
| 一. 新宗教事務條例..... | 81 |
| 二. 宗教中國化..... | 85 |
| 第三節·小結..... | 90 |
| 第七章·結論..... | 91 |
| 參考文獻..... | 94 |
| 附件一. 訪談提問..... | 112 |

表次

| | |
|--|----|
| 表 4-1 1979 年首次統計與 2006 年韓國教會傳教士派遣數、以及派遣國現狀比較圖表 | 37 |
| 表 4-2 上位教派傳教部的傳教士派遣現狀 | 39 |
| 表 4-3 各區域活動傳教士人數 | 39 |
| 表 4-4 傳教士主要活動 | 44 |
| 表 5-1 中國宗教政策 | 68 |
| 圖 4-1 傳教士人數變化 | 38 |
| 圖 4-2 各區域別活動趨勢 | 40 |

第一章 前言

當今數個社會主義國家中，中國是以馬克思—列寧的共產主義思想為基礎，1949年建國後，經過文化大革命，正式成為無神論的國家，但仍以統一戰線的名義控制宗教組織但對宗教信仰維持一定的容忍。¹ 文化大革命初期，「破四舊運動」最先攻擊宗教。不僅基督教，道教與佛教的聖像、書籍、文化遺產也被燒毀或倒塌。另外，當時掌握政權的四人幫和林彪等領導人強調領導人的個人崇拜，因此不承認其他意識形態或精神權威的存在；更否定了共產黨的統一戰線與民族、宗教事業，使宗教工作陷入癱瘓。² 在習近平時代中，左的風潮似乎又回來了；習近平主席曾對共產黨員說：「要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³

從美國的觀點，可以發現外國對中國宗教自由的想法。透過美國國際宗教自由委員會的年度報告(U.S. Commission of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Freedom, USCIRF) 可以再次確認。美國國務院於1999年首次將中國指定為「特別關注國家」(CPC, Country of Particular Concern)，並持續到2021年。⁴ 該報告書解釋說，中國憲法上賦予宗教和信仰自由，允許正常的宗教活動，但並沒有定義正常的宗教活動是什麼。另外，中國政府除了管制宗教、限制信徒的自由，除了在政府登記的五個宗教團體之外，其他宗教團體對登記與活動有限制，所以美國做出了該決定。中共也對新疆的穆斯林實行驅逐出境、禁止宗教活動等，對基督教強制要求撤除教會或十字架，以及在教會設置監視器。⁵ 對此，

¹ Wielander, G. (2013). *Christian values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1

² 羅偉虹. (2014). 中國基督教(新教)史 / 羅偉虹主編 (第1版 ed.). 上海人民. 751-752

³ Charlie Campbell, (2016/4/25).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Reminds Party Members to Be 'Unyielding Marxist Atheists'. 《Time》 <https://time.com/4306179/china-religion-freedom-xi-jinping-muslim-christian-xinjiang-buddhist-tibet/>

; Certainly, Xi thought it was necessary to emphasize in his weekend speech that CCP cadres must act as “unyielding Marxist atheists ... and bear in mind the party’s tenets.”

⁴ USCIRF 2022 Annual Report. <https://www.uscifr.gov/news-room/releases-statements/uscifr-releases-2022-annual-report-recommendations-us-policy>

⁵ 진병태 (2018/5/30). 美, 중국을 ‘종교자유 특별 우려국 또 지정...’ 교회에 CCTV 강제. 《연합뉴스》

Jin bycong tae. (2018/5/30). 美國，‘再次將中國指定為“宗教自由特別擔憂國...’ 教會強制要求監控錄像.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80530109_800009.

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德森(Sophie Richardson)博士表示：「中國的宗教信仰受憲法保護，但該措施不保障實踐或禮拜的權利」，憲法上的「正常」可以被廣泛解釋。⁶

中國這種有限度「宗教自由」的政策，從鄧小平時期持續到胡錦濤時期。⁷ 但是，習近平上臺後，政府對宗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對外國傳教士的態度變化與中國的近代史也有關係。首先，外國傳教士從明朝、清朝末年開始住在中國，傳教士是中國現代化歷程中重要的一部份，也是各政黨爭取外國政府支持時籠絡的對象，但是隨著中共建政之後的政治改造運動，外國傳教士已經完全被驅逐出中國。1980年代開始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宗教管理原則是，由於地方經濟發展需要，地方管理選擇默認宗教活動。該情況表明，中國默認了外國傳教士以商人、學生或英語教師的身份住在中國，或者中國的宗教團體得到國外團體的經濟幫助，這種情況繼續到胡錦濤時期。該時期若在某一個地方被公安抓住外國傳教士，很少受到嚴厲處分，多半也可以到另一個地區繼續傳教活動。⁸

外國傳教士的管理是宗教自由有關的重要議題。宗教自由是指個人可以選擇與實踐自己希望相信的宗教，包括擁有宗教的自由與不擁有宗教的自由。具體而言，有信仰的自由、宗教活動的自由、宗教集會結社的自由、傳教的自由及宗教教育的自由。⁹ 中共認為，由於宗教信仰屬於思想領域，可以比較自由，但是宗教活動是人類的一種組織行為，中共認為一種行為需要法律規範下的管理，所以宗教活動也要符合法律的管理以及需要對活動自由的規範。¹⁰ 另外關於傳教活動，傳教是個人的行為，因此屬

⁶ Eleanor Albert & Lindsay Maizland. (2020), Religion in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religion-china>

⁷ 최진호. (2019). 선교사 입국 거절 상황과 대응. 선교와 신학 47. 83
[Choi Jin Ho. (2019). Missionary Entry Refusal Situation and Response: Focusing on the Korean Church. Mission and Theology 47. 83]

⁸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⁹ 信仰的自由是，某人決定事情的時，使用自己的信仰或良心來決斷的自由。具體而看，「信仰選擇」、「信仰變更」、「信仰告白」、「信仰不表達」、「無信仰的自由」。宗教活動的自由是，禱告或禮拜等表現為外部行為的宗教儀式自由。宗教集會與結社的自由是，形成以宗教為目的的集會及結社或脫離這種集會或結社的自由。傳教自由是傳教自己的宗教、聚集信徒的自由。宗教教育的自由是在學校進行宗教教育的自由。

¹⁰ 馬 嶺. (2009). 宗教自由內涵探析. 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 24(2), 1

於個人的自由；但是如果傳教的對象是宗教組織外部人士，根據宗教行為的社會性特點，必要有適當法律的介入。¹¹ 由此可見，在中國，外國傳教士的傳教行為被視為是要被管制的宗教自由的一部份。

僅從宗教自由的一部分——傳教的自由領域而言，中國所說的宗教自由，與民主國家主張的宗教自由存在差異。關鍵的差異是中國警惕國內的宗教事務與組織，不能受到國外的支配與干涉。因此對外國傳教士的規定是更加嚴格。其中一個就是改變對待外國傳教士的辦法，2012年6月30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會議中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法》，與2013年7月3日國務院15次常務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出入境管理條例》等，出現了對外國人的限制。¹² 除此之外，2020年11月發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實施細則(修訂徵求意見稿)》也表明，習近平對外國人的宗教活動更加關注。外界認為這個規定特別針對基督教，可以解釋為開始對外國傳教士加強正式的管理。

2003年，由韓國傳教界的聯合機關共同參與的中韓基督教交流會議，在上海首次舉行。開始每年輪流在韓國和中國各舉行一次，兩國交流神學方面，討論共同成長與基督教教育方案、異端對策等的問題。2009年，韓國信教與中國政府歷史上首次就「神學教育與神學生交流問題」達成協議，這是同年7月在上海和北京舉行的韓中基督教論壇上所得出的結果。當時，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表示，在中國基督教是五大宗教中，信徒人數激增最多的宗教，但牧師人數與信徒人數相比相對不足。對於中國的正式要求，韓國基督教界表示同意，決定接受提案。¹³

以這種交流為基礎，2011年7月，韓國舉行「韓中國際交流財團」(Korea China Foundation, KCF)成立儀式。由韓國世界傳教協議會(The Korea World Mission Association, KWMA)主導的，以中韓基督教交流會為基礎的中韓國際交流財團，透過2003年開始以及中國教會之間的相互合作與信賴關係，成為兩國教會的正式交流窗口。不僅

¹¹ 同註10，9

¹² 同註7，79

¹³ 백성호. (2009/7/9). 한국과 중국, 신학생 교류 시작한다. 《중앙일보》
[Bae Seong-ho. (2009/7/9). 韓國與中國開始神學生交流. 《中央日報》] <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3679856#home>

是韓國教會的牧師，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副局長蔣堅永與中國基督教協會總務闕保平也參與此次活動。從這些過程可以發現，中國教會與韓國教會之間經常有交流。2000年開始的中國與韓國神學、宗教交流一直持續到2016年，但因兩國關係問題而中斷，2019年再次正式開始聚會。¹⁴

在2011年舉辦的「中韓基督教論壇」上，中國方面的社會科學院學者與教授們，強調宗教和政府政策的協調，認為這種政策需要外國傳教士的協助。宗教事務局副局長特別表示擔憂說：「韓國傳教士的數量比以前增加了兩倍以上，但是他們的傳教熱情太高，在中國有些過分。」以此為依據，可以看出韓國傳教士的成長和發展，對中國教會和社會產生了影響力。

韓國教會不同意中國三自教會的神學教義，因此韓國教會與中國家庭教會的合作比較多，前述中韓基督教交流會代表的「官方」交流只是很表面的交流工作。同時，在語言和環境相似的東北地區，也建立許多家庭教會，幫助脫北者等，對地區安保和北韓的外交關係也產生影響。這些原因也成為中國政府對韓國傳教士更加關心的契機。與此同時，習近平的執政開始後，出現與以往領導人不同的變化，該變化讓我們看到中國對外國宗教的態度與行動模式的變化，以及中國社會如何治理。因此筆者希望透過採訪韓國傳教士，來研究分析習近平的宗教態度與社會治理。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背景

因為個人國籍以及信仰的因素，得以接觸到許多韓國宣教士，並聆聽他們的故事。在韓國，不僅是教會或傳教團體，透過韓國的媒體亦能了解韓國教會傳教的消息。特別是，韓國雖然地理位置上與中國接近，但由於政治體制和理念相異，對基督教傳教的情況有很多不公開的考量。雖然筆者沒有直接參與中國傳教的經驗，但由於個人背景的因素，可以獲得比較多的消息。而絕大部分消息來源表示，在中國傳教不能公開、

¹⁴ 김용두. (2019/11/17). 2019 한중기독교교류회 열려. 《순복음가족신문》

[Kim Yongdoo. (2019/11/17). 韓中基督教交流會召開. 《The Full Gospel Family Newspaper》]

<http://www2.fgnews.co.kr/html/2019/1117/19111712222018170000.htm>

要小心、如果被公安發現，就可能會被驅逐出境。

在就讀碩士之前，還不了解傳教不自由所代表的意義，讀到這些資訊時筆者只覺得這只是有關少數人的權益，但是透過關於中國社會變化和人權的課程，瞭解到在中國傳教具有國際政治和比較政治上的意義，尤其對中國的社會變化具有指標性的重大意義。中國宗教上的不自由和對外國傳教士的制約，反應的是最高領導人社會治理整體思路的改變，對於我們更理解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和社會治理方式具有相當大的意義。

筆者在臺灣也繼續參加教會，比在韓國更頻繁地聽到中國傳教相關內容的機會。在聆聽從臺灣教會人士去中國大陸傳教的經驗後，我想要知道中國對基督教持何種態度？以及如何對待傳教士？帶着這些疑問，透過學校課程、尋找相關的資料、以及更深入的訪談，獲得比以前更具體的知識。

第一、最先知道的是中國的宗教管理部門與法律體制，韓國也有由國家管理宗教的部門，該部門在文化體育觀光部下設宗務室(종무실, Religious Affairs Office)。該部門只總管宗教行政業務，但大部分是以各宗教內部制定的法律或規則來執行。對於生活在民主國家，理所當然地接受宗教自由的筆者而言，對國家系統管理宗教產生了興趣。另外，筆者首次知道中國政府對基督教的想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三十六條中明確規定宗教自由¹⁵，國家承認五大宗教的宗教信仰，但對各個宗教的宗教活動沒有保障。

第二，中國確實有一種「國家的宗教觀」。中國隨着時代的發展，國家對待宗教的態度有所改變，但基本框架未脫離馬克思的宗教觀。在中國國內近30年提出的宗教理論，包括宗教鴉片論、宗教消滅論、宗教文化論、宗教適應論、宗教和解論等，但這些宗教理論，都要以支持黨與政府制定的宗教管理政策為前提。¹⁶ 中國政府特別要求基督教、天主教、伊斯蘭教等從外部傳入的宗教，比佛教與道教，須達到更嚴格的

¹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 三十六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不得強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視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國家保護正常的宗教活動。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進行破壞社會秩序、損害公民身體健康、妨礙國家教育制度的活動。宗教團體和宗教事務不受外國勢力的支配。

¹⁶ 張 踐. (2017). 中國政教關係的結果與特點.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 97

標準。每一個宗教都強調愛國主義，要求比其他宗教更尊重共產黨的規則。中國政府把西方宗教視為帝國主義的工具，為了不受西方勢力思想與制度的影響，更排斥西方的基督教。

這種思想在改革開放之後仍然存在，甚至呈現在對外國傳教士的態度上。其中，中國對西方傳教士與韓國傳教士的態度出現了不同。筆者採訪的傳教士中，大多數受訪者表示，中國政府對美國傳教士與韓國傳教士的態度有些不同。因為與美國相比，韓國是不需要中國費神的國家。但是，隨著居住在中國的韓國傳教士數量增加，中國政府對待韓國傳教士的態度也開始出現改變。

另外，美國與韓國傳教士在中國做的事情也不同。例如，美國的傳教士多以非政府組織、學校或醫院等公益慈善活動為手段，透過政府能夠容忍的公開方法進行傳教。但是，由於韓國傳教士想要建立教會或直接向一般中國人民進行傳教，因此多數為秘密進行，所以在中國政府的立場上，這種方式直接觸及前述宗教活動的紅線，因此韓國傳教士成為更需要管理的對象。

從中國對待韓國與美國傳教士的態度可以看出，中國的宗教政策第一層的考量是由國際因素引起的，第二層才是實際的手段問題。因此，在習近平執政之前，中國和韓國經濟合作等因素，可以成為中國政府容忍韓國傳教士的理由。但這一點在習近平執政後出現了變化，突然大量的韓國傳教士遭受驅逐，並持續發生。¹⁷ 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對待韓國與韓國傳教士的態度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考量的是國際與國內因素的雙重原因。在此背景下，筆者想更詳細地研究，習近平執政後，如何改變對宗教的態度，以及韓國傳教士如何反應。

第二節 研究問題

在中國，基督教被歸類為西方的宗教，它與共產黨無神論的思想相反，所以受到共產黨更多的管理和監督。¹⁸ 習近平上台以後，中國內部和外部都發生許多變化。其

¹⁷ 同註7, 91

¹⁸ 有神論：基督教的有神論意味著，正如在聖經中所述，三位人格的上帝存在，創造宇宙與人類，上帝

中對於國家如何管理社會，習近平時期表現出與以前不同的樣態。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宗教方面也出現比過去更嚴格的管理和規範。五大宗教中的基督教可以解釋為，由於有可能發生外部勢力的介入，所以管理監督更加全面。特別是韓國傳教士長期居住在中國，專注於傳教，因此更加成爲目標。習近平執政後，被強制或半強制驅離的韓國傳教士人數逐漸增加。筆者想了解哪一些因素導致了韓國傳教士被大量地驅逐？

習近平執政之後，中韓關係更加友好，特別反映在2014年習近平訪問韓國、2015年朴槿惠訪問中國，以及兩國持續增強在經濟和人才交流上的合作。但是從宗教角度而言，中國強化在國內外來宗教的監視與管理，同時對於韓國基督教徒的態度，也比上屆政府更加敵視。該現象背後的原因是什麼？韓國傳教士怎麼看待這樣的現象？在中國被驅逐的韓國傳教士中，一部分人來到臺灣，等待再次回到中國的機會。

從這一點來看，筆者更想了解韓國傳教士為了前往中國傳教，如何看待台灣的教會。因爲筆者採訪對象是從中國傳教後來到臺灣的，所以想更進一步了解他們對於臺灣教會的期待是什麼？他們所屬的臺灣教會應該對中國傳教起到什麼樣的作用？以及他們自己想爲這些事情發揮什麼樣的作用？

觀察韓中關係的現有文獻，多僅從國際關係的角度切入，但這成爲了局限。因爲如前述所言，2013年後中韓國元首訪問對方國家，共同宣佈兩國建立親密夥伴關係，期待增加經濟交流、文化交流與人才交流。雖然2016年韓國部署薩德事件給兩國關係帶來了負面影響，但從整體韓國與中國關係而言，部署薩德事件只是單獨的事件，因此僅以兩國關係分析驅逐居住在中國的韓國傳教士是不夠的。因此筆者希望擴充觀察面向，不只是從國際關係理論，本研究共呈現三個研究假設。第一個假設是中國內部因素，第二個假設是中韓國的國際關係因素，第三個假設是韓國內部的因素。

向人類表現自己，人類可以認識上帝。

無神論：基本上，無神論在自然主義中發展，主張因為只物質存在永恆，所以沒有神。即是，否定所有神性的存在、靈性的存在、超自然的存在、超越性的存在。一般在共產國家主張的無神論又稱國家無神論，意味著從國家層面追求無神論。

第三節 研究貢獻與目的

這項研究將作出以下貢獻。第一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有助於華語圈對韓國傳教士和韓國基督教的研究。韓國是在中國大陸派遣傳教士最多的國家。截至2020年12月底為止，韓國教會在68個國家總共派遣2萬2,259名傳教士。¹⁹ 前10大輸入國依次為以包含東北亞(3,242人)、美國(1,657人)、菲律賓(1,333人)以及泰國(951人)和其他東南亞幾個國家。²⁰ 在韓國學界由於基督教是少數領域，或出於安全考慮，對傳教士或傳教研究不足。在韓國，少量的傳教士研究出版都是在神學和傳教學的領域，但在臺灣等華語圈，對韓國基督教的研究卻極少。因此，本研究可以為因語言局限而無法接觸到韓語文獻的研究者，提供有關韓國基督教與韓國傳教士的資訊。

第二，本研究可以為宗教自由相關研究提供新的觀點。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韓國傳教士，突顯出中國的傳教自由無法實現。自由是人類同等的權利，宗教自由也屬於人權範圍。特別是宗教自由也包括傳教的自由。但是在中國，除了在國家登記的場所之外，禁止進行宗教活動，又禁止外國人進行傳教活動。基督教傳教士原則上，持有與中共相異的價值觀。共產黨追求馬克思的無神論，但基督教徒的信仰與其相背。另外，基督教的特性上形成定期聚會，由此產生社會影響力，這為中共維持穩定的社會主義體系帶來變數。因此，中國政府為事先預防此類事件，儘管如此，前往亞洲地區含中國的韓國傳教士佔全體傳教士的61.4%。²¹ 由於安全上的問題，筆者並無法知道派遣至中國的韓國傳教士的具體人數，但筆者透過直接訪談其中幾個人，還是能分析出中國境內是如何實踐宗教自由，其中具有實際意義，可以提出傳教自由以及外國人宗教活動是如何進行的。

第三是，本研究能幫助外界更深入瞭解中國的宗教政策。不僅2017年舉辦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提出的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等宗教政策，還透過習近平的宗教講話，可以知道目前共產黨宗教政策的方向。以此為基礎，本研究以習近平上台時期為

¹⁹ 2020年 韓國傳教現況報告，KWMA(The Korea World Missions Association). 1

²⁰ 이지희. (2021/2/27). 2020년 한국교회 선교사 168개국 2만 2,259명. 《기독일보》
<https://www.christiandaily.co.kr/news/100940>

[Lee Ji-hee (2021/2/27) , 2020年 韓國教會傳教士 168各國 2萬2,259名. 《基督日報》]

²¹ 同註20

重點，分析這些中共的宗教政策對韓國傳教士產生哪些影響。這對於知道習近平的宗教政策實質上如何適用，以及傳教士採取哪些行動回應，筆者相信能帶來啟發。

最後，可以為跨國家主題研究作出貢獻。筆者雖然國籍是韓國，但對中國宗教進行研究，研究的具體對象是來往於中國和韓國兩方的韓國傳教士。根據韓國傳教士，不僅可以瞭解韓國的內部立場，還可以聽取並分析中國社會的實際經驗，提出與以前不同的觀點。雖然來往於中國和韓國之間的各種跨國行為者實際存在，但對他們的研究卻相對不足。因此，筆者認為，透過個人背景可以接觸傳教士，分析他們的經驗，透過在中國進行的宗教活動，對習近平的宗教政策和與社會治理，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對象具有重要意義。

第四節 章節安排說明

本論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一章作為序論，提出筆者對本研究的動機、背景、研究問題、研究貢獻與目的，第二章介紹研究結構和方法。第三章分為四個主題，討論現有文獻。即是，韓國教會的中國宣教的歷史、韓國傳教方法與政策、中國內部因素以及國際關係因素。第四章討論韓國與韓國教會的內部因素，說明韓國基督教的歷史、韓國的海外傳教歷史、韓國教會的傳教方法與政策。第五章討論中國基督教的部分，介紹中國基督教本土化運動的源流以及歷代中共領導人的宗教政策。第六章介紹習近平執政後對基督教的態度變化。首先，敘述引起中韓關係變化的三個領域對韓國傳教士產生何種影響，其次，透過訪談韓國傳教士的資料，分析習近平執政後出現的宗教政策法律上變化、對韓國傳教產生的影響如何。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結論，總結習近平執政後加強驅逐韓國傳教士的主要原因，研究限制、並敘述今後的研究方向。

第二章 研究架構與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假設

關於為何韓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筆者的假設可分為三個。第一是，中國內部因素的變化。習近平上台以後，宗教管理機構的體制與法規上發生變化。習近平透過2015年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強調，宗教事務本質上是群眾事務，需要法律的管理，同時主張「四個必須²²」。²³ 另外，在習近平的指揮下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發表了「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強調一切宗教管理政策都要強化黨的角色。²⁴ 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再確認「宗教的中國化」，主張共產黨要指導宗教，防止外國勢力滲透。2017年，藉由全國宗教工作會議，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必要性，同時主張需要符合中國情況的宗教理論。同年，中共中央發佈新版的《宗教事務條例》，這是以胡錦濤時期的版本為基礎修改。2018年3月，國家宗教事務局歸屬統戰部下屬機構。這種情況說明宗教問題重新由黨機關加強控制。除此之外，《外國人出入管理法》、《宗教活動場所登記法》等的變化，也是基督教傳教士離開中國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韓國與中國關係的影響，習近平執政初期，兩國的關係雖然比較密切，但韓國薩德飛彈的部署，以及朴槿惠總統被彈劾下台，帶來韓中關係的另一種局面。因此兩國關係的變化，也可能成為中國管理韓國傳教士的另一個原因。韓國直接派遣傳教士約在1990年北京亞洲運動會前後。²⁵ 1992年韓國與中國建交，此後隨著經濟交流

²² 「習近平出席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2015/5/20). 《人民網》 <http://pic.people.com.cn/BIG5/n/2015/0521/c1016-27032234.html>

: 習近平強調，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去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針和戰略任務，各級黨委要抓好會議精神貫徹落實，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

²³ 王 韻. (108年 1月). 中共「全國宗教局長會議」及近期管控宗教作為的觀察. 大陸委員會（陸委會）

²⁴ 王 韻. (108年 5月). 近期中共宗教治理觀察. 大陸委員會（陸委會）

²⁵ 김형석. (1995). 역사적 맥락에서 본 한중관계와 중국선교 문제.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4). 280

的擴大，人才的交流也急劇增加。藉此機會，韓國的傳教士以學生、企業家、派駐人員等身份進入中國，居住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中國政府為了經濟發展和維繫與韓國的關係，默認了韓國傳教士的移入。

習近平執政後開始，這種觀點出現了變化。2014年7月，習近平的訪問韓國是讓韓國基督教界積極期待兩國宗教交流的發展。在白石大學(Baek Seok University)傳教學教授Chang Hun Tae認為，由於每年有1000多萬人的的人際交流，今後韓國教會在中國教會傳教大有希望。²⁶ 另外，中國提出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 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與擴大東協加6的影響力、以及南北韓關係引發的東北亞安全問題，韓國與中國的合作變得更加重要。但是，在東北及沿海地區的韓國傳教士與教會的持續增加，給中國的國家安全帶來威脅和挑戰，成為韓國與中國的安保合作的障礙。²⁷ 因為中共政府擔心在教會中朝鮮族通過聚會，出現不是作為生活在中國的少數民族的認同感，而是作為韓國同胞的認同感而動搖。加上，中國在為了解決社會問題，而需要非政府組織(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的幫助，但習近平警告，西方思想透過非政府組織流入中國的可能性。²⁸ 因為許多NGO團體的創辦人與工作人員都是基督徒，而西方基督教勢力的影響力藉此流入中國。以這些事實作為分析，中韓關係的因素可以說明，中國對基督教的態度變化，但是在習近平第二任期後，大量驅逐韓國傳教士的作為並沒有辦法從國際關係得到充分的說明。此外，習近平之前的政府中也有很多韓國傳教士，除非違法事實被意外公開才會被驅逐出境，否則可以在地方政府的默許下居住在中國。中國政府有限度容忍韓國傳教士的理由一直沒有被充分說明。

[Kim Hyung Seok. (1995). 從歷史脈絡看韓中關係和中國傳教問題. 韓國基督教與歷史(4). 280]

²⁶ 장훈태. (2014). 동북아 정세 변화와 한,중 관계 속에서 선교. 한국기독교신학논총 94(1). 289

[Chang Hun Tae. (2014). Toward Mis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in Circumstance Change of North-east Asia. Korean Journal of Christian Studies 94(1). 289]

²⁷ 金龍雲. (2012). 宗教與韓國對外關係研究狀況述論. 世界宗教文化 6. 111

²⁸ 이현주. (2017). 동아시아공동체 부상과 한국교회의 선교전략: 아세안과 중국 AIIB 출범을 중심으로. 복음과 선교 40. 176-177

[Lee Hyun Joo, (2017). The Rise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Mission Strategy of Korean Church: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IIB in ASEAN and China. Journal of Korea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40. 176-177]

第三個是，韓國傳教士內部的問題。韓國一些傳教學術文章認為韓國教會的傳教方法有問題。這些作者認為，共同出現的問題如下；傳教政策的缺失、在傳教地本國傳教士之間的競爭、傳教訓練不足、派遣機關與傳教士之間的矛盾和傳教費用問題、對傳教地的理解不足等。²⁹ 另外，作者還指出了傳教系統建構不足、傳教士對當地文化和語言以及狀況認識不足、只執著於顯現的傳教結果等缺點。例如韓國傳教士對傳教抱有非常熱情的態度，但是這種熱情被過度使用，表現為對傳教結果的競爭，讓應該隱蔽進行的傳教活動被暴露出來，而遭受政府單位的取締。由於韓國人的特點，在國外生活時，許多時候都是韓國人聚在一起生活，因此適應傳教地需要更長的時間。這種現象無法完全滿足傳教地的需求，其結果不是得到傳教的效率，而是導致損失。因為這些韓國文化的特質給中國人留下了消極的印象，而且也給派遣韓國傳教士的教會，或傳教團體在韓國也留下了消極的印象，對於派遣適合的人與使用適合的策略造成障礙，所以也有可能是韓國傳教士被迫離開中國的原因。³⁰

上面敘述的三種假設在現有的中國宗教研究領域略有涉及，但是少有研究將這三點都整理。因此，筆者想透過本研究整理與分析有關中國基督教與韓國傳教士被驅逐的三個因素。特別是，筆者認為，對中國的基督教與傳教士的態度，第一個假設——中國內部要素——是比其他兩個要素更重要。根本原因是習近平執政以來，出現的變化最為明顯。具體來說，這是新領導人所體現的政策態度的變化。習近平對宗教的態度和對思想統一的態度與以往領導人不同。

中共建政以後，中國繼續管理宗教。改革開放開始以來，根據國家的利益既利用宗教，又控制宗教。但是習近平的執政後，比以往政府更加重視法制。2016年的宗教工作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說：「要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用法律規範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行為，用法律調節涉及宗教的各種社會關係…」³¹ 以這種法令為基礎，習近

²⁹ 홍진철. (2017). 개혁과제로서 미학적이고 한국적인 선교신학 방법론. 신학과 복음 3. 6-36
[Hong Jin-Cheul. (2017). aesthetic and Korean missional theological methodology as a reform task. THEOLOGY and GOSPEL 3. 6-36]

³⁰ 조은식. (2014). 한국교회의 선교 정책 비교. 한국기독교신학논총 94(1). 317-319
[Eun Sik Cho. (201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ission Policies of Korean Churches. Korean Journal of Christian Studies 94(1). 317-319]

³¹ 「習近平出席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2016/3/23). 《人民網》；孟 璐. (2020). 習近平宗教工作思想視域治理法治化研究. 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5). 6

平把過去模糊的部分更加具體化並實現。2018年，國家宗教局併入統戰部，宗教事務開始在黨機關上管理，強調統一戰線，提出在思想上也要統一、團結人民。尤其是，為了思想上的統一，習近平要控制外部思想的流入，2017年透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符合當前中國內部情況的宗教理論，並以此為基礎說明中國的宗教現象與問題。另外，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但宗教應該在黨的管理下，宗教需要積極的引導來適應社會主義，阻止宗教極端主義。因而，習近平宗教工作思想上的主要構成，堅持黨的無神論，堅持獨立自辦的原則，由正確處理各種宗教關係。³²

中國共產黨主張無神論，並希望維持這一主張。中國強力控制宗教的原因之一，是為了堅持思想上的統一，為此最大限度地阻止外部思想的流入。但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理由。即是，人民團體的力量越來越大，就會對社會產生重大影響。若有和黨的價值觀不同的人民，定期聚在一起度過時間，該團體的聲音會聚集起來，其勢力有可能變大而對黨的壟斷造成影響。特別是，基督教每一週都有許多種類的定期聚會，從數十人的查經班到僅有數人的小組聚會，並相當重視這種聚會的頻率。聚會頻率會提高集團內聚力與對外影響力，如放手不管，基督教集團的聲勢會越來越大。因此，若這種集團聲勢反對黨的主張或命令，並採取相應的行動，這將成為妨礙政權以及維持現有體制的重大因素，法輪功就是近期最明顯的例子。筆者認為，這一個內部因素假設比其他假設更重要，因此以該因素建立分析的框架，解釋在習近平時期韓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的問題。

但是，僅靠中國內部因素來說明可能存在不足之處。因此，從客觀的政治經濟社會情況以及韓國傳教士的內部情況來看，中國政府驅逐韓國傳教士的理由也更加明確。譬如，中韓之間發生的薩德部署問題，東北地區韓國傳教士與朝鮮族問題等。

為了證明筆者的三個假設，預計使用採訪在台韓國傳教士與分析現有文獻。在現有文獻研究方面，將通過論文和新聞報導瞭解習近平的宗教政策對韓國基督教產生了何種影響；採訪對象是曾經在中國大陸傳教，目前在臺灣的韓國傳教士。

³² 丁威. (2018). 習近平宗教工作思想視域下宗教治理政策探析. 新疆社會科學 1. 70

第二節 文獻分析法

文獻分析法(Document analysis)是對現有文件進行系統的研究、評價和解釋的方法，包括質量的研究方法。一般來說，文件是由不受研究者影響的情況下記錄的單詞或形象構成的。其種類包括政策、規定等文獻、歷史文獻、新聞報道、圖書、小冊子、信件、廣告、網頁、圖表等。這些文獻大致可分為第一手資料(primary types of data)和第二手資料(secondary types of data)，前者是未經任何解釋或分析的文獻，後者是已對材料進行分析和解釋的文獻。³³

筆者將利用論文、新聞報導以及網路資源等獲取有關韓國傳教的相關資訊。另外，通過韓國傳教士講述自己經歷的圖書，想獲得他們所經歷的實際訊息。特別是關於傳教歷史的部分，將通過韓國基督教出版社編纂的圖書說明整體的脈絡，中國部分的文獻也希望通過專門書籍、期刊論文、學位論文、研究報告以及官方報導獲得。

文獻分析具有對單一現象、事件或組織進行豐富說明的優點，適合質化研究。³⁴另外，對於在限制範圍內形成的狀況，透過文獻內容可以明確了解情況的背景、發展過程、未來研究的方向，不僅能理解過去，還能幫助理解現在的情況。並且隨著文獻的種類，不僅個人的立場，也能看清楚一個國家或團體的立場。³⁵這些特點對於明確了解，關於本研究主題的韓國與中國政府的立場，以及了解兩國教會的官方立場存在大優勢。

但是，根據出版文獻的機關，有可能包含主觀見解的缺點。由於文獻屬於第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相比，具有不實際的局限性。本論文的主題是，觀察與分析在相對有限的群體內所發生的事情，因此文獻分析法的應用最為有效。但是在中國內部正式公開的資料中，傳教士或基督教相關的資料比起傳教士實際經驗，更包括政府的立場與見解，因此，實際上分析基督教與傳教士的情況是有局限的。所以作者為了聽取與

³³ Frey, B. (2018).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Vols. 1-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2 doi: 10.4135/9781506326139

³⁴ Bowen, Glenn. (2009).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9. 29

³⁵ 葉至誠、葉立誠。(民88年)。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台北市：商鼎文化。138-156

分析傳教士親身經歷的內容，還打算採用訪談方式。

第三節 深度訪談法

本研究採用深度訪談法(in-depth interview)。深度訪談法是質量研究方法之一，透過與陌生的人之間的對話，訪談者瞭解受訪者的意見和想法，以及對某一主題的看法。大部分受訪者是在熟悉的地方進行訪談，因此可以獲得更豐富、更有價值的資料。而且不存在固定的方法與程序，存在多種形式和分析方式，方法上具有彈性強的特點。該方法要深入地談論一個主題，傳達受訪者的專門知識，因此可以知道全方位、深層次的結果。³⁶

訪談的方法可分為兩種——即是直接訪談法與間接訪談法。直接訪談法有面對面方式(face-to-face)，間接訪談法有電話訪談(phone interview)與文件訪談法。³⁷ 該研究的目的是，根據中國宗教政策的變化，分析韓國傳教士的反應和其結果，因此與傳教士直接見面進行對話，詢問他們的經驗並進行面對面採訪的方式比較適合。

採訪的對象是曾去過中國傳教的韓國傳教士。筆者因為有基督教教會的背景，所以在台灣認識牧師與傳道士。他們去過中國傳教，計劃先訪談他們，然後透過滾雪球式抽樣(snowball sampling)方法取得樣本。滾雪球式抽樣是，透過初次採訪對象的介紹，瞭解下一位採訪對象，其優點是通過採訪相似領域的人，獲得更詳細的訊息。³⁸ 因此，筆者想對韓國傳教士進行約10位的採訪。

訪談的內容大致分三個部分。第一，關於傳教士本身的提問。筆者要問，傳教士

³⁶ Rosenblum, K. (1987). The In-Depth Interview: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ability. *Sociological Forum*, 2(2), 389; 范麗娟. (1994). 深度訪談簡介. *戶外遊憩研究* 7(2), 28-31; 신혜란. (2007). 심층인터뷰 연구방법론 : 타인에게 배우는 데이터 수집·분석기법. *국토 (통권 307호)*, 60-62 [Shin Hye-Ran. (2007). In-depth Interview Research Methodology: Data Collection Analysis Techniques for Learning from others. *Planning And Policy*, 60-62]

³⁷ 이영희. (2007). 인터뷰조사기법: 질적 연구를 위한 인터뷰 성공기술. *국토(1) 통권303호*, 109-110 [Lee Young-hee. (2007). Interview Survey Techniques: Successful Interview Techniqu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PLANNING AND POLICY*, 109-110]

³⁸ 孫曉娥. (2012). 深度訪談研究方法的實證論析.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 103

住在中國期間做過的事情。第二，關於作為韓國人以及在中國與韓國的關係中，傳教所出現的狀況的提問。提問韓國人傳教過程中出現的優缺點，或者隨著韓中關係變化而改變傳教方法等問題。第三，要提問傳教士在中國親身經歷的部分。由於所有傳教士的情況和經驗不同，在採訪的過程中，根據各自的情況，預計追加或刪除提問。

第四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的範圍是習近平執政的2013年到2020年中國的宗教政策為焦點。在中國憲法認可的5大宗教中，以基督教為重點，包括不是中國內部的教會，而是韓國傳教士。1992年韓國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以及在韓國開始海外旅行自由化，韓國傳教士開始進入中國。1990年到2000年代後，由於中國快速的經濟發展，因此更多的韓國人為了事業、升學、傳教移入中國。加上韓國基督教徒的比例很高，韓國教會對傳教的熱情很高，所以許多傳教士都去了中國。到胡錦濤時期，韓國與中國還在進行宗教交流。但是習近平掌權後，全體宗教的管理比胡錦濤時期更加嚴格，驅逐韓國傳教士的比率也相對增加。因此，觀察該時期的韓國傳教士，可以推測出習近平宗教政策的目的。

研究限制如下。最大的問題是目前環境的原因。現在由於新冠病毒疫情(COVID-19)，不能直接去中國，所以沒能見到比較多樣的傳教士。因此，採訪的對象存在局限性。另外，與傳教士的立場相比，中國政府的立場，通過官方資料才能知道而不易取得。最後，由於在臺灣的韓國傳教士不多，所以其代表性受到限制。以後有機會筆者希望可以實際到中國繼續追蹤調查。

第三章 歷史文獻回顧

關於在中國傳教，韓國出版的大多數文章，都登載於神學大學的學報、期刊。傳教領域中包括韓國接受外國傳教士的歷史、韓國派遣傳教士的傳教歷史、韓國或外國的傳教方法等主題。

第一節 韓國派遣至中國傳教的歷史

韓國教會最早派遣傳教士的時期是1900年代。當時韓國是日本的殖民地，被日本奪取土地的農民和抗日運動的人逃往國外。韓國教會為國外的韓國人派遣了一批韓國傳教士。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夏威夷傳教的洪承夏(홍승하, 1863-1918)，在濟州島傳教的李基風(이기풍, 1865-1942)，以及為了中國東北地區(滿洲地區)的韓國人傳教的傳教士們。

1900年代初期，不僅針對海外韓國人，亦為外國人進行傳教。最具代表性的是，1913年由韓國長老教會派遣傳教士至中國山東。長老教會派選派朴泰魯(박태로)，史秉淳(사명순)，金永勳(김영훈)前往山東地區，他們僅用1年時間就能以中文傳道，更舉辦了查經會。比起成立新的教會，他們更傾向與中國長老教會合作推進傳教事業。³⁹

韓國的本土教派中，聖潔教會(Korea Evangelical Holiness Church)亦開始了中國傳教。聖潔教會海外傳教的第一階段，是1925年為居住在滿洲地區的韓國僑胞傳教。此後，於1933年派李憲英到上海建立教會，這是在聖潔教派中最早派到中國的宣教士。但是，戰爭的混亂以及中國的共產化導致傳教士不易入境，直到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後，傳教之門再度打開。

從1949年到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期間，韓國教會無法正式進行中國傳教。但韓國教會透過在中國的外國基督徒，非正式地祕密地幫助家庭教會。1992年中國與韓國建交後，韓國的教會和韓國的基督教團體開始影響中國的家庭教會，家庭教會不顧中國

³⁹ 박용규. (2004). 초기 한국장로교 해외선교. 신학지남 71(1). 104-105

[Yong Kyu Park. (2004). Early Korean Presbyterian missions overseas. The Presbyterian General Assembly Theological Seminary 71(1). 104-105]

政府的壓迫蓬勃發展。1993年起「基督教大韓聖潔教會海外傳教委員會」(Korea Evangelical Holiness Church Overseas Missions Committee)在神學領域、廣播領域、NGO領域等多個領域派遣傳教士，活動範圍不僅擴大到東北地區，還擴大到中國內陸地區。⁴⁰ 1900年代，韓國的中國傳教以中國北方的朝鮮族為中心開始。此後，韓國的中國福音宣教會(Chinese Missionary Institute)和中國語文傳教會(China to God, 중국어문선교회)等宣教團體登場開始活躍。另外，以電視台為中心的傳教活動亦出現在90年代。1995年北方宣教廣播(TWR KOREA, Trans World Radio Korea)正式成立，目前不僅針對中國人，亦以北韓人與北韓地下教會為對象進行傳教活動。⁴¹

進入2000年代，派到外國的韓國傳教士持續增加。韓國宣教研究院(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ission, KRIM)從1979年開始，每兩年一次進行對傳教士數、傳教團體、派遣國家等做統計。1979年傳教士達93名的，1989年增至1,178名，1998年達4,402名，2006年增至14,905名，28年間海外傳教士的派遣增加了160倍，這反應整體韓國教會的成長、以及對於海外傳教興趣的大增。⁴² 其中大部分被派往亞洲地區，地理位置較近的中國地區佔大多數。大部分韓國傳教士是以普通人民為對象進行傳教的，因此受到的政治關注比較小。

但是習近平執政後出現了變化。例如一名受訪者既是教授又是傳教士，2013年從韓國返回北京的過程中，被中國出入境管理局拒絕入境。當時該傳教士持有有效的合法居住許可證，但北京機場的出入境管理負責人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為依據，再次遣返韓國。⁴³ 可見中共當局早已知道該教授的真实身份，至少在2013年之前都對他的「違法」行

⁴⁰ 황규영. (2015). 한국성결교회와 중국선교. 성결교회와 신학 33. 83

[Hwang Kyu Young. (2015). Korean Holiness Church and Chinese Missionaryism. Evangelical Holiness Church and Theology 33. 83]

⁴¹ 김성환. (2013).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역사의 방향. 복음과 선교 23(3). 71-73

[Kim Seong Hwan. (2013). The Orientation of Mission History for Chinese of Korean Church. EVANGELICAL MISSIOLOGY 23(3). 71-73]

⁴² 정재용. (2008/4/3). 28년간 해외선교사 파송 160배 증가했다. 《Igoodnews》

<http://www.igoodnews.net/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9022>

[Jung Jae-yong. (2008/4/3). 28年間海外傳教士的派遣增加了160倍. 《Igoodnews》]

⁴³ 김광성. (2013). 중국 종교자유정책에 대한 역사적 고찰. 복음과 선교 23(3). 9

[Kim Kwang Seong. (2013). Appropriate Mission for China in rela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Religious

為採取容忍的態度。

2017年在中國公開的韓國傳教士約有500人，但實際上約有2000多人。大部分生活在語言與文化相似、與北韓相近的東北地區。但從2013年到2017年，有1000多名韓國傳教士遭受驅逐，2018年生效的新宗教政策導致韓國傳教士遭受驅逐。⁴⁴

在韓國關於韓國教會的傳教歷史的研究很多，但專門研究中國傳教的還是不夠。雖然強調始於1900年代的韓國教會海外傳教的第一個地方是中國山東，但此後對中國傳教的研究較少。因此筆者在這篇論文中對韓國教會的傳教歷史進行更詳細的敘述，同時對韓國傳教士的中國傳教進行更詳細的闡述。

第二節 韓國的傳教政策與方法

韓國教會的傳教政策，是以美國傳教士首次進入韓國後，使用的方式為基礎，逐漸增加韓國教會自己的方式。現存最著名的傳教方式是倪維思政策(The Nevius Plan)。該政策的代表性的政策是三自(Three-self Principle)政策，以自立(Self-Supporting)、自傳(Self-Propagating)、自治(Self-Governing)的方法建立與運營教會。這個原理在韓國為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⁴⁵所推動，因此也被稱為倪維思傳教政策。

Policy. EVANGELICAL MISSIONOLOGY 23(3). 9]

⁴⁴ 同註7

⁴⁵ 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 他是曾住在中國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他的著作《傳教教會的設立與發展》(Planting and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es)對在韓國的美國傳教士產生了巨大影響。1890年倪維思應邀來到韓國，向韓國的美國傳教士教自立原理。他強調本地教會的獨立，這種主張與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形成了協調。倪維思的代表傳教方法是如下：第一，傳教士個人巡迴傳教或傳教活動。第二，在所有傳教的領域以聖經為中心活動。第三，自傳。第四，自治教會。本地教會要脫離傳教士的領導力，依靠當地人的領導力來運營。第五，自立教會。本地教會要獨立運營，不依賴傳教士的傳教資金。第六，每一個信徒在小組的領導下學習聖經，而且每一個領導人透過聖經研究組織地學習聖經。第七，透過聖經的刑罰方式，實施嚴格的懲戒。第八，與其他傳教團體合作聯合，或者至少分開傳教地方或領域。第九，不要干涉訴訟或此類法律上的問題。第十，在民眾的經濟問題上，若可以的話，給予一般性的幫助。在這種方法中，自立的意義不僅在經濟上、活動上的自立，還一味者本地教會信徒們自己傳道，教會自己的文化也要成長。；배본철. (2009). 세계교회사(성령, 일치, 선교). 도서출판영성네트워크. 477-480 [Bae Bon-cheol (2009), 世界教會史 (聖靈, 一致, 宣教), 首爾: 靈性網路公司(spiritual network co. ltd). 477-480]; Jacqueline Pak. (2006) "Cradle of the Covenant Ahn Changho and the Christian Roots of the Korean Constitution," in Robert E. Buswell Jr. and Timothy S. Lee eds. (2006). Christianity in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27-128.

韓國傳教以該政策為基礎進行海外傳教，韓國傳教神學會長Kim Eun Soo(2008)以韓國傳教團體「大學生讀聖經宣教會」(University Bible Fellowship)的傳教政策為例進行說明。倪維思(Nevius)早期在中國的山東省，運用自己的傳教方法——自立、自傳、自治的原理，但在1886年因未能成功而放棄。直到1913年前往山東的初期，韓國傳教士對中文有一定的知識，透過韓國的禮儀，與中國官員建立良好的關係。他們聽從了韓國長老會的勸告使用倪維思傳教方法，派遣單身女性傳教士等參加女性事務，與自費(one's own expense)醫療傳教士合作，培養中國教會的領導人，教師傳教士的派遣，使用地區分擔(Comity)政策等，透過這些方法，在山東地區取得了成功的傳教成果。⁴⁶

韓國教會以倪維思政策為基礎，因地制宜地採用多種傳教方法。在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大部分韓國的傳教士，為了在中國的韓國人設立教會，半公開地進行傳教活動。為了中國人民，韓國傳教士以韓國文化為手段進行傳教，並設置孤兒院、養老院、殘疾人照護中心等社會福利設施，成為傳教的方法。透過這些社會福利設施與人民形成關係後，建立教會的方法來擴大中國傳教。

韓國是熱衷傳教的國家，有其教徒使命感的因素，教會經濟實力提升也為境外傳教提供了可能。韓國地域空間狹小，當國內信徒數量和資金難以再度提升時，教會自然會將視野投向海外，一些教會團體甚至派傳教士到敏感地區傳教，以證明自身的價值。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資助教會向海外派遣傳教士，使傳教士傳播福音的同時，也兼任韓國形象宣傳的民間大使。韓國政府曾在《2002年文化政策白皮書》中表示：政府不干涉宗教團體及個人的信仰自由，只援助那些具有促進社會發展的社會文化意義的活動。⁴⁷

但是進入21世紀後，中國的情況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隨著中國的三自教會與家庭教會成長，亦出現問題。尤其是，家庭教會出現了「三多」⁴⁸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

⁴⁶ 강승삼. (2002). 한국교회 해외선교에 NEVIUS 선교정책 적용에 대한 회고와 전망. 신학지남 69(3). 7-46

[Sung Sam Kang. (2002).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VIUS Missionary Policy to Overseas Mission in Korean Churches.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Quarterly 69(3). 7-46]

⁴⁷ 李軍、青木、曹思琦. (2017/06/16). 深度報導：熱衷傳教，何以成韓國標籤. 《環球時報》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RmK3wzK>

⁴⁸ 「三多」是指中國家庭教會三個主要問題。第一，中國家庭教會大部分分佈在農村地區。第二，中國家庭教會大多數成員沒有受過教育的階層。第三，中國家庭教會中女性的比例很高。如果再加上老人比

題，韓國浸禮神學大學(Korea Baptist Theological University)傳教學教授Lee Hyun Mo 整理出約10種方法。即是，加快對知識分子階層傳教、準備工業區的傳教、培訓城市家庭教會領導人、培養兒童服務能力、支援神學教育、重新評價少數民族服務、重新考慮中國教會海外傳教能力、加強韓國傳教士聯合等作為。⁴⁹

最近韓國教會認為，中國傳教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培養中國教會的領導人。這不僅包括朝鮮族、中國人，還包括西北地區的少數民族。爲了青年領導人，有在大學活動的傳教團體。韓國的某一個大學生傳教團體從1993年開始作爲美國的嚮導和多國團隊參與至今。其中，如果想正式學習神學，還可以通過當地的韓國傳教士到韓國神學大學留學。或者在臨近中國的邊境地區、泰國、香港、澳門或臺灣的神學院邀請家庭教會領導人，進行長短期神學研修。⁵⁰

根據最近對韓國教會傳教類型的統計，建立教會的人數最多爲9,921人，其後是信徒訓練4,962人、傳教動員2,147人、傳教教育1,794人等。⁵¹ 特別是，從以前開始，韓國教會一直把重點放在建立教會。但是由於在中國各韓國傳教士的安全問題，他們所做的事情也需要保密，因此目前缺乏詳細數據的資料。另外，隨着中國情況的變化，許多傳教學者指出現存的傳教方法存在的問題，主張追求新的方法，但他們提出的新方法是抽象的，很少有具體的案例。因此，在本論文，筆者希望通過採訪，整理韓國傳教士的實際工作類型和方法。

第三節 中國內部因素

中國內部因素，根據歷史上發生的中國內部政治變化而有所不同。最明確的是領

率多的條件，則爲「四多」。

⁴⁹ 이현모. (2010). 변화된 중국 상황에서 한국 교회의 선교 방안. 복음과 실천 45(1). 311- 323

[Lee Hyun Mo. (2010) 在變化的中國情況下，韓國教會的傳教方案，福音與實踐 45(1). 311-323]

⁵⁰ 정경호. (2017). 세계 종교의 흐름 속에서 본 중국교회의 선교전략(서북지역을 중심으로). 신학지남 84(1). 209-238

[Gyeong ho Jung. (2017). The Mission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Flow of the World Religion.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Quarterly 84(1). 209-238]

⁵¹ 同註20

導人的變化和隨之而來的政策方向，同時思想因素和社會穩定也是中國內部因素。

首先，中國建國初期，爲了反對西方的帝國主義思想與確立共產主義思想，對待外國基督教的態度發生了變化。隨着中國成爲共產國家，在中國的教會必須支持共產黨，政府要求教會與外國團體分離。1950年，周恩來召見中國教會領導人，主張改變美國的帝國主義透過教會接近中國人民的觀念。所以要求基督教機關勿使用外國職員和外國基金，以外國傳教士的政治立場不明爲由，禁止他們入境。但在科學技術等非政治領域工作的傳教士，可以繼續留在中國。雖然從事傳教士的工作，但有助於中國的科學技術發展，因此這一領域的傳教士可以有限地入境或停留。

但隨着中國決定參與朝鮮半島戰爭，對基督教和外國傳教士的態度又出現了新的變化。在中國，反美情緒不斷激化，傳教士的存在也難以繼續下去。中國政府進一步強化基督教和帝國主義聯繫的主張，基督教團體設立的學校和醫院開始接受人民委員會的管理。這一時期，美國傳教士還被指爲間諜，受到了指責和驅逐。因此大多數傳教士從中國撤走，中國政府也下令，中國的基督教團體斷絕與美國傳教機構的關係。⁵²

中國此後也把基督教與中國政府政策相協調，中央統戰部維持對中國社會宗教領域的制度、理念控制權，並遵循其政策作爲基本結構，實行宗教自由政策。中國在宗教方面，從建國初期到現在，透過統一戰線戰略放寬宗教活動的管制，吸引外國資本，但內部仍然主張應與國家協調，適應社會主義。因此，亦有人主張，改革開放時期宗教的迅速擴散，可能成爲中國社會主義的夥伴。另外一些中國基督教徒認爲：「中國具有出色的組合各種不同性質的東西的能力，因此社會主義理念和西方宗教的組合也會非常和諧。」⁵³

宗教和社會主義「和諧」是所有領導人強調的部分，但習近平執政後更加具體。習近平通過宗教中國化政策，強化了中國五大宗教的對韓國傳教士的管理。宗教中國

⁵² Kang, W. (1997). *Christ and Caesar in modern Korea: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김영동. (2012). 한국 장로교 선교 100년. 장신논단44(2). 105-128 [Young Dong Kim (2012), One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 of the Korean Presbyterian Church: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ission Theology.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44(2). 105-128

⁵³ Leung, B. (2005).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The art of managing religious activ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84). 894-913.

化的具體方法有「五進五化」⁵⁴。韓國傳教學學者分析說，採用該方法的基督教中國化是，中華思想的中國化、是中國共產黨政府目標理想的社會主義建設工具的統一戰線戰鬥力的合作成品，也是為中國政府實行的宗教自由政策提供理論依據的戰略。中國政府的宗教政策與社會主義宗教觀的解釋方法變化一致，基督教中國化有三個要素，即承認中國政治、適應中國社會、表達中國文化、每個要素都象徵着基督教的政治中國化、結構和體系的中國化、文化部分的中國化。因此，中國政府從「和諧」變成「中國化」的社會主義宗教觀，成為韓國傳教士不能在中國傳教的原因之一。

最近出現了具體的法律案例。2018年，統戰部、公安部、國家宗教事務局聯合發佈《依法查處韓國基督教滲透專項行動工作方案》，此後韓國基督教教會遭到更嚴重的迫害。該工作方案的目標是，管制中國內主要的韓國基督教團體及傳播福音的人員。⁵⁵ 由於中共政府加強管制，許多韓國傳教士被驅逐出境，仍在中國的傳教士的情況越來越困難。一名警察說：「外國人不能來中國講道，沒有中國國籍、中國政府頒發的牧師資格證，在中國講道就是犯法」。根據這種規範，被逮捕或接受調查的韓國牧師受到罰款刑，亦被驅逐回韓國。⁵⁶

韓國傳教學學者就驅逐韓國傳教士解釋說，中國內部因素中，國內政治變化與領導人的政策決定。但是上述文獻的作者並沒有對中國內部要素進行詳細的說明，而是把重點放在宗教政策的變化上，並不特別突出領導人的角色。特別是到了習近平第二個任期，對韓國傳教士的政策才出現了變化。因此筆者雖然同意習近平執政是重要因素之一，但除此之外，社會穩定或意識形態部分的變化應該也是重要的中國內部因素。

⁵⁴ 五進: 宗教政策法規進教堂, 健康醫療進教堂, 科普知識進教堂, 扶持幫困進教堂, 和諧創建進教堂.
五化: 宗教本地化, 管理規範化, 神學本土化, 財務公開化, 教義適應化

⁵⁵ 江 濤. (2018/8/26). 山東當局迫害韓國傳教士. 《BITTER WINTER(寒冬)》. [山東當局迫害韓國傳教士 - 紀實 \(bitterwinter.org\)](http://bitterwinter.org)

⁵⁶ 李明軒. (2019/7/19). 隨時被遣返 韓國傳教士在中國處境愈發艱難. 《BITTER WINTER(寒冬)》在華韓國傳教士隨時遭抓捕遣返 警稱「外國人在中國講道犯法」 - 新聞 (bitterwinter.org)

第四節 國際關係因素

韓國與中國地理位置相鄰，因此歷史上一直都是不可分離的關係。韓國很難避開中國的影響力，共享儒家文化、漢字文化等類似文化，使兩國人民的意識結構也具有共同點。但是，從1940年代開始出現的相異的政治理念與體制，雖然使中國和韓國成爲敵對關係，但在冷戰體制瓦解的國際背景下，1992年中國和韓國建交後，兩國關係出現了新的變化。

鄧小平主張改革開放，中國與韓國進行經濟交流的必要性增加。因爲韓國是與中國大陸接壤的國家中經濟發達的國家，而且彼此具有互補的經濟結構。韓國雖然技術和資本充足，但勞動力不足，中國正好相反，因此可以相互補足。1990年初被派往中國的正式韓國傳教士有129人，但加上留學生、企業家、派駐人員身份等非正式數字，實際在中國活動的傳教士爲數倍之多。韓國教會傳教士在這個時期急速增加的原因，總神大學(Chongshin University)Kim Hyung Seok(1995)教授解釋如此：

「韓國教會在中國傳教之所以能在短時間內迅速發展，是因爲隨着兩國經濟交流的擴大，人才的進出劇增，而且共享歷史文化遺產，很容易被同化，透過當地的朝鮮族可以輕鬆解決語言障礙。」⁵⁷

2013年，朴槿惠總統就任，習近平就任主席。同年6月，朴槿惠訪問北京，與習近平舉行首腦會談，2014年7月習近平訪問韓國。透過這樣的過程推進韓中FTA，以遭受日本帝國損害的共同點爲基礎，兩國亦就日本的右傾化外交進行了合作。結果2015年被評爲最佳韓中關係。但是，2016年韓國部署薩德飛彈的爭議迅速使兩國關係惡化，朴槿惠總統彈劾事件的發生，更對中國產生了影響。

韓國基督教界還評價說，薩德部署事件與彈劾朴總統的燭光集會，對韓國教會的中國傳教產生了影響。薩德部署事件導致中國國內的反韓情緒，對居住在中國的韓國傳教士以及韓國人群體產生更多戒心。對於總統彈劾事件，中國政府並不喜歡韓國的民主化氣氛，通過韓國傳教士傳入中國。⁵⁸

⁵⁷ 同註25，272

⁵⁸ 同註7

據BBC報道，2017年2月，韓國外交部表示，同年1月，中國驅逐了32名韓國傳教士，2月又有韓國人被捕。韓國外交部再次對韓國教會相關人士建議，傳教活動要尊重當地的法律和習俗。韓國的大部分媒體和大眾認為，驅逐韓國傳教士是中國對韓國部署薩德的報復。⁵⁹ 與此同時，由於限韓令，反華情緒在韓國也進一步擴散。

另外，關於驅逐韓國傳教士，還發生了與國際因素相關的其他事件。這與2017年中國青年在巴基斯坦死亡事件有關。⁶⁰ 2017年5月，發生了兩名中國人在巴基斯坦被武裝組織綁架身亡的事件。據悉，兩名中國人與在巴基斯坦經營中國學校的韓國人有關，該韓國人是基督教徒，在當地進行傳教活動。環球時報記者分析說，中國人來巴基斯坦的原因可以充分說明，但與韓國人的人際關係並不明確。⁶¹

韓國方面也有人反對中國的主張。相關傳教團體分析說，沒有將中國人送往巴基斯坦，中國教會的主張和中國政府的主張不同。還有分析認為，當時掌握該地區的武裝勢力反對中國的一帶一路政策，不希望中巴合作。

另外，與韓國和中國的關係中，脫北者和朝鮮族的問題也是重要部分。韓中建交前，韓國政府對朝鮮族問題沒有太關注。但是，中韓建交後，由於脫北者優先進入朝鮮族居住地區，因此朝鮮族問題和脫北者問題聯繫在一起，成為韓中之間的主要問題。

中國政府反對韓國政府承認朝鮮族為在外同胞。中國政府最擔心的是，韓國的民族主義也有可能發生在朝鮮族身上。因此1980年韓國政府推行海外同胞法時，中國政府擔心，因為朝鮮族是中國公民，所以韓國政府的行為侵犯中國的主權，助長少數民族分離主義。

對脫北者的態度也相似。中國認為脫北者是，非法越境進入中國和朝鮮的非法越境者，因此定義是北韓與中國之間的問題。韓國政府認為，脫北者們應該被認定為難民，並給予相應的待遇。但是韓國政府的態度因為韓中關係和南北韓關係，對脫北者

⁵⁹ 中國驅逐32名韓國傳教士 皆因薩德之爭？. (2017/2/11). *《BBC NEWS》* 中國驅逐32名韓國傳教士 皆因薩德之爭？ - BBC News 中文

⁶⁰ 同註7

⁶¹ 王黎明, 杜海川. (2017/6/12). 這對把中國人帶到巴基斯坦傳教的韓國夫婦, 還能神秘多久? *《環球網》*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mK3oQa>

採取了消極的態度。⁶²

朝鮮族與脫北者與韓國傳教士也有關係。正如上面所說，韓國傳教士最早接觸的是語言相通的朝鮮族，也有通過他們進入中國內部的情況。另外，引導脫北者從中國前往韓國的中間人，大部分都是韓國傳教士。因此，中國政府爲了邊境地區的穩定和少數民族團結的原則，特別關注停留在東北地區的韓國傳教士。

此後在韓國，2018年3月文在寅總統任期開始後，與中國的關係有所改善。韓國和中國的領導人變化和兩國關係與其他國家的事件，亦給中國內的韓國基督教徒帶來影響。但是，重視國際因素的學者們，對中國內部因素的重視較少。因此筆者想分析一下，除了國際因素外，中國內部因素也佔很大比重，對在中國的韓國傳教士產生了何種影響。



⁶² 정천구. (2006). 제7장 조선족, 탈북자 그리고 한중관계. 통일전략 6(1). 198
[Jeong Chun-koo. (2006). Korean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Defectors in Korea-China Relations. Unification Strategy 6(1). 198]

第四章 韓國與韓國教會內部因素

第一節 韓國基督教的歷史

首先，要觀察基督教傳入韓國的路徑，會發現其與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歷程很類似。朝鮮後期(1637~1897)，天主教由中國以學術領域進入韓國。⁶³ 但是並未被當時的朝鮮接受，因此受到了約3次的迫害。⁶⁴ 此後到了19世紀，西洋船隻經常出沒於朝鮮海岸，當時正在執政的大院君(흥선대원군: 興宣大院君, 1821-1898)，因為對西方帝國主義的危機感，透過鎖國政策(closed-door policy 或 national isolation policy)除了禁止外來勢力進入朝鮮，還試圖從朝鮮消滅天主教。但在1873年大院君的兒子高宗(1852~1919.1.21)親政後，停止殺戮信仰天主教的人。⁶⁵

1876年，在滿洲，首位韓國人李應贊(이응찬)從蘇格蘭聯合長老教會的牧師羅約翰(John Ross)接受了基督教。⁶⁶ 此後，1884年9月，安連(Horace Newton Allen)擔任朝鮮美國公使館書記和醫生，成為首位來到朝鮮半島的基督教傳教士。1885年4月，元杜尤(Horace Grant Underwood)、亞篇薛羅(Henry Gerhard Appenzeller)入境。⁶⁷ 在韓國，一般將1885年元杜尤(Underwood)和亞篇薛羅(Appenzeller)到達的年份視為在韓國基督教正式開始傳教活動的時期。安連是1884年首次抵達韓國的傳教士，但由於當時韓國的政策，未能進行正式的傳教活動。此後外國傳教士的正式活動被認為是元杜尤和亞

⁶³ 在天主教被接納為宗教之前，天主教稱為西學，當作學問之一。特別是，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9)的《天主實錄》是，當時在朝鮮後期最多人閱讀天主教書，17世紀初就已經在北京發行，隨後又收錄李晬光(이수광, 1563~1628)的《芝峯類說(지봉유설)》中，傳入朝鮮，後對韓國天主教產生了影響

⁶⁴ 류대영. (2018). 한권으로 읽는 한국 기독교의 역사. 서울: 한국기독교역사연구소, 28
[Ryu Dae Young (2018), A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Korea, Seoul: Th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Korea, 28]; 1801年--辛酉迫害, 1839年--己亥迫害, 1846年--丙午迫害,

⁶⁵ 同註64, 32-33

⁶⁶ 최성일. (1998). 한국 개신교 성장의 역사와 전망. 신학연구 39. 199-242
[Choi Sung-il. (1998). The Church Growth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he Korean Protestantism. Theological Studies 39. 219]
이응찬(李應贊): 與羅斯(John Ross)傳教士一起為傳教士發行韓語教材，1878年開始將《新約聖經》翻譯成韓語。

⁶⁷ 이광순. (2004). 한국선교 120년. 선교와 신학 14. 16
[Kwang Soon Lee. (2004). 120 Years of Korean Mission 14. 16]

篇薛羅入境的1886年。該標準根據傳教開始是，開始傳教活動的時期，還是達到傳教地方的時期而有所不同。韓國教會把1884年定為正式時期。⁶⁸ 但初期朝鮮的國王只允許外國傳教士從事教育和醫療事業。因此，醫院成立後，出現了想學習西方醫學的人，元杜尤與亞篇薛羅的策略是先教授英語。於此同時，亞篇薛羅設立英語學校，而且1885年，從美國衛理公會(Methodist Church)女性海外宣教會(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 WFMS)來到韓國的施蘭敦(Mary F. Scranton: 1832~1909)推進設立女性學校。⁶⁹ 透過他們可以看出，在韓國初期，外國人的傳教只局限於醫療和教育領域。儘管如此，西方傳教士的技術、教育、醫療行為提高了朝鮮的技術，還提高韓國人的生活水準與愛國精神。在韓國，初期外國傳教士優先進行教育、醫療事業，因此當時給韓國人留下很好的印象。特別是透過基督教思想和西方教育，韓國的基督教領導人和愛國主義者開始反對儒教思想。因此，他們強調韓國的文化和認同感，這對韓國人的愛國精神產生了影響。⁷⁰

與在中國被視為「帝國主義走狗」的情況不同，基督教在韓國的發展，因緣際會成為新國族認同中「愛國」的象徵。當時朝鮮社會接受基督教的背景可以分為三種。第一是宗教的因素。1876年後，支撐朝鮮社會的儒教失去了作為國家思想的功能，佛教因政府的遏制政策，全部隱居在山上。因此，基督教被認為是新的精神價值。第二是文化的因素。當時來到朝鮮的西方傳教士，透過教育和醫療事業自然地傳達基督教精神，朝鮮人也對新文化產生了好感。第三是政治與社會上不穩定的情況因素。當時，朝鮮正處於西方的帝國主義與日本、清朝、俄羅斯等強國之間混亂的局面。在國內，1894年發生東學革命，1895年發生中日甲午戰爭、朝鮮的王妃被日軍殺害(乙未事變, 을미사변)國內外都存在困難。⁷¹ 這種情況下，普通民眾想尋找精神上依賴，正好基督教可以滿足，所以當時朝鮮社會迅速、積極地接受基督教。

⁶⁸ 구성모(2014). 초기 한국교회의 선교사 파송에 관한 연구. 신학과 선교 45. 278
[Ku Seong Mo. (2014). A Study of The Early Korean Church's Despatch of Missions. Theology and Mission 45. (Seoul Theological University Christianity Theological Institute). 278]

⁶⁹ 同註64，57-60；Mary F. Scranton (1832.9.12~1909.10.8): 她建立韓國最初的女性學校，當時高宗起名為「梨花學堂」，現名為「梨花女子大學校」。

⁷⁰ 同註52，29-31

⁷¹ 同註66，220-222

1910年開始日韓合併條約，韓國被日本殖民統治。日本政府認為，韓國教會和基督徒在當時的社會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為了政府的成功，需要基督教的支持。初期日本政府奉行仁慈的政策。但過了一段時間後，日本政府開始鎮壓強調民族主義的基督教。對此韓國人民最大的抗爭是1919年發生的「三一」運動。⁷²三一運動時，33人簽名獨立宣言書，其中16位是基督徒，10位是長老教會的信徒。日本認為，三一運動是以外國傳教士與韓國基督教為主軸而發生的運動。因此，日本政府開始更加批判傳教士。⁷³

三一運動以後，日本採取了比較柔和的政策⁷⁴，但由於日本本土的政治狀況和1931年9月18日發生的滿洲事變，又加重了對韓國基督教的壓力。成為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國家的日本，開始準備侵略戰爭。為了戰爭，日本動員殖民地，對韓國的基本統治方針成為「內鮮一體」。日本政府並且採取「皇國新民化政策」，即把韓國人變成日本人的政策，要求對日本天皇忠誠，該要求也體現在宗教方面。具體而言，1940年施行的宗教團體法要求，各個宗教都要對日本天皇忠誠。不忠誠於天皇的基督教，即成為了反國家的宗教，受到日本政府的壓迫。日本政府希望把韓國基督教與外國傳教士、傳教團體斷絕，變成日本式基督教。日本政府的目標是，加強對傳教士的管制，接收傳教士的運營機構與事業，斷絕韓國教會從西方教會獲得財政幫助。對於日本政府的態度，韓國基督教按照各教派的神學、所屬集團性格、民族認同感、利害關係等作出多種反應。⁷⁵

與在中國佔領區中的政策類似，日本政府對朝鮮半島基督教的政策是整合各教派。為此，韓國教派試圖實行教派聯合，但因為監理教派方面提出的「為了消除舊約出現的猶太思想，再制定舊約的新解釋教材。」的主張而失敗。此後，各教派逐漸出現了

⁷² 同註52，43, 52

⁷³ 박응규. (2019). 교회와 국가관계를 중심으로 본 3·1운동과 한국교회. *생명과말씀* 23(1). 181-184
[Edward UngKyu Pak. (2019). March First Movement and the Korean Church from a Perspective of Church and State Issue. *Life and Word* 23(1). 181-184]

⁷⁴ 當時三一運動爆發之前，日本政府只以武力統治朝鮮，但是1919年3月1日，三一運動爆發後，日本政府改變了統治方式，使用了胡蘿蔔和鞭子政策。對朝鮮人採取了引進普通警察、穩定國民生活等柔和政策。該統治方式交文化統治。

⁷⁵ 同註64，244-250

順應與聯合對日本政策維持教派的教會領導人與信徒。⁷⁶ 他們的代表行動是，鼓勵年輕人參與戰爭，根據日本政策，在教會內表現對天皇的忠誠。

最突出的事件是日本強行要求參拜神社(Shinto religion)。強迫參拜神社開始於1935年。基督教主張唯一神宗教，因此不能供奉其他神。但是，日本強迫朝鮮基督教徒參拜神社，鎮壓了大多數朝鮮基督教徒，並驅逐了外國傳教士。⁷⁷ 日本政府對學校送出公文，命令學生們要參拜神社，若反對參拜，學校即停止運營或關閉。神學院或教會，根據神學上的差異出現了不同態度。比較開放的，採取逐漸接受參拜神社，比較保守的，認為參拜神社是背叛行為。但是外國傳教士中並不存在積極贊成參拜神社。此後隨著美國與日本的戰爭臨近，美國建議各個傳教團體的傳教士撤退，大部分的傳教士於1949年從韓國撤退。⁷⁸

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韓國成為獨立國家。美國許多傳教士又回到了韓國。此時最大的課題是，解決日本帝國主義強佔時期存在的問題。其中，對協助日本的人士，進行搜查和處罰，是社會關注的事情。但當時統治韓國的美軍政廳，對日本人評價高於韓國人，並保留日本帝國主義時代的制度與官僚體制。美軍重用的韓國人中基督徒比較多，因為大部分基督徒具有親美的傾向，能說英語，而且在美軍政廳工作的傳教士推薦了基督徒。由於當時的社會狀況，韓國基督徒較難保持政治中立的態度。另外，當時的代表性領導人金九(1876.8~1949.6)、金奎植(1881.2~1950.12)、李承晚(1875.3~1965.7)都是基督徒，呼籲韓國基督徒給予政治支持，基督徒不得不參與政治。此後，美國和蘇聯開始施行託管，但韓國人對此的反對，以及美蘇之間的矛盾，導致託管破裂，蘇聯掌握北韓，美國掌握了南韓。因此，當時在北韓的反社會主義基督教人士逃到了南韓。⁷⁹

但是1950年韓國戰爭爆發，北韓因為共產化，基督教消失了。逃至南韓的基督教領導人成為極端的反共主義者。因此南韓基督教界、包含天主教在內表現積極協助韓

⁷⁶ 金仁洙. (1994). 韓國基督教會史. 首爾：韓國長老教出版社. 293-295

⁷⁷ 同註52，62-66

⁷⁸ 同註64，261-267

⁷⁹ 同註64，278-284

戰的態度。南韓的新教界為了戰爭的勝利，對美國政府發出請求幫助韓國的呼籲書，並派遣留美的人士說明戰況，請求國際社會的支援。由於韓戰，出現了許多死傷者與難民。韓國社會物質缺乏，傳教士與韓國教會提出了救助要求，外國民間團體也積極響應。大部分的外國團體是西方的教會以及基督教團體。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德國等西方的救助團體在韓戰時期均積極支持救援活動，其中美國教會所屬的團體最多。此後，韓國人的想法裡，新教信徒之間開始將美國視為「恩人之國」，因此韓國教會積極地加強反共主義與親美主義。⁸⁰

韓戰時期，南韓的教會產生巨大的發展，因此教會的結構也發生變化。首先，韓國教會成長的原因有三種。第一是，在北韓建立共產主義政府，鎮壓基督教，北韓的基督徒南下，所以南韓的教會得以成長。第二是，戰爭使民眾在現實中感到絕望，更加尋求於超越性的存在。對超越性的依賴提高宗教熱情，自然而然導致教會的成長。第三是，從教會開始的救濟工作，給一般民眾留下了積極的印象，因此許多人來到教會。結果，戰爭時期的教會，不僅被基督徒認為是救濟機構，也被非信徒認為是救濟機構。⁸¹

韓戰引發了韓國教會的地區格局變化。日本帝國主義時期與解放之後，基督教會的中心地區是平壤等西北地區。但是，隨著北韓的基督徒南下，基督教的中心變成首爾、京畿道地區。來到南韓避難的北韓人想要建立他們故鄉的教會，成為1950年代韓國教會成長的催化劑。另外，韓戰也使傳教地區的分割協定解體。韓戰發生之前，以傳教士的教派分割傳教地區。這是為了避免傳教士之間的競爭，進行有效的傳教。⁸²但是由於韓戰，所有教派遍佈全國，可以自由地建立教會。韓戰也導致韓國教會領導人的變化。韓戰時期，南北韓的教會領導人遭受了殉教或被強制綁架的損失。因此，

⁸⁰ 同註64，286-292

⁸¹ 박보경. (2010). 1950년 한국 전쟁 당시 한국 교회의 역할. *선교와 신학* 26. 127-131
[Bokyoung Park. (2010). The Role of Korean Church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of 1950. *Mission and Theology* 26. 127-131]

⁸² 주승민. (2019). 미국 남장로교회의 한국선교에 관한 소고. *신학과 선교* 55. 10
[Chu Seung Min. (2019). Mission Strategy of 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Korea. *Theology and Mission* 55. 10]; 監理教(The Methodist Church)：美國南監理教擔當江原道的2/3，沿岸、海州、元山以南地區。美國北監理教擔當平安北道、大川、博川、延邊、江原道1/3，首爾南部地區、忠南地區。長老會(Presbyterianism)：美國北長老會擔當關西地區，加拿大長老會擔當關東地區，美國南長老會擔當忠清道、全羅道。

教會的領導出現了不足，該情況成為教會分裂的一個因素。⁸³

韓戰對韓國教會產生的最大影響是，保守信仰與反共思想的強化。其原因分為兩種。第一是，南韓人的共產主義體驗。1950年6月，北韓的攻擊開始韓戰。由於當時南韓政府未能快速應對，所以北韓軍隊迅速攻到首爾。南韓人從1950年6月28日到9月28日經歷共產主義的統治，當時的經歷對反共主義產生了影響。第二是，逃到南韓的北韓基督徒的影響。韓戰時，超過1/3的北韓基督徒為了躲避共產主義的鎮壓，而逃到了南韓。結果，北韓的反共主義信仰狀態，以及逃至南韓的北韓基督教領導人的存在，對南韓教會產生了影響。這種反共思想成為後來掌握政權的軍事獨裁時期的領導人與教會聯合的契機，以政教聯合的形式出現。⁸⁴

在南韓基督教逐漸成長。教派經歷了分離和統合過程，基督教對民主化過程也產生了影響。尤其是1960-1980年代，韓國新教的成長迅速。1960年代以後的30年間，教會數增加了7倍，信徒數1980年代接近650萬人。成長的原因是隨著新教派的流入，新教的領域擴大，現有的教派也大幅增加。同時，韓國的政治情況也是教會成長的一個原因。當時韓國正處於軍事獨裁時期。朴正熙與全斗煥總統執政時期，實行了軍事獨裁和經濟快速開發相結合的「開發獨裁」。經濟快速發展情況導致韓國國民的社會不安、相對剝奪感增強。城市化的開發使感到不安的民眾在教會中產生了歸屬感與認同感，這種情況成為教會在城市中成長的原因之一。

政治經濟情況也對韓國交互成長產生了影響。隨著經濟發展，在社會上物質主義與成功主義的思想蔓延。教會承諾物質上、現實上的祝福，並肯定祝福人們的社會以及經濟的需求。這一時期，在美國發生的教會成長理論與資本主義的成功理論傳入韓國，韓國教會成為具有目標和希望的集團。另外，許多教會自己開發教會內部的活動，信徒們的歸屬感和自發性也得到了提高，成為韓國教會成長的因素。但是追求物質成

⁸³ 허명섭. (2004). 한국전쟁과 한국 교회 구조의 변화. 한국기독교신학논총 35(1). 156-161

[Myung Seob Heo. (2004). Korean War and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the Korean Church. Korean Journal of Christian Studies 35(1). 156-161]

⁸⁴ 장규식, 유관지. (2006). 군사정권기 한국교회와 국가권력.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24). 106

[Chang Kyu Shik, Ryu gwan ji. (2006). Church and State during the Military Regime: Alliance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Overcoming of the past.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 (24). 106]

長的教會面貌，亦導致教會之間的競爭，引發只追求教會自身利益的極端教會主義。⁸⁵

韓國基督教裡，形成了稱為「福音機構」(Para-church)的組織，並形成了制度之外的多種組織，幫助教會成長，而且因教會成長增加更多活動。Para來源於希臘語($\pi\rho\alpha\rho\alpha$)，具有旁邊、附近的意義。所以福音機構(Parachurch)意味著教會的旁邊的意思。福音機構是指不屬於特定教派，在廣義上共享基督教認同感的人們，為了共同的信仰目標而聚集成立的組織。代表性的團體是，以大學傳教為中心成立的學院傳教團體。在韓國形成的團體是，1950年代開始的學生信仰運動(학생신앙운동：SFC, Student For Christ), JOY傳教會(조이선교회：JOY, Jesus first Others second You third), 1960年組織的大學生聖經閱讀傳教會(대학생성경읽기선교회：UBF, University Bible Fellowship), 1970年設立的愛心傳教會(한사랑선교회)。從海外引入的團體是，韓國基督學生會(한국기독교학생회：IVF, Inter-Varsity Christian Fellowship)，大學生宣教會(대학생선교회：CCC, Campus Crusade of Christ)等。雖然各個傳教團體都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具有超教派、保守性，以及傳教目標的相似之處。⁸⁶

此後，基督教在韓國不斷成長。另外韓國基督教會亦參與學校教育、社會福利等多個領域；各教派、各教會進行多樣的活動。但在進行社會上重要活動時，韓國基督教界透過基督教聯合團體進行參與社會活動。⁸⁷ 根據韓國2021年宗教現狀統計，佛教佔16%，基督教佔17%，天主教佔6%。⁸⁸ 進入21世紀後，教會內部出現了保守與開放勢

⁸⁵ 同註64，320-327

⁸⁶ 同註64，328-330

⁸⁷ (2018). 2018年韓國宗教現況. 《文化體育觀光部》. 23-24
：以2018年為標準，教派勢力較大的教派是，大韓耶穌教長老會(統合)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Korea], 大韓耶穌教長老會(合同) [The General Assembly of Presbyterian Church in Korea], 大韓耶穌教長老會(高神)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Korea (PCK: Kosin)], 韓國基督教長老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Republic of Korea], 基督教大韓監理會 [Korean Methodist Church], 基督教韓國浸禮會[The Korea Baptist Convention], 基督教大韓聖潔教會[Korea Evangelical Holiness Church], 耶穌教大韓聖潔教會[Jesus Korea Sungkul Church], 基督教大韓하나님省會[The Assemblies of God of Korea, 純福音教會]。聯合機關有韓國基督教總聯合會[Christian Council of Korea, CCK]、韓國基督教教會協議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 in Korea, NCCCK]、韓國世界傳教協議會[The Korea World Mission Association, KWMA]等。

⁸⁸ 한국인의 종교 1982-2021(1) 종교현황. 조사일: 2021/4/7. <한국갤럽갤럽리포트> [韓國人的宗教 1982-2021(1) 宗教現況, 調查日: 2021/4/7, 《Gallup Korea》]]
<https://www.gallup.co.kr/gallupdb/reportContent.asp?seqNo=1208>

力的分裂，對於中國以及北韓問題的立場不像過去一樣壁壘分明了。而且由於指向大型教會的態度，受到了「只追求成長的宗教」的批評。⁸⁹ 因此，現代韓國教會正在思考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透過最近出現的新冠病毒(Covid-19)而無法群聚的情況，正在摸索教會今後如何前進與應用的新途徑。

第二節 韓國的海外傳教歷史

最早期韓國海外傳教士是為國外韓國教會服務的。1919年「三一」運動以後，許多韓國人為了躲避日本帝國主義的鎮壓，以滿洲為中心，移居到周邊地區和俄羅斯沿海地區。當時韓國的基督教由外國傳教士管理，但是作為傳教士，韓國人被派遣到了中國。⁹⁰ 日本殖民統治開始後，韓國民族運動家所在的中國上海和南京也成立了教會。⁹¹

韓國社會接受基督教後，時隔約17年正式派遣了傳教士到海外。⁹² 但是作為韓國人，通過教會或教團的傳教部，對於正式派遣海外的第一位傳教士的觀點有所不同。首先，衛理公會(監理教, Methodism)將1903年派遣洪承河(1863-1981)到夏威夷視為第一個海外傳教。當時屬於衛理公會的「仁川內裏教會」，為了服務在夏威夷的韓國人派遣洪承河前去傳教。由於不是外國人對象，傳教士的稱呼也頗有爭議，但歷史學家們重視他是韓國教會最早派到海外的人，將他分類為傳教士。⁹³

長老會的傳教士派遣不僅針對韓國人，也針對外國人。1912年9月，在平壤長老會神學院成立了韓國的長老教總會。總會成立後，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開始海外宣教。⁹⁴

⁸⁹ 김성건. (2013). 고도성장 이후의 한국교회.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 38. 14-21

[Kim Sung Gun. (2013). The Korean Protestant Church after Its Rapid Growth: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 (38). 14-21]

⁹⁰ 同註64，189

⁹¹ 同註64，195

⁹² 同註68，278

⁹³ 同註68，283-284

⁹⁴ 同註76，192-193

1907年，長老教會創立獨立的長老中會(Presbytery)時，派遣李基豐(이기풍, 1865~1942)傳教士前往濟州島。若衛理公會(Methodist)的洪承河非被認定為首位傳教士，李基豐則成為韓國第一位牧師和傳教士。⁹⁵ 1913年長老會總會指派朴泰魯(박태로)，史秉淳(사명순)，金永勳(김영훈)為中國山東省傳教士。但他們並沒有完成傳教的任務。朴泰魯因患病提早回韓國，另外兩個人因財政問題與宣教地環境問題，離開傳教地。1917年5月，長老教總會再次派遣「朴泰魯」和「方孝元(방효원)」前往中國，方孝元意識到山東省傳教的必要性，要求派其擔任山東省的傳教士。此後，方孝元和家人在山東開始了傳教活動，他的兒子和女婿也持續擔任山東傳教工作。⁹⁶ 這期間，長老教會比韓國的其他教派更早對外國人傳教，因此從傳教學(Missionology)的角度而言，長老教會是最早正式向海外派遣傳教士的教派。⁹⁷ 韓國長老教神學大學的歷史神學教授金仁洙，說明選擇山東省的理由如下：

「山東是孔子和孟子出生的地方，美國傳教部是唯一一個在這裏經歷着傳教困難的地方，我們總會認為與其去別人成功的地方，還不如去沒有業績的地方，所以選擇了那裏。」

「為了外國民族派遣傳教士，就是確認我們教會的存在，在國家消失、韓國人和日本人一樣被對待的殖民時代，這是韓國認同感的最佳方法。」⁹⁸

所以，金仁洙也主張派遣傳教士對外國人傳教，培養韓國認同感的最佳方法。

根據韓國基督教傳教歷史研究者的主張，中國與韓國具有文化上的相似性，地理位置接近也是原因之一。國際關係上，山東省是最容易交涉的地區，中韓兩國國民也自由往來。同時，山東省是在韓國具有最大影響力的美北長老教會(American Presbyteri

⁹⁵ 同註68，286

⁹⁶ 同註68，290-291；方孝元的家人，因為世代在中國傳教比較有名。方孝元(방효원, 1886~1953)是長老會總會派送的首任中國傳教士，在山東省萊陽上任，以後建立南關教會(남관교회)。1937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被日軍抓獲釋放，此後繼續在上海傳教。1945年回國，身在北方，但因共產黨的迫害而逃到南方。方之日(방지일, 1911~2014)是方孝元傳教士的兒子，從1937年到1957年，也被派遣到中國成為傳教士，在山東省活動。1957年，中國共產黨試圖把他驅逐到北韓(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但西方媒體把方之日成為「留在中國的最後一位基督教傳教士」，所以方之日才得以返回韓國。

⁹⁷ 同註68，289-290

⁹⁸ 同註76，193

-an Mission North，簡稱PN)傳教士最活躍的地區。因此，韓國長老會在派傳教士時也首先考慮山東地區。

山東地區的長老教傳教活動以萊陽和即墨為中心。女傳教士也提供了很多支援。1921年在內陽建立聖經學院，培養中國本土傳道者。當時朝鮮長老會從傳教初期開始，就採取了幫助中國教會的方式，而不是單獨創立教會。因此，建立的所有教會和傳教士都屬於中國教會。⁹⁹

基督教大韓聖潔教會(기독교대한성결교회, Korea Evangelical Holiness Church)也對外派遣傳教士。長老教會和監理教會比聖潔教會更早派遣韓國傳教士到海外。但是筆者觀察韓國聖潔教會海外傳教歷史的意義在於，派遣韓國傳教士到中國時，與長老教會一樣，始於較早的時期，因此想了解一下。1907年韓國聖潔教會成立後，1925年向滿洲派遣最早的傳教士。¹⁰⁰ 該教會傳教士的對象是當時因政治、經濟原因前往滿洲的韓裔僑胞，也包括對中國人。1933年派在京城聖書學院就讀的李獻永(1901~1970)建立了上海教會。但由於日本的鎮壓，李獻永於1938年回國，上海教會關閉。此後，1941年再次派遣傳教士前往，但因日本不發給護照，未能前往，在中國共產黨建國後更難進入。¹⁰¹ 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後，又出現重新進入中國的機會。聖潔教會中有1989年首次到中國留學的韓國傳教士。¹⁰² 此後，從1993年開始，許多傳教士都可以去中國，在各個領域工作。

總體而言，在1910年代以後韓國大多數教派，對海外的韓僑或外國人已經派遣了傳教士。但是，韓國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時，傳教活動受阻。韓國成為獨立國家後，隨着韓戰的爆發，南韓與北韓被分割，比起海外傳教，更關注國內問題。

韓國教會隨着韓國經濟的增長一起成長。因此，傳教士的對外派遣也逐步增加。1979年韓國教會派遣的傳教士為93人，1996年達到4,402人，2002年達到1萬人以上，2009年超過了2萬人。這意味著2000年代以後，韓國教會是繼美國教會之後世界第二大派

⁹⁹ 同註64，196

¹⁰⁰ 同註40，68

¹⁰¹ 同註40，78

¹⁰² 同註40，79

遣至海外基督教傳教士的國家。1980年代，隨著韓國基督教成長而出現Parachurch的增長，是海外傳教擴散的原因。因為隨著海外傳教專門團體與學院傳教團體的進入韓國，海外派遣的傳教士的數量有所增加。另外，教會的人才、物資日益豐富，基督教徒的自信感與使命感也日益增加，海外傳教活動更加活躍。當時韓國的國家成長力與國際政治上的變化，也對韓國教會的海外傳教產生了影響。隨著韓國在政治、經濟上進出海外，1960年代集中在東南亞地區的海外傳教，在1980年代擴展到非洲、中東、印度等地區，1990年代後又擴大到了東歐與中國。尤其是，1990年韓國與蘇聯建交、1991年蘇聯瓦解與冷戰解體、1992年韓國與中國的建交等，國際政治因素以及1989年韓國政府的海外旅行自由化政策、1997年人均國民收入突破1萬美元等國內因素，可以看作是韓國傳教士增加的具體因素。¹⁰³

馬林·尼爾遜(Dr. Marlin L. Nelson, 나일선 박사)從1979年至1988年研究韓國傳教現狀，每兩年統計一次，傳教士人數與傳教團體以及派遣國家數。在韓國傳教研究院(Kore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Mission, KRIM)，這些統計仍在延續。

表 4-1. 1979年首次統計與2006年韓國教會傳教士派遣數及派遣國現狀比較圖表

| | 傳教士 | 傳教團體 | 派遣國家 |
|------|--------|------|------|
| 1979 | 93 | 21 | 26 |
| 1989 | 1,178 | 66 | 72 |
| 1998 | 4,402 | 113 | 145 |
| 2006 | 14,905 | 174 | 16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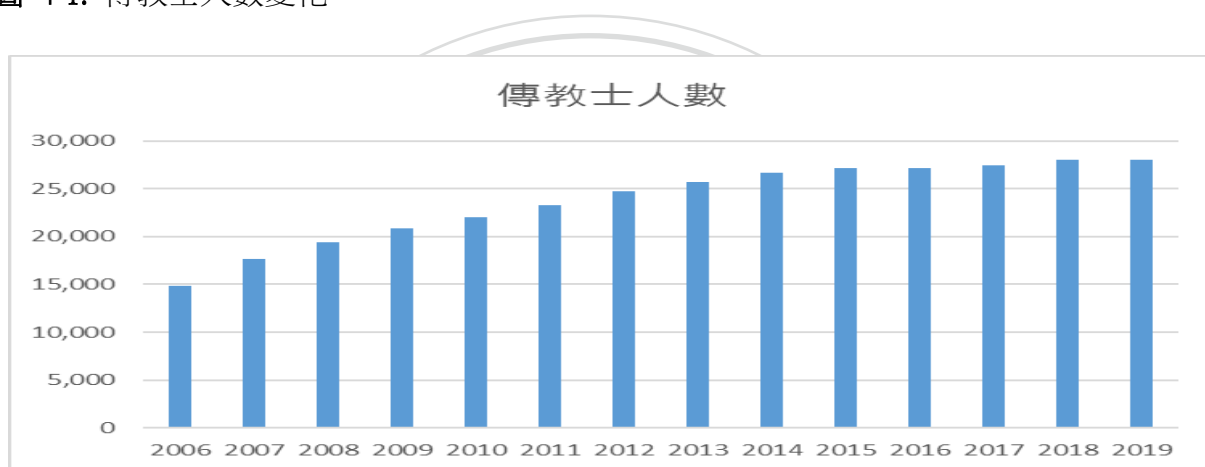
來源：Jung Jae-yong. (2008/4/3). 28年間海外傳教士的派遣增加了160倍. 《Igoodnews》
<http://www.igoodnews.net/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9022>

韓國世界傳教協議會(The Korea World Mission Association, KWMA)，從2006年開始每年都在調查韓國傳教士的派遣現狀。KWMA是韓國教會和各教派的傳教部、傳教團體

¹⁰³ 同註64，331-332

合作的傳教聯合會。統計調查採用在線上或文件形式接受回信，未回信或存在錯誤時，透過電話或電子郵件進行補充統計資料。雖然調查對象每年略有差異，但韓國傳教團體和教派加起來約有200多個。調查的局限性是，如果一名傳教士在教派和傳教團體上都登記時，就出現重複現象，另外，傳教士的概念在各教派和傳教團體中有所不同，因此可能會出現回答的差異。但是這些問題從2020年的統計資料開始，透過對傳教士的操作性定義來解決。

圖 4-1. 傳教士人數變化



來源：作者整理各項資料來源

從2000年以後開始，韓國對外派遣了超過萬名傳教士。派遣傳教士人數呈現持續增加的趨勢，但2015年以後增幅不大。¹⁰⁴ 在2019年的統計調查中，最顯著的特徵是：包括教團在內的傳教團體，正在進行自我淨化工作。看數字的變動，似乎沒有多大差別，但實際上，正在把重複的人數與虛數加以整理。¹⁰⁵ 儘管如此，教團傳教士呈現持續增加。

¹⁰⁴ 具體的數字如下：2015年 27,205名，2016年 27,205名，2017年 27,436名，2018年 27,993名，2019年 28,039名

¹⁰⁵ 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KWMA, 1

表 4-2. 前3位教派傳教部的傳教士派遣現狀

| 教派傳教部 | 2016年 | 2017年 | 2018年 | 2019年 |
|-------|-------|-------|-------|-------|
| A教派 | 2,474 | 2,521 | 2,549 | 2,557 |
| B教派 | 1,491 | 1,552 | 1,562 | 1,581 |
| C教派 | 1,443 | 1,475 | 1,536 | 1,549 |

來源：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KWMA，1

全體韓國傳教士的50%以上在亞洲地區活動。其中需要觀察的是東北亞地區，包括與韓國相鄰的國家。過去2017~2019年間在該區域內有過非自發性的移動。與2018年相比，減少了約400人，這說明傳教士存在隨時準備移動到其他國家的特性，所以也可能包括存在非自願撤離的情況。2016年~2019年各洲傳教士人數如下表。¹⁰⁶

表 4-3. 各區域活動傳教士人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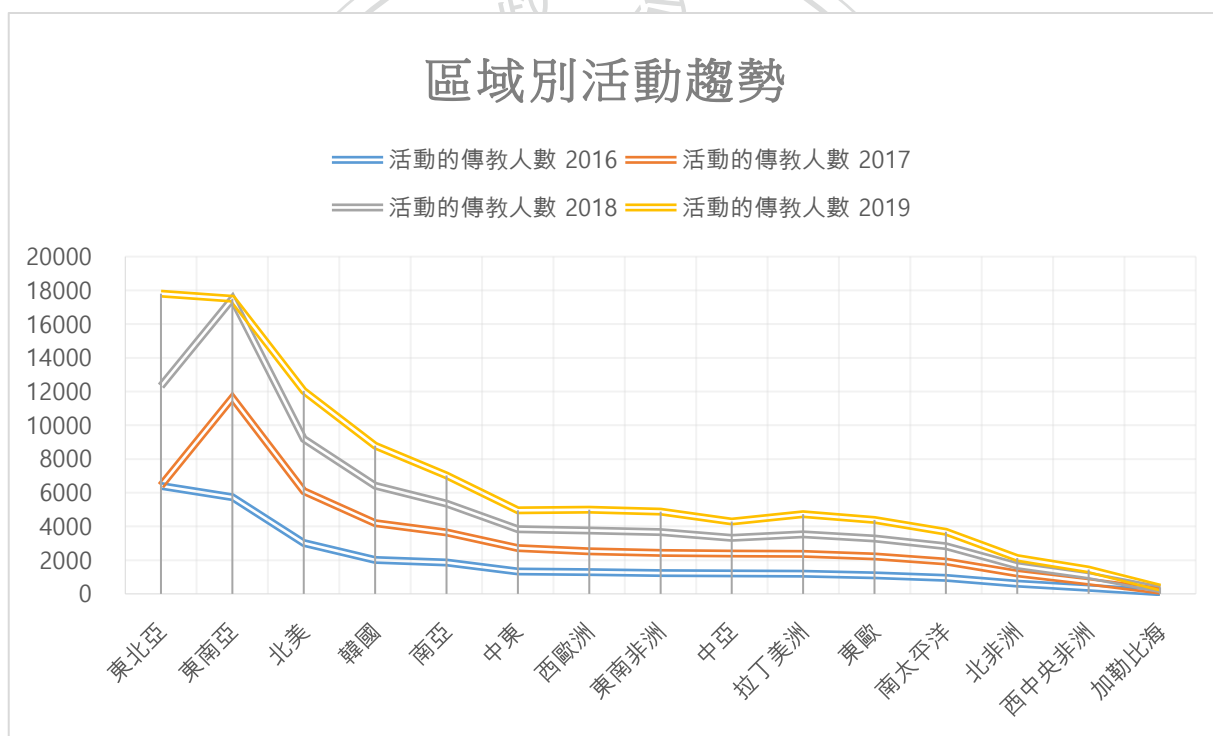
| 區域 | 活動的傳教數 | | | |
|------|--------|-------|-------|-------|
|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 東北亞 | 6,402 | 6,319 | 5,916 | 5,479 |
| 東南亞 | 5,739 | 5,893 | 5,865 | 6,021 |
| 北美 | 3,015 | 3,075 | 3,103 | 2,834 |
| 韓國 | 2,011 | 2,185 | 2,223 | 2,371 |
| 南亞 | 1,858 | 1,792 | 1,707 | 1,662 |
| 中東 | 1,336 | 1,388 | 1,110 | 1,116 |
| 西歐洲 | 1,282 | 1,240 | 1,243 | 1,228 |
| 東南非洲 | 1,231 | 1,205 | 1,222 | 1,223 |
| 中亞 | 1,218 | 1,181 | 930 | 962 |

¹⁰⁶ 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KWMA, 3

| | | | | |
|-------|-------|-------|-------|-------|
| 拉丁美洲 | 1,199 | 1,170 | 1,166 | 1,184 |
| 東歐 | 1,107 | 1,110 | 1,070 | 1,089 |
| 南太平洋 | 952 | 959 | 918 | 862 |
| 北非洲 | 610 | 611 | 441 | 461 |
| 西中央非洲 | 354 | 366 | 357 | 364 |
| 加勒比海 | 99 | 90 | 91 | 93 |

來源：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KWMA，4

圖 4-2. 各區域別活動趨勢



傳教士的統計是瞭解和檢查目前韓國傳教現象、確定日後傳教方向。但是，這還不包括非會員教會派遣的傳教士。實際上，去宣教地就能發現，傳教士的活動數量比公共統計資料還多。在這一點上，準確性是有限的。¹⁰⁷

¹⁰⁷ 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KWMA，7

根據首爾基督大學傳教學教授Kim Seong Hwan，對中國的傳教大致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段時期是，1910年代開始的韓國長老會中國山東省傳教。第二段時期是，從1949年到1992年。屬於這一時期的文化大革命期間，所有教會都轉往地下。改革開放開始後，中國政府承認在文革時期的錯誤，對宗教也表現出逐漸開放的態度。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三自教會的重新誕生。但是中國政府沒有停止對家庭教會的鎮壓，也不允許外國人傳教。因此，韓國教會也無法正式在中國傳教。取而代之的是，透過國外的中國華僑基督徒，秘密幫助在中國家庭教會的方法。可是由於當時韓國國內發生的各種問題，韓國教會的力量分散，無法持續進行傳教活動。

以長老會為例，1955年派遣了一名長老會總會傳教士，但此後很長一段時間未再派遣韓國傳教士。該時期在中國的傳教方法是，以各教會為中心的傳教方法。另外，進行了將香港作為前哨基地的傳教活動。韓國教會透過香港韓國人教會，將《中文聖經》送往中國大陸，並幫助當地的中國人。另一種方法是，透過廣播進行傳教，以華僑為中心進行傳教。且逐漸增加對中國傳教的關注，而於1989年10月成立了中國語言傳教士團體。該團體發行《中國走向主》雜誌，介紹中國基督教的情況。¹⁰⁸

第三段時期是，從1992年到現在。改革開放以後快速發展的中國，城市化成為重要問題。因此，海外傳教團體與個人開始影響中國的家庭教會，促成家庭教會的成長。中國政府在與韓國建交時，對韓國教會的傳教熱情抱有戒心。儘管如此，中國教會的信徒仍不斷增加，中國政府追求建設中國的神學。2013年中國政府發行的簽證期間，從一年單位改為3個月，甚至需要具共產黨員身份的保證人。1990年代初期，韓國傳教士中幾乎沒有精通中文的人，因此，以朝鮮族為中心進行傳教。1989年成立「中國福音傳教會」(중국복음선교회)、「中國語言傳教會」(중국어문선교회, **China to God**)，1992年也成立「中國研究協會」，以傳教團體為中心推行中國傳教，並且透過1995年成立的「TWR Korea」(북방선교방송, 北方傳教廣播)，持續進行廣播傳教活動。¹⁰⁹

改革開放以後，根據1994年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韓國人可以建立韓國人的教會。因此，2004年從北京等大城市開始正式成立韓

¹⁰⁸ 同註41，50-63

¹⁰⁹ 同註41，64-73

國人教會，並公開聚集在。另外，在韓國聚居的地區，透過韓國文化中心或者韓國圖書館等文化途徑，或者是設立孤兒院、養老院等社會福利設施，進行半公開的傳教活動。¹¹⁰ 但是，大部分的韓國傳教士是，與家庭教會一起合作。迄今為止訪談的傳教士們表示，大多與家庭教會聯合進行禮拜、教會音樂指導、家庭教會神學院支援等活動。一位傳教士說：「由於三自教會與神學教義的差異，聯合起來並不容易，但家庭教會相對少受到政府的壓制，而且對政府要求神學教義的接受性較低，所以較易聯合起來。」¹¹¹

第三節 韓國教會的傳教方法與政策

很早開始，韓國教會的傳教就具有混合東西方文化的特色。韓國教會初期派遣傳教士到山東時，朝鮮長老會傳教士韓煒廉(한위렴 William B. Hunt)與美國傳教部協商，將美國負責的其中一處移交給韓國教會，並決定將其移交給萊陽縣。對於萊陽縣傳教，韓國教會提出了5個正式政策。第一，因為孔子的儒學，韓國成為有禮貌的國家，所以為了報答，選擇山東作為傳教地。第二，感恩節的捐款作為傳教費使用。第三，朝鮮長老會決定派遣三位牧師傳教。第四，給傳教士們配備了中文老師，讓他們學習中文。第五，在中國當地教會登記了韓國傳教士。同時非正式地使用了倪維思政策。¹¹²

倪維思政策是，美國傳教士倪維思(John Livingston Nevius, 1829-1893)介紹初期在韓國的美國傳教士的方法。倪維思原來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1880年6月，輪休年(sabbatical year) 休假去美國之前，應在韓國的長老會傳教士的要求，在首爾講授自己的傳教方法論。他的主要傳教方法是，以三自原理為代表的自立(self-supporting)、自治(self-governing)、自傳(self-propagating)原則。¹¹³ 自立是指傳教地的教會，不依賴外國傳

¹¹⁰ 김석주. (2016). 개혁 개방 이후 중국교회 현황과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 기독교사상 696. 79-80 [Kim Suk joo. (2016). The Status of Chinese Churches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and the Missionary Mission in China of Korean Churches. Christian though 696. 79-80]

¹¹¹ 作者放談，訪談人1，台灣，2021年 2月6日

¹¹² 同註41，43-45

¹¹³ 三自原理：韓國的三自與中國的三自是類似的概念(Self-supporting, Self-governing, Self-propagating)。英文翻譯是一樣但是「Self-supporting」翻譯到韓文是「自立」，中文是「自養」。韓國的「三自

教士的資金，而應該由財政獨立運營的原理，自治為非由傳教士，而是由當地人的領導來運營教會。¹¹⁴ 倪維思政策的最大的特徵是，以傳教地區的人士為中心。當時在韓國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認為，該政策有助於韓國的情況，決定韓國人以教會運營與傳教活動為中心，傳教士負責管理整體事務。

倪維思政策適用於韓國後，前往中國的韓國傳教士，在山東省適用該政策，取得了成功。其原因是，透過儒家的禮貌，與中國官員建立良好關係，為培養中國宗教領導人而努力，並專注於女性事務等。

山東已適用自立、自治、自傳的傳教方式。對於當時在山東省進行的韓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學學者評價其優點與意義。最大的特點在於，人口少於中國的韓國，首先向中國派遣傳教士，而接受基督教還不到30年的韓國派遣傳教士。因此，要提前研究與考察山東省的情事，派遣三位傳教士時，將該地區分成三等分，排除彼此之間的紛爭，不僅派遣牧師，還派遣醫生與老師。另外，傳教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資源由韓國教會支援，並培養當地人牧師，動員本土傳教士，非與中國教會分離建立教會，而是歸屬於中國當地教會而建立了教會。¹¹⁵

1960-1990年代，韓國教會的迅速成長，傳教士的派遣也隨之增加。這一段時期，倪維思政策的適用仍在繼續。當時傳教方向大致可分為三種。第一是，如果1960年代之前傳教是教派中心，1960年代以後的傳教是，地區教會掌握了主導權。第二是，教

原則」是，美國長老教會的傳教士對韓國人傳教的方法，中國的「三自原則」是，中國教會自主自辦管理教會的方法。

參考：박만준, 마민호. (2021). 기독교 삼자의 중국과 한국 토착화 과정에서 본 국가적 상이성 연구-네비우스 전후 종교 국가 사회관계의 변화를 중심으로. 복음과 선교 56(0). 37-77

[Park ManJun, Ma Min Ho. (2021). The Research of Dissimilarity between Korean-Sino Naturalization on the Propagation Process of Christian Three Self Formula: in a Focus of Changing Religion Stat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 before and after Nevius. Journal of Korea Evangelical missionological society 56(0). 37-77]

¹¹⁴ 김은수. (2008). 한국교회 해외선교정책.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28). 8

[Kim Eun Soo. (2008). A Typological Study on Korean Churches' Overseas Mission Policy.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 (28). 8]

¹¹⁵ 우심화. (2012).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에 대한 진단과 제언. 기독교사상. 61-62

[Yu, Shin Hwa. (2012). Diagnosis and suggestion for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by Korean churches. Christian thought. 61-62]; 김영동. (2004). 한국 교회의 선교—선교초기부터 6.25이전까지. 선교와 신학 14. 53

[Young Dong Kim. (2004). Korean Churches Mission: From the Early Mission Period to the Korean War (6.25). Mission and Theology 14. 53]

派傳教部與傳教團體將曾是傳教士聘請為傳教專家，開發新的傳教政策與行政。第三是，為了保證傳教費的順利管理，追求開發系統化等新方法。2000年代以後，韓國成為繼美國之後派遣傳教士最多的國家。因此，從1991年以後，韓國傳教士與外國傳教團體以及傳教士之間出現了合作的必要性。另外，不僅以傳播基督教為目的，還對傳教地的社會情況提供幫助。¹¹⁶

目前，韓國傳教士以倪維思政策為基礎，在各地傳教。根據各國情況適用不同的傳教方法。但是，各地區傳教士的代表性活動細節都差不多。大多數傳教士都是有牧師背景，因此開拓教會佔了最大的部分。之後是訓練當地人傳教及動員、社會福利與開發地區、大學傳教、一般教育、醫療等。此外，也包括兒童·青少年傳教、神學歷史、商業或文化、體育領域等。¹¹⁷ 這種現象在中國同樣適用。可是，在建立教會的情況，中國採用開拓家庭教會或訓練家庭教會領導人的方法。

表 4-4. 傳教士主要活動

| 主要活動內容 | 活動國家 | 傳教士人數 |
|-----------|------|--------|
| 開拓教會 | 155 | 14,526 |
| 當地人訓練與動員 | 143 | 9,442 |
| 社會福利或開發地區 | 91 | 2,500 |
| 大學傳教 | 69 | 1,687 |
| 一般教育 | 89 | 1,663 |

來源：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 KWMA, 5

代表性例子是韓國長老會，自此之前以建設教會與傳教為中心，重視教會的更新與交互之間的合作。並且，以原住民教會設立與培育為中心進行活動，訓練傳教地區的教會領導人、設立與運營神學院等傳教活動。此後，根據海外傳教地區的社會要求

¹¹⁶ 同註46，36-37

¹¹⁷ 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 KWMA. 4

與變化，依不同的領域採取適合的傳教活動。例如，2000年代以後，隨著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日益凸顯，出現了為保護生態環境而活動的傳教士。¹¹⁸

透過這種傳教政策，足以了解韓國教會的傳教的特徵。即是，以各教派為中心的傳教活動、集中在於建立教會與傳道、以未經歷基督教傳教活動為隊形的傳教活動、學習西方國家意志適用的傳統傳教方法的優勢性、以教會為中心的傳教、熱情的態度、膨脹主義傳教政策等等。白石大學(Baekseok University)的Hong Jin Chel教授引用多位傳教學者的文章，整理韓國傳教存在的問題。代表性的有不尊重其他文化、傳教地區裡傳教士之間的競爭、傳教訓練不足、派遣機構與傳教士之間的矛盾、對當地文化的理解力較低、對具有專業領域知識的傳教士不足。¹¹⁹ 因此，韓國傳教學者們提出改善這些問題的必要性。

韓國傳教學者們討論韓國傳教政策的改善。因為，韓國傳教士仍然使用過去西方傳教士的傳教政策，所以不能滿足多樣化現代社會的要求。進入20世紀，韓國教會以非牧師的一般信徒為對象，經歷了兩三週至兩三年的短期傳教活動，即賦予傳教士的身份。但是，2007年 7月，因前往阿富汗的短期傳教小團體的人質事件，韓國教會的傳教方法受到了指責。由於不尊重當地文化與慣例的短期傳教團體的態度，韓國教會內部也感覺到需要改善傳教方法。¹²⁰

儘管如此，20世紀以後世界基督教，從以歐洲與美國為中心的北部轉移到亞洲、非洲、南美洲等，其中韓國基督教的成長收到了世界基督教的關注。¹²¹ 在這種情況下，韓國基督教界想要追求更多樣與專業的傳教方法。尤其是，2020年開始的新冠疫情(COVID-19)，對傳教活動也產生了巨大影響。因此，需要考慮透過媒體傳播的傳教方法，

¹¹⁸ 김영동. (2012). 한국 장로교 선교 100년. 장신논단 44(2). 114-117

[Young Dong Kim. (2012). One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 of the Korean Presbyterian Church: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ission Theology.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44(2). 114-117]

¹¹⁹ 同註29, 14-16

¹²⁰ 김주덕. (2008). 한국 교회와 선교 신학의 상관관계. 대학과 선교 (15). 295-297

[Kim Juduk. (2008). A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in the Korean Church. University and Mission (15). 295-297]

¹²¹ Hickman, A. W. (2014). Christianity's shift from the Global North to the Global South. Review & Expositor 111(1). 44-47

此外還強調開發更多樣方法的必要性。¹²²

在中國進行的傳教方法也需要變化。現有的韓國傳教士在中國也以建設(家庭)教會、校園傳教等為基礎，逐漸在各個領域展開傳教活動。韓國教會內部也越來越多的人主張，在傳教的時候，使用適合當時社會、傳教地情況的傳教方法。尤其是中國，家庭教會存「三多」與「四多」的問題。三多指是，家庭教會大多位於農村地區、信徒大多數是教育水準較低、女性的比率高，再加上老人較多的話，變成四多。另外，在中國教會存在家庭教會領導人神學水準較低、青少年與兒童服務不足、無法解決異端問題等諸多問題。因此，為了中國傳教，韓國教會有必要採取幫助中國教會解決問題。具體而言，韓國教會可以採取新的傳教方法，如訓練中國家庭教會領導人、培養兒童的傳教活動能力、支援神學教育、重新評價少數民族的傳教活動等。¹²³

根據韓國教會的教派或傳教團體，傳教政策也有所不同。筆者採訪的傳教士們表示，不同教派對能做的領域、不能做的領域標準不一樣，所以出現的結果也不同。¹²⁴以長老教會為例，大約有200多名傳教士，與韓國的長老會與中國基督教機構聯合，進行傳教活動的情況，但是呈現越來越減少的趨勢。¹²⁵至於傳教團體而言，根據其性質也會出現不同的特性。帶著攻擊性態度進行傳教活動的傳教團體，雖然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境，但也有以穩健的方式安全活動的團體，包括以公司傳教等方式間接傳教的團體，以大學生為對象的傳教團體，或者為了協助北韓脫北者在中國進行傳教活動的團體。¹²⁶

¹²² 홍강. (2021). 중국교회의 현주소와 중국선교: 중국 신학자들의 신학 사상에 대한 고찰을 중심으로. 선교와 신학 53. 511-513

[Gang Hong. (2021). A Study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hinese Church and the Mission in China. Mission and Theology 53. 511-513]

¹²³ 同註49

¹²⁴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¹²⁵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¹²⁶ 作者訪談，訪談人 3、5，台灣，2021年 3月4日、2021年 11月24日；攻擊性的態度指過度的傳教活動行為。例如，在非基督教國家或禁止公開傳教活動的國家，公開進行傳教活動，或者完全不考慮傳教地區的情況，盲目地進行傳教活動等。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被非基督教國家發現，傳教士、傳教團體、傳教活動會留下負面印象，嚴重時會被強制驅逐。

一位韓國傳教士在講述自己經歷的書籍中，在中國進行的韓國教會的傳教如下：

「中國人口眾多，而且國土廣大，大約15億人口中，有56個民族各自擁有不同的文化、傳統與宗教，無法看作是一個國家與一個民族，不易實施專一的傳教政策。」¹²⁷

由此可以推測，中國需要各城市、各民族不同的傳教政策。更何況，只有先理解中國內部宗教政策，再融合傳教活動，才能穩定地進行傳教活動。



¹²⁷ 김경환. (2017). 씨 뿌리는 자. 서울: 생명나무. 6

[Kim Kyung Hwan. (2017). Seed Sowers—The Story of Chinese Missionary Mission, Seoul: a living tree. 6]

第五章 中國的基督教

第一節 中國基督教的本土化運動歷史

基督教首次傳入中國是，在唐朝太宗時期，由聶斯脫里主義(Nestorianism)者，以景教之名流傳的。景教在唐皇室的庇護下進行傳教活動。因為，當時景教結合已在中國存在的佛教和道教，所以比較容易接近中國人進行傳教活動。但是因唐武宗的會昌毀佛政策，而被退出中國內地。¹²⁸ 此後，元朝時期，以也里可溫教之名重新傳入中國，但隨着元朝的滅亡而消失。明朝時期，天主教透過利瑪竇(Matteo Ricci)的傳教活動正式進入中國。利瑪竇借用儒教的概念傳授天主教，因此能夠以更多的人為對象進行傳教活動。¹²⁹ 但是，由於明朝反對天主教的禮儀，天主教的神父們作為學者可以在中國停留，但無法進行傳教活動。19世紀以後，新教隨着帝國主義的浪潮進入中國。因此，基督教作為外來宗教曾被中國人視為敵對對象，但隨着時間的流逝，基督教徒的數量呈現出增加的趨勢。

中國的基督教雖然展現悠久的歷史，但卻是斷斷續續的重複。在漫長的歷史中，筆者想重點觀察20世紀初，基督教自立運動上的非基督教運動和1950年代開始的三自化運動。

190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始於1919年開始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當時袁世凱為了自己的權力，強調儒教思想，還立以孔教為國教，但同時出現知識分子的反對以及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界的反對，因此國家領導人對宗教產生了興趣。另外，五四運動的知識分子接受西方的科學思想和民主思想，以宗教不科學、不民主、不理性為由，對宗教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此外，由於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多數國家都是基督教，

¹²⁸ 會昌毀佛政策: 會昌是唐朝的武宗時期的年號。該政策是唐武宗時期，佛教被鎮壓的事件。唐武宗5年(540年)，佛教的弊端越來越嚴重，同時武宗信任道教的一位道士，所以決定鎮壓佛教。其結果，全國的許多寺廟被關閉，寺廟的財產也被沒收，僧侶的人數減少了。因此，隋朝、唐朝時期繁榮的佛教受到嚴重打擊。在遏止佛教的同時，外來宗教也成為禁止對象，所以當時景教也別禁止，逐漸消失了。

¹²⁹ 김영호. (2015). 기독교의 중국화에 대한 비판적 연구. 선교신학 40. 50
[Kim Young Ho. (2015). A Critical Study on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ology of Mission 40. 50]

所以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基督教更加反感。¹³⁰

對於當時知識分子對基督教的否定態度，教會反應也多種多樣。教會裡有些人對基督教的反感視為困境，有些人理所當然地以可能出現的態度接受，有些人則漠不關心，以及有一些基督教徒積極地接受對基督教的反感。他們認為，五四運動的新文化運動會對改善社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在這些領域與基督教思想有相似的部分，因此，對中國的基督教也產生積極的影響，實際上對基督教的影響力擴散起到幫助作用。同時，虛心接受外界對基督教的批評，認為透過這些問題中國教會可以探討教會內部存在的問題。¹³¹ 基督教知識分子可以就當時的社會問題上表達基督教的觀點，這在《生命月刊》、《青年進步》、《中華歸主》、《文社月刊》、《真理週刊》等基督教雜誌中發現該主張。¹³²

1920年代中國，從1922年到1927年爆發了三次非基督教運動(簡稱非基運動)。第一階段，是反對1922年4月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大會而出現的。第二階段，是1924年夏天，從教育權回收運動開始，上海某教會學校的學生被退學，對此的反應。第三個階段，是從1925年到1927年發生的事件，與「五卅慘案」和「南京事件」一起出現。¹³³

1992年發生的第一屆非基運動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of China)開始在中國清華大學舉辦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會(World's Student Christian Federation)第11次大會時發生的事件。在準備此次大會時，基督教青年們透過各種雜誌進行宣傳，基督教界也認為，透過此次大會，基督教的影響力可以積極擴散到全中國。但是，對於基督教界的宣傳，上海的學生們表示反對，組

¹³⁰ 同註2，368-371

¹³¹ 同註2，376-378

¹³² 문석윤. (2019). 기독교의 대안: 중국은 어떤 종교를 필요로 하는가—중국 신학의 건설: 1920년대 반기독교운동에 대한 중국교회의 대응. [웹진] 중국을 주제로 (통권 204호). 중국어문선교회 [[Moon Seokyoon, (2019), Alternative to Christianity: What Religion Does China Need?—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eology: The Chinese Church's Response 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1920s, [Webzine] China to the Lord. Chinese Literary Church] http://www.chinatogod.com/main/z2s_c_v.php?no=4414&ctg_no=204&div=2

¹³³ 查時傑. (1984). 民國基督教會史(三) 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1922~1927). 台大歷史學報. 10 & 11期. 379

織《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在北京組織《非宗教大同盟》。這兩個團體都是從反對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開始的，透過激烈的語調發表反對宣言。¹³⁴ 特別是，《非基督教學生同盟宣言》中，基督教的作用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不同，特備強調基督教代表資本主義勢力，起到侵略中國經濟的先鋒作用。同時主張宗教違背人權、違背科學與學術進步、具有反道德的特性，進行非基運動。¹³⁵

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學生同盟第11次大會結束的同時，在中國國內進行的非基督教運動自然而然地減少了其勢力。持續進行非基督教運動的明確名分與目標消失，逐漸表現為消極的抗議。因此，現有的組織逐漸分散，基督教界和社會界對非基運動的反擊也加強，非基運動的參與者大多數是學生，因此隨着學校放假，全部回鄉，人力也出現了減少。其結果，1922年的非基運動似乎逐漸消失。這一時期非基運動的思想已經超出了新文化運動對宗教的批判範圍，從學術範圍轉向政治範圍，從討論方法轉向行動方法。¹³⁶

第二次非基運動發生，在1924年夏天至1925年「五卅慘案」之前。這一時期非基運動爆發的原因，與教育權收回運動有關。初期基督教進入中國時，傳教士們首先設立學校等教育機構。1922年出版的《中華歸主》統計從1900年代開始20多年來中國國內基督教教會、基督教徒、教會學校的學生人數急劇增加，由此，中國人民開始警惕，教會對教育領域的影響力。¹³⁷ 與此同時，受到1922年發生的非基運動影響的知識分子對帝國主義持否定觀點，這對教會學校內部的青年也產生了影響。因此，以教會學校青年為中心，出現中國政府應該收回教育權的主張，不僅是中國國內的國家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也對基督教教育持反對態度。成為最大導火線的事件是，1924年在廣州英國聖公會所屬的學校發生的示威活動。一名學生試圖在學校組織學生聯合會建立學生自治，但當時英國校長拒絕了，因此出現學生的抵抗運動。學生們沒有上課，而是主張：「在學校內爭回機會結社自由機會，反對奴隸式的教育，爭回教育權，反抗帝國

¹³⁴ 同註133，396

¹³⁵ 同註2，380

¹³⁶ 同註2，387

¹³⁷ 同註133，403

主義的侵略」。¹³⁸

從廣州地區開始，各地區的學校都發生學生運動，因此，非基運動在全國範圍內擴散。學生們從對教會學校的敵意開始，擴散到非基運動，在政治方面，透過政黨的刊物來支持和擁護學生，非基運動在全國範圍內逐漸擴散。1924年10月，全國教育聯合會的第十屆年會上通過了黨的方案，將教育與宗教分開、取消外國人在中國國內教育事業的方案。¹³⁹

1924年夏天，上海浸信會書院的學生們，因與學校爭論而被強制退學，他們在上海開始非基運動。當時他們認為有系統組織的必要性，形成了《非基督教同盟》。他們不僅透過文章反對基督教，還直接行動。即是1924年12月22-24日宣佈「非基督教週」，實際上攻擊基督教教會。在全國實行示威，散發傳單和小冊子，以反基督教內容進行演講，並使用擾亂教會秩序的方式。此後，主張非基運動的人正式要求，中國政府建立中國民族主義學校和禁止學校進行信仰教育。¹⁴⁰ 非基督教週時期的行動氣勢和規模，比1922年發生的非基運動更加強烈。但隨着非基督教週的結束，其頂點已經過去，非基運動的影響力逐漸減弱，重新回到收回教育權的問題。¹⁴¹

非基運動的第三個階段是從1925年到1927年。這個時期大體上可以看做五卅慘案和南京事件的背景。五卅慘案開始，從在上海日本紡紗工廠工作的中國勞動者的抗議，於5月30日與贊同這一些勞動者主張的人進行示威。英國軍隊投入鎮壓示威群眾，幾名一般中國人民死亡，因此，這引起中國人對外國勢力的反感，特別是隨着人們認識到基督教是西方帝國主義的先鋒，也帶有反基督教運動的性質。同時，再次強調學生們的教育權回收運動，1924年實行的反基督教週也再次進行。當時中國共產黨從統一戰線的觀點出發，對非基運動進行接觸。中共爲了防止外國勢力擴大影響力，制定包容中國國內基督教界人士的原則，但實際上表現出遏制他們的態度，可見中共對基督教

¹³⁸ 同註133，406

¹³⁹ 同註133，409-410

¹⁴⁰ 김태연. (2017). 한국교회와 중국선교: 2030 중국 글로벌 예측신학. 서울: 기독교문서선교회. 149
[Kim Tae yeon. (2017). The Korean Church and The Mission For China: 2030 Chinese, Global Theostatics. Seoul: CLC: 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 149]

¹⁴¹ 同註133，420

的手段截然相反。¹⁴²

1927年3月24日，國民黨北伐時期國民革命軍佔領了南京。軍人中有幾個人攻擊位於南京的美國、英國的領事館等，對外國人進行攻擊，這擴大到教會、外國人居住地、商業地區等。這導致基督教會的實際損失，成為居住在中國的外國傳教士回到本國的契機。直到這一時期，中國國內零星地開展非基督教運動，基督教遭受的損失也逐漸增加。但1928年5月蔣介石和日軍發生衝突後，對基督教的敵對感轉移到日本，並逐漸擴散到抗日鬥爭。因此，非基運動逐漸消退，基督教界和非基督教界為了抗日而聯合起來。

從1922年到1927年發生的大部分非基運動的領導人和參與者，都是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的主要思想是以啟蒙主義時代思想、理性主義、科學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等為主。初期追求非暴力手段，大部分以雜誌刊行、小冊子發行等開始，強調非暴力和學術性，但也出現實際行動和暴力傾向。非基督教運動的結果，是中國教會表現出自立化的意志，這聯繫到自立化運動和本土化運動。自立化是教會在經濟、行政方面獨立於外國傳教士的教會，是追求自立、自養、自轉原則的本土化。

¹⁴³

本土化追求由中國人創建和運營的教會。本土化有「合一」、「本土」、「成聖」的層面。合一意味著，基督教的多種教派和傳教團體聯合為「中國基督教協進會」、「中華基督教會」，本土是指自治、自養、自傳在教會的各領域由中國人管理。成聖意味著重新解釋基督教的教義，改革宗教意識，融合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¹⁴⁴ 此後，由於抗日鬥爭時期，對非基運動的關心逐漸消失，但在中國基督教界出現教會自立化的必要性。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基督教再次成為重要問題。

與1949年以前相比，新中國成立後，中共追求中國宗教不受外國勢力干涉的獨立主體。它始於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於1950年具體化。當時，基於統一戰線的原

¹⁴² 同註134，428

¹⁴³ 同註130，52-53

¹⁴⁴ 이찬석. (2018). 중국선교와 기독교의 중국화. 신학과 실천 62. 514.
[Lee Chan Seok. (2018). Chinese Mission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ology and Praxis 62. 514]

則，中共分類中國基督教存在對共產黨持有否定認識的一類人、仍然想與海外基督教勢力聯合的一類人，以及贊同共產黨立場反對帝國主義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國的一類人，因此主張中國教會必須要自主自反才能繼續存在。第三類人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在上海任職基督教青年會的職員吳耀宗。

吳耀宗在1950年7月帶頭發表一份名為《中國基督教在新中國建設中努力的途徑》的宣言，號召基督徒服從共產黨的新政權，實現自治、自養、自傳，斷絕與海外教會的一切聯繫，建設「新中國下的基督教」，因此之後被統戰系統宣傳為「三自愛國宣言」，成為中共建政之後第一份宗教人士輸誠的重要案例，以及之後所有宗教改造的樣板。這成為建國後基督教轉換成反帝愛國先驅的契機。¹⁴⁵

文件的內容是在1950年5月，吳耀宗等人與周恩來的會談中確認，以自治、自養、自傳的原則交換安全的保障，在獲得毛澤東首肯下發起「三自革新運動」（後稱三自愛國運動）。為此，吳耀宗發佈「三自宣言」，呼籲所有中國教會參加三自運動、批判帝國主義、以及支持新政府。同時，毛也指示人民日報在1950年9月發表社論對該宣言表示支持，並在報上公布在宣言簽名者的名單。中國共產黨支持基督教的三自愛國運動。隨着韓戰爆發，吳耀宗等「基督教進步派」在1951年成立「中國基督教抗美援朝三自革新運動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由吳耀宗擔任主席，並要求所有教派加入，自此該運動的性質比起宗教性，更傾向於是一個政治運動。而各教會對三自運動的支持與否，成為區分愛國與否的選擇，有助於整理反對宣言的基督教勢力。¹⁴⁶

實質性的三自愛國運動，因為1950年6月發生的韓戰爆發和美國帝國主義的敵對關係而升級。1950年12月，美國凍結中國在美國境內的公私財產，禁止在美國註冊的船舶進入中國港口。¹⁴⁷ 由於這一巨大的反應，中國政府命令中國國內所有銀行凍結美國的公私存款。因此，得到美國教會經濟、物質支援和補助的中國國內基督教會、團體、

¹⁴⁵ 羅竹風. (1987). 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56
; 정 암. (2019). 중국삼자교회의 형성과 발전. [웹진]중국을 주께로 (통권207호). 중국어문선교회
[Jeong Am. (2019).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Party Church in China. [Webzine] China to the Lord. Chinese Literary Church] http://www.chinatogod.com/main/z2s_c_v.php?no=4482&ctg_no=207&div=2

¹⁴⁶ 邢福增. (2007). 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56. 110

¹⁴⁷ 羅竹風. (1987). 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58

學校面臨經濟困難。¹⁴⁸ 中國基督教界的愛國人士認為，這是中國教會自立、獨立運營的機會，中國共產黨也利用它鼓吹反帝國主義情緒，追求基督教的革新，斷絕帝國主義與中國教會的關係。

三自愛國運動的背景下，1952年11月，成立金陵協和神學院，1954年7月召開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的全國會議。在此次會議上，基督教界人士主張，中國教會徹底堅持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原則，積極參與反帝愛國運動。其結果，1954年9月，通過包含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內容的憲法。¹⁴⁹ 而且，各種基督教的教派支持三自運動，也合併為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

1950年代的三自愛國運動的主要活動，大致可分為5個領域。第一是控訴運動。這是基督教徒們以承認自己是帝國主義者並告發教友的方法進行的。教會、基督教機構、以及中國基督教徒中不參加三自愛國運動的人成為其對象；因為自己的教會與外國傳教士無關而拒絕加入三自的中國本土基督徒領袖，例如王明道與倪柝聲，則被捕下獄。第二是反帝國主義運動。在韓戰時期尤為突出。在幫助朝鮮的名義下捐獻命名為「基督教三自革新號」的戰鬥機而募捐的事情就是代表性的活動。第三是強迫政治學習。基督教徒為了支持政府的政策，地方政府指示信徒們參加政治學習活動。第四是掌握神學教育。初期存在多種神學院，但三自愛國運動時期，神學院被合併，學院內必須開設各種政治學習課程，還要參加政府的政治活動。第五是掌握基督教出版物。1951年3月，中央出版總署召開基督教出版會議，提出原則。也就是說，基督教出版社必須以反帝國主義，以及教會自治為原則、宣傳愛國主義、擁護政府的政策。於是《天風》被定為三自委員會唯一合法刊行的雜誌，其他基督教出版機構則被政府接管。¹⁵⁰

除文化大革命時期外，三自愛國運動持續進行。改革開放以後，三自愛國委員會得以恢復，1980年至1992年歷任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2003年擔任政協副主席的

¹⁴⁸ 張爾葭. (2017). 抗美援朝與湖南省基督教“三自”運動. 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3(2). 98

¹⁴⁹ 盛亞軍. (2013). 建國初我國的宗教政策與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研究. 大慶師範學院學報 33(5). 129

¹⁵⁰ 진미수. (2018). 중국교회 삼자애국운동 연구: 1949~ 1954 년을 중심으로. 복음과 선교 43. 269-272 [Jin Mi Soo. (2018). A Study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among the Chinese Church: 1949-1954. EVANGELICAL MISSIOLOGY 43. 269-272]

丁光訓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¹⁵¹ 改革開放開始後，中國共產黨和政府的宗教政策，以三自愛國運動的精神為基調。該政策強調，雖然允許自主、獨立地運營教會，與外國進行交流，但本質是不能脫離中共統戰部的制約。這是以「三自化」、「本土化」的名字出現的，到了習近平時代，又以「宗教的中國化」的形式出現。以基督教的中國化為名，中國共產黨和政府主張建立基督教三自神學、組織上的三自化、以及完全切斷與「境外勢力」的聯繫，就是要為了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發揮積極的作用。¹⁵² 而這樣的歷史也在2012年之後與韓國傳教士合作的中國教會身上重現。

第二節 中國的宗教政策

中國宗教政策形成的內部因素是，領導人的變化，以及隨之而來的政策方向的變化。¹⁵³ 因此筆者想了解一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實施的宗教政策。楊鳳崗(2012)把中國的宗教政策變化分為四個時期做分析。第一段時期是1949~1957年，中央政府試圖從政治上控制宗教團體。第二段時期是1957~1966年。在中央政府追求經濟生產性的計劃下，實行針對宗教人與宗教活動的政策。第三段時期是1966~1979年。文化大革命時期，所有宗教場所與活動都被禁止。第四段時期是1979年到現代，由於改革開放，宗教政策比較自由，可是仍然實施部分的限制。¹⁵⁴

¹⁵¹ 朴滿濬. (2019). 시진핑정권의 종교중국화공정이 중국종교정책에서가지는 역사적 함의. 중소연구 42(4). 146.

[Park Manjun. (2019).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 of Xi Jinping regime's "changing religion into sino-enculturation" project in modern PRC religious policies. Sino-Soviet Affairs 42(4). 146]

¹⁵² 高峰.. (2017/12/05). 紀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成立60週年紀念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閉幕詞. 《中國基督教網》 <https://www.ccctspm.org/cppccinfo/9685>

¹⁵³ 김성민. (2016). 시진핑 지도부의 사회-경제 정책과 그 선교적 함의. 복음과 선교 35 (한국복음주의선교신학회). 47

[Kim Sung Min. (2016). Xi Jinping Leading Group's Social-economic Policy and the Missional Implication. EVANGELICAL MISSIOLOGY 35. 47]

¹⁵⁴ 邢福增老師也將中國的宗教政策分為以下時期。1) 1949-1957 [1950-1953：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改革與改造(Reforming and Remolding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period), 1954-1957：社會主義改造時期的團結奮鬥(Unity and Struggle during the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period)] 2) 1950-1960年代是基督教發展同時共產黨制約因素也多的時期。3) 1966-1976: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宗教政策。4) 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隨著中國領導人的變化。；Ying F.-T. (2014). The CPC's Policy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1949–1957: a 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3(89), 884–901. <https://doi.org/10.1080/10>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因為中國是共產主義的國家，中國的基督教不能進行正式活動，教會也被用作集體農場或工廠。¹⁵⁵ 同時，中國共產黨開始反對，意識形態上、體制上具有顛覆性的政治勢力的宗教組織的政治活動。為此，共產黨禁止中國傳統內的異教部分，對有大規模追隨者的宗教採取更加慎重的態度。¹⁵⁶ 但是中共一直主張保護信仰自由，並堅持消除宗教中的帝國主義因素，減少帝國主義工具的作用，增加愛國主義影響力，轉變為只屬於中國的宗教事業。¹⁵⁷ 對此，中國共產黨在各宗教中聯合共產黨的宗教界人士，要求中國的宗教斷絕與國際社會的聯繫，在中國內部自行淨化並解決宗教中存在的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特性，支持共產黨。¹⁵⁸

當時中共的宗教政策，是作為統一戰線的一環而開始的。抗日運動時期，為了對付日軍，中共與西方宗教聯合，但新中國成立後，共產黨的目標是，針對基督教或天主教等西方勢力進入的教會或教堂，強調愛國主義的重要性。為此，中共非常重視宗教界和政治界的聯盟。因此，建國後，對宗教的基本方法發生了變化。第一，肅清教會內部的帝國主義勢力，實行中國教會獨立自主自辦的三自原則，將天主教和基督教轉變為中國信徒的宗教。第二，為了防止宗教被反動分子利用，廢除宗教內部的封建、壓迫性特徵制度。第三，將可以與政界聯合的進步人士作為宗教領袖，成立全國性的愛國宗教團體。¹⁵⁹ 作為國家單位，1951年成立國家宗教事務局，作為管理宗教的組織。該機構擴大到全國各省和地方，幫助中國政府體制化地管理全國宗教。當時宗教事務局的主要業務是，將外國傳教士送回其本國，並將中國內部的天主教或基督教與外國斷絕關係。¹⁶⁰

670564.2014.882565; 邢福增. (2020/10/09). '對三自運動七十年的思考'. 時代論壇 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3535&Pid=104&Version=0&Cid=2050&Charset=big5_hkscs

¹⁵⁵ 同註140，153

¹⁵⁶ Yang, F. (2012).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 by Fenggang Ya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66

¹⁵⁷ 彭學寶. (2011). 試析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 商丘師範學院學報 (08). 49

¹⁵⁸ 同註156，66

¹⁵⁹ 林祥庚. (2003). 我國宗教界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 黨史研究與教學 (1). 12-13

¹⁶⁰ 同註156，69

建立新中國後，1949年10月，在北京召開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該會議上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在《共同綱領》中，有關宗教的條款為總綱第5條與第53條。¹⁶¹ 透過這些條款，中國共產黨和中央政府追求明確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而且把宗教政策轉變成文化，制定基本結構，作為社會主義政權中出現的社會制度改革的一個實質性實踐方案來實施。

162

中國內部的基督教會、團體和國外勢力的斷絕關係，在韓戰時期變得更加重要。1950年6月，爆發韓戰。同年10月，幫助韓國的美軍越過38線進軍，中國中央政府感到威脅後決定派遣人民支援軍。當時，因為美國呈現對中國的敵對態度，周恩來主張要消除中國國內蔓延的美帝國主義因素。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發表《關於在全國進行時事宣傳的指示》，向全國各地宣傳抗美援朝，要求人民對美帝國主義持有同樣的認識與立場，並且請求中國教會、基督教團體與學校舉行反美愛國大會和示威，斷絕與以美國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的關係。¹⁶³

韓戰時期，中國內部對基督教的政策在這種背景下徹底走向反美帝國主義，同時引導中國教會自己運營教會和經濟獨立。中國政府帶頭支持中國教會的三自運動，並給予經濟上的支持。例如，對於斷絕與美國教會關係的中國教會，減免房地產稅，並提供生活困難的神職人員補助金或介紹副業。¹⁶⁴

因此，在韓戰爆發前後，中國的宗教政策出現了變化。韓戰發生前，作為統一戰線的一環，政府對各宗教進行忍耐，並慢慢推進宗教政策，但隨着韓戰爆發和中共軍的介入，開始迅速應對宗教問題。在國內，對積極受到美帝國主義支援的基督教會和

¹⁶¹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總綱 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利。

總綱 第五十三條：各少數民族均有發展其語言文字，保持或改革其風俗習慣及宗教的自由。

¹⁶² 김광성.(2019). 중국의 종교정책이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에 미친 영향: 기독교 중국화에 대한 선교실천적 대응. 선교와 신학 48. 58

[Kwang Seong Kim. (2019). The Effect of Chinese Religious Policy on Chinese Mission in Korean Church: Mission Practical Response to 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Mission and Theology 48. 58]

¹⁶³ 邢福增. (2007).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香港：道風書社. 189-191

¹⁶⁴ 同註148，99

團體宣傳抗美援朝，將韓戰與三自革新運動聯繫起來，並擴散該運動。因此，透過韓戰，中國共產黨觀察中國內部基督教教派的思想，透過教會的學習訓練班和座談會等場合宣傳、教育共產黨的政治思想，為中國的基督教徒提供區分自己和敵人、作為中華民族覺悟的契機。¹⁶⁵ 與此同時，還試圖通過控訴的方法，查出所有與中國基督教會和天主教內部的帝國主義有關的人。因此，控訴的對象大部分是外國傳教士或教會的領導人，此外還有新中國成立前曾逃往海外的華裔教會領導人、教會內的外國神職人員和親信、反對三自革新運動的人士。¹⁶⁶

中國政府在進行三自革新運動時，持續要求中國教會由中國人運營和管理教會，採取愛國愛教的態度，並強調愛國愛教的宣傳。對此，各宗教都成立愛國宗教組織。1951年，基督教作為準備抗美援朝以及三自革新運動的委員會開始，1954年成立了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會。¹⁶⁷ 此外，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憲法》，在憲法第84條中，明定宗教信仰自由的內容。

中國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從50年代末一直維持到文化大革命爆發之前。中央政府要求各宗教擺脫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保持愛國方向，為此，宗教界人士不斷向政府學習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1958年，中國共產黨按照第二次五年計劃，在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的基調下推進經濟發展。這種政策也適用於宗教界，宗教界領導人根據政府的命令，直接參加勞動或投入到國家建設事業中。但是，由於政府對宗教界的這種要求，中國的宗教政策開始逐漸向左傾斜，並出現了問題。¹⁶⁸

大躍進運動對宗教的組織制度和活動方式等產生了影響，特別是對基督教會開始出現與以往不同的問題。由於神職人員被抽調到國家事業，宗教界自然而然地萎縮，政府徵用教會的建築物和房地產等用於國家，因此宗教場所也大量減少。因此，出席教會的信徒人數也減少，教會也因經濟困難，難以維持自養政策。同時，當時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們對共產主義理想產生濃厚的興趣，離開教會，對於當時基督教的形勢混

¹⁶⁵ 同註148，100-101

¹⁶⁶ 劉建平. (2010). 抗美援朝時期中國基督教界的控訴運動. 二十一世紀 (121). 124-129

¹⁶⁷ 同註156，69

¹⁶⁸ 同註147，160

亂，社會也產生了認識否定。1950年代末，中國政府追求的社會方向和教會追求的目標之間出現思想上的差異，教會被認為堅持與國家發展方向不相符的活動方式。¹⁶⁹

對於這些問題，黨中央從1960年代末開始糾正，制定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並且調整包括宗教政策內的統一戰線等各項政策。1960年2月，在六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重新強調建國初期李維漢所提出的宗教「五性」，要正確認識宗教的群眾性、長期性、民族性、複雜性、國際性，避免如1959年溫州「無宗教區」實驗一般過左的宗教政策。¹⁷⁰ 但如此的務實主義消失的很快，1962年1月，中國基督教第二屆全國會議上，討論強化政治學習以及思想改造的必要性。

¹⁷¹

1962年8月，中共中央第八屆十中全會、以及同年12月至1963年1月召開的第七次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毛澤東把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絕對化，主張當時存在的資產階級是黨內出現的修正主義的根源，階級鬥爭也適用於宗教界。即是，對宗教方面出現的現象和問題，要採用階級分析方法來處理。另外，宗教界雖然拆除帝國主義的勢力，但還不適應社會主義發展帶來的變化，所以把宗教信仰視為剝削階級的思想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¹⁷² 中央政府的這種政策擴大到全國，基督教的各種事業萎縮，大部分教會領導人下放農村勞動，因此教會與信徒的數字越來越減少。

從1957年開始的中國共產黨的宗教化政策中，逐漸出現左傾化的錯誤。這種現象的頂點是1966年發生的文化大革命。1966年5月，毛澤東公佈《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推進無產階級專政，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該時期毛澤東追求

¹⁶⁹ 同註2，729-732

¹⁷⁰ 宗教五性論是，支持引導宗教走向社會主義建設方向的宗教認識。長期性：為了宗教消失，需要很長時間，因此有必要讓宗教適應社會主義體制。群眾性：強調宗教可以成為宗教群眾和非宗教群眾之間的矛盾或社會、政治集團的力量。民族性：宗教和民族的密切相關性，為了不讓宗教刺激民族意識，有必要給予政策上的照顧。國際性：因為宗教的普遍性可以形成多種國際關係，所以中國的對外關係也應該考慮宗教的國際性。複雜性：宗教由組織、教派、國際關係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因此要慎重對待。

¹⁷¹ 同註2，740-743

¹⁷² 同註2，744; 同註147，160-161

所有宗教組織和宗教團體的完全解體。文化大革命初期施行的「四舊運動」是，以宗教為第一個對象實施的。¹⁷³ 當時掌握政權的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四人幫，不僅廢除了否定中國共產黨追求的統一戰線和民族宗教事業、追求三自化的委員會或政府相關部門，還廢除中央和地方政府所有宗教事務部門。教會、寺廟、寺院等宗教場所也被關閉和破壞，所有宗教活動全部中斷，神職人員被拘禁或思想改造或下放，成為非神職人員的一般勞動者，一般信徒一旦被發現有信仰，也會受到迫害。¹⁷⁴ 特別是，外來宗教的基督教和天主教被視為敵對勢力，並且開始毛澤東的個人崇拜。¹⁷⁵ 另外，除了社會主義思想之外，不允許其他意識形態或精神權威的存在，這給反對偶像崇拜和個人崇拜的基督教帶來更大的衝擊。

文化大革命時期，社會主義宗教觀和宗教政策是主流。四人幫希望把中國建立成沒有宗教的國家，因此，進一步推進宗教消亡論，把宗教活動視為最非生產性的活動，把神職人員投入到經濟活動當中。並且，強化對宗教的制度性的限制，將宗教思想規定為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利用階級鬥爭批判宗教。¹⁷⁶ 這些宗教政策包含在1975年1月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二部憲法》。該憲法是在文化大革命特殊時期公佈，在左思想的指導下制定，具有「四個存在」、「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基本路線，也指導「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學說」。¹⁷⁷ 由於這些政策，宗教於是逐漸躲到地下進行活動，基督教也為了躲避人民的視線，經常舉行非公開聚會。

¹⁷³ 1966年6月1日，在《人民日報》社論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上指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在廣大人民群眾中，創造和形成嶄新的無產階級新思想、新文化、新風俗、新習慣」。

四舊運動：文化大革命時期，由學生組成的紅衛兵，以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為基調進行的運動。因此，宗教經典、文物、聖像、宗教書籍等全部被燒毀或被破壞，宗教職員受到公開批評。

¹⁷⁴ 우심화. (1992). 중국 문화와 중국 교회의 역사. 기독교사상 36(11). 28

[Yu Shin Hwa. (1992).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ina. Christian thought 36(11). 28]

¹⁷⁵ 마민호. (2019). 모순론의 관점에서 종교중국화정책이 기독교에 미치는 영향. 복음과 선교 48(4). 182.

[Minho Ma. (2019). The Impacts of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diction Theory. EVANGELICAL MISSIOLOGY 48(4). 182]

¹⁷⁶ 同註157，60-61

¹⁷⁷ 同註2，752

1978年 2月，第五屆人大的《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繼續貫徹執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同年9月-10月中央統戰部舉行宗教工作座談會，這次座談會強調宗教信仰自由的保護，同時規定任何宗教活動必須遵守政府的宗教政策與法律，不可借宗教之名發生違法行為。1978年12月，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在經濟上追求改革開放，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基調，恢復並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中共中央主張宗教問題的正常恢復，包括馬克思主義宗教理論、憲法、法律、宗教政策和實質性的宗教商業在內的全面正常化。¹⁷⁸

改革開放開始後，中國的宗教政策表現出比較寬容的態度。為了國家的經濟發展，不僅在經濟領域，對其他社會領域也放鬆了管制。尤其是，宗教事務受到了中共的重大關注，由中央書記處直接管理。其結果，1980年1月，基督教第三屆全國會議上制定並通過《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章程》和《中國基督教協會章程》，成立中國基督教協會(China Christian Council, CCC)。

1982年3月，作為宗教政策最基本的法律，發表了《關於我國社會主義時期宗教問題的基本觀點和基本政策》(19號文件)。主要內容包括，恢復文革時期禁止的宗教活動，說明此後中共將如何管理宗教。此外，政府強調宗教是跟隨政府的政策方向，對社會主義建設要幫助。雖然對宗教的國際交流表現積極，但是在傳教活動上，管制進入中國的外國宗教團體或人員。¹⁷⁹ 另外，信教的群眾和不信的群眾在政治、經濟上根本利益相同，雖然兩種群眾之間의思想和信仰存在差異，但這是次要的差異。第19號文件特別強調，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是黨對宗教問題的基本政策。¹⁸⁰ 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宗教觀，認為宗教總有一天會消失。只是認為隨着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和經濟發展速度，宗教的消失不會馬上實現，這種主張承認宗教可以長期存在。¹⁸¹ 對宗教的中國政府與中共的觀點，在1982年12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上通過的《憲法》第36條得到大眾了解。透過該條款恢復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本

¹⁷⁸ 同註2，761-762

¹⁷⁹ 同註43，25-27

¹⁸⁰ 同註2，764

¹⁸¹ 邢福增(邢福增), 이해원. (2012). 개혁개방 이후 중국에서의 국가. 기독교사상 (2). 79
[邢福增, Lee Hyewon. (2012). State in China After Reform and Openness. Christian thought (2). 76-94]

來意義，成為國家制定、執行宗教法律和法規、處理宗教問題的根本依據。之後繼續發表的《刑法》、《民法通則》、《兵役法》等其他法律上也開始制定有關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款。¹⁸²

這一時期的宗教政策通過改革開放，開始與外國的交流，接納外國人的進入。即使他們以傳教活動為目標進入中國，由於經濟發展優先，一些傳教活動被默認。這可以理解為鄧小平實事求是的立場。儘管如此，中國共產黨仍然強調宗教要適應社會主義，為了不被外國勢力利用，應該獨立、自主、自辦地存在，並且特別強調的部分是宗教適應社會主義。

江澤民時期是，中國特色的宗教政策實際扎根的時期。1991年2月發表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問題的通知》(6號文件)為基礎，改革開放時期的宗教政策進一步擴散並施行。該文件闡述黨和政府宗教工作的基本任務，是第一個明確提出由中共政府依法管理宗教工作的文件。同年5月，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和民政部透過《宗教社會團體登記管理實施辦法》要求在全國縣級以上活動的宗教團體到各級政府民政部門登記。同時，要求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定具有地方性的宗教事務相關行政法規。¹⁸³ 1993年11月，江澤民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說：「利用宗教教義、宗教教規和宗教道德中的某些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服務」，強調三句話。¹⁸⁴ 特別是，其中江澤民強調宗教要適應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是包括信仰宗教的群眾，在社會主義國家要遵守法律和政府的方針，以及宗教活動要服從和服務於國家利益和民族利益。¹⁸⁵

1994年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外國人宗教活動管理規定》和《宗教活動場所管理條例》。根據這項法律，韓國人也可以建立韓國人的教會，聚在一起公開進行教會活動。1995年，建立三定原則：要在指定的場所由指定的人指定的範疇內進行宗教

¹⁸² 同註2，772-773

¹⁸³ 허원. (2014). 개혁 개방 후 중국의 종교신앙자유정책. 역사와 담론 72. 176.

[Huh Won (2014).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STORY AND DISCOURS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72. 176]

¹⁸⁴ 三句話：一是全面、正確地貫徹執行黨的宗教政策，二是依法加強對宗教事務的管理，三是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¹⁸⁵ 石家松. (2002). 江澤民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4(4). 430

活動，到1998年，全國的省、市、自治區根據各地區情況自行制定宗教活動管理條例。

¹⁸⁶ 1998年，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升格為國家宗教事務局，與統一戰線部一起在中央體系下處理宗教問題。¹⁸⁷ 此後，2002年11月，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¹⁸⁸ 此外，還把思想運用到宗教政策上，努力處理好中國國內的宗教事業。特別是「三個代表」的主要思想包括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因此運用於宗教。即是，對宗教的客觀性和長期性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另外，還要以實事求是的觀點，觀察宗教問題的特殊複雜性。隨着國際社會的變化，民族和宗教問題有可能促使中國西化並分裂的戰略，因此要求以實事求是的觀點來解決這些問題。¹⁸⁹ 2001年12月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江澤民在「三句話」的基礎上，增加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的制度，體現江澤民時代的宗教政策基本方針。該方針是「四句話」，即是，「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則」。¹⁹⁰

江澤民認為，宗教雖然最終會消失，但長期存在。同時，鼓勵宗教界開展社會公益事業，要求宗教與中國社會主義社會互動。這可以看作是宗教的適應論，要求宗教信徒在政治上熱愛祖國，支持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共產黨的領導。¹⁹¹ 與此同時，江澤

¹⁸⁶ 同註151，140-141

¹⁸⁷ 同註156，79

¹⁸⁸ 2001年7月1日，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大會上發表的講話中，系統闡述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他指出，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符合生產力發展的規律，體現不斷推動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的要求，尤其要體現推動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通過發展生產力不斷提高人民群眾的生活水準。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援。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黨的理論、路線、綱領、方針、政策和各項工作，必須堅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出發點和歸宿，充分發揮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在社會不斷發展進步的基礎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百個瞬間說百年] 2001，“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2021/12/13).《新華網》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2/13/c_1211475400.htm

¹⁸⁹ 陳誠，丁如. (2004).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宗教工作“四句話”. 中國宗教(06). 4-5 doi:CNKI:SUN:ZGZJ.0.2004-06-005

¹⁹⁰ 江澤民的宗教政策“四句話” <http://tzb.xaut.edu.cn/info/1035/1046.htm>

¹⁹¹ 同註181，80-82

民還強調，在國際社會上宗教的因素對政治產生巨大影響，因此在中國共產黨也要重視宗教事業，國家要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同時，全面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持宗教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所有人民都有宗教信仰自由，但共產黨員不能信教，堅持馬克思宗教觀，要求對一般群眾進行唯物論和無神論的教育。¹⁹²

可以看出，江澤民的宗教政策強調宗教的群眾性、複雜性、長期性。江澤民特別強調宗教在社會主義社會要興盛。因為中央政府認為，中國是多宗教的國家，為了國家的穩定和祖國統一、民族的團結，可以防止境外勢力利用反對中國的內部或外部勢力的宗教滲透進來。¹⁹³ 因為這些政策，中國的宗教政策逐漸具備法律形態和意義，但看似寬容的政策下，「紅線」仍非常清楚，例如法輪功一開始被國家所鼓勵，但後來就因為從事黨所不容許組織活動，在江澤民任內被打為「邪教」，開始至今長達二十多年被殘酷打壓的命運。¹⁹⁴

2002年11月，在第16屆全國代表大會提出的十一五規劃中，總書記胡錦濤為中心，黨中央隨着國際、國內局勢的變化，對宗教業務提出新的觀點。即是，以科學發展觀為中心，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發揮宗教界人士和有信仰羣眾的優勢，促進宗教和諧。胡錦濤維護前任領導人的宗教觀和馬克思主義宗教觀，推進宗教政策的穩定性和連續性，並進一步把當時中國的宗教狀況，以及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結合起來。

¹⁹⁵

胡錦濤時期，最代表性的宗教政策是，2004年11月公佈的《宗教事務條例》(國務院426號)。該文件要求宗教團體要在國家機構正式登記，國際交流也依據中國的法律進行處理，強化了宗教場所、宗教出版物、宗教團體、宗教人士的法律責任。另外，信徒還提議積極參與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並強調宗教的實用主義，以達到建設和諧社

¹⁹² 劉福軍. (2010). 江澤民宗教工作思想探析. 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 33(1). 16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1203.2010.01.004>

¹⁹³ 譚平, 梁昱慶. (2003). 試論江澤民的民族宗教思想. 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 4. 19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679X.2003.04.005>

¹⁹⁴ (2019/4/25). 遭認定「邪教」20年，中國現在還有人練法輪功嗎？《德國之聲》 <https://www.storm.mg/iframestyle/1213089?page=1>

¹⁹⁵ 蘇文, 朱方長. (2012). 新時期胡錦濤的宗教思想研究. 經濟研究導刊 (07). 214.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91X.2012.07.092>

會的國家目的。胡錦濤把宗教的長期性、群眾性、複雜性的概念，作為社會主義宗教論的基礎，並希望阻止外部勢力的流入，維護自主自治的原則。¹⁹⁶

在宗教學校方面，透過擴大與國外勢力的學術交流，提供自行解決各宗教問題的機會。另外，還擴大對中國境內的外國人進行宗教活動的範圍擴大。但是，為了不把宗教與群體性事件聯繫起來，而強化對宗教活動場所或宗教界職員的規定，以維持黨對宗教團體和宗教活動場所的控制權。¹⁹⁷

因此，胡錦濤時期發表的《宗教事務條例》作為「為了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維護宗教和睦與社會和諧」目標，強調信仰宗教的公民、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以及不同宗教信仰的公民應相互尊重、和睦相處。這是中國共產黨以立法的形式將宗教政策制度化、規範化，作為憲法具體化的條例，首次成為與宗教相關的綜合行政法規。

2006年7月，胡錦濤在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做好新形勢下的宗教工作，關鍵是要全面理解和認真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這是中央領導人首次公開提出宗教事業的基本方針。此外，在國家整體層面的「五大社會關係」中，將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視為一種關係，強調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應積極相互適應。¹⁹⁸

與此同時，胡錦濤時期宗教事務中最重視所謂的「群眾性」。強調宗教政策的執行要重視善待信仰羣眾的態度，以此加強宗教幹部的建設，2007年11月召開的第17屆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黨章中，收錄胡錦濤的政治理念「科學發展觀」中，「以人為中心」的論述佔據了核心概念。在宗教業務領域，在實際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方面，把最重要的一點作為人的根本。因此，強調以人為本深入宗教，在分析宗教問題方面也要重視人，特別強調要關注宗教界人士和信仰宗教的羣眾。¹⁹⁹

¹⁹⁶ 同註181

¹⁹⁷ 박만준. (2006). 중국 제4세대 종교정책의 과제와 전망. 중소연구 29(4). 127-128
[Park Manjun (2006).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Fourth Generation Religious Policy. Sino-Soviet Affairs 29(4). 97-131]

¹⁹⁸ 劉明定. (2013). 胡錦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 喀什師範學院學報(02). 8. doi:10.13933/j.cnki.jkashgar.teach.coll.2013.02.019. ; 五大社會關係：促進政黨關係、民族關係、宗教關係、階層關係、海內外同胞關係的和諧，對於增進團結、凝聚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¹⁹⁹ 同註195

胡錦濤與江澤民的宗教路線相似，堅持宗教要適應社會主義社會，進一步把新形勢下宗教要社會主義化，社會要相應作為新的目標。為此，要求宗教活動進入規範化的範圍，堅持獨立自主的原則，適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任務。2007年12月，胡錦濤在17屆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集體學習中，為黨的新宗教工作提出三個要求：第一是，堅持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第二是，要加強信教群眾工作。第三是要加強宗教教職人員隊伍建設。²⁰⁰ 這些強調群眾工作的路線，結果就是產生將近十年的宗教寬容時期，這段期間各國、各宗教的傳教士紛紛來到中國，與其它類型的非政府組織與慈善公益機構一起開拓中國發展中的「市民社會」；因為參與許多公益或維權活動，中國的基督教會也被一些人稱為「中國最大的NGO」。

習近平的宗教政策，也與中國共產黨從以往開始追求的政策一脈相承。但可以發現，與之前的領導人相比，他行使更加強硬的路線。習近平2016年非公開發布，關於宗教管理新戰略的文件，以及2018年2月頒佈實施的新版《宗教事務條例》。習近平的宗教政策目標是，中國共產黨要徹底指導宗教工作、不受外國的干涉、追求宗教中國化、有必要使宗教適應社會主義。特別強調宗教中國化是在2015年全國統戰工作會議、以及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提到的。為此，他追求宗教比歷屆政府更強有力的法制化，主張為了社會穩定，加強對宗教團體的監視和控制。²⁰¹

習近平的宗教政策中，另一個方面是，宗教管理部門的變化。2018年3月21日，中共中央發表《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該方案的第14條中，把宗教局併入統一戰線部。²⁰² 本條列出了合併統戰部的目的，即是：「強調黨對宗教工作的集中統一領

²⁰⁰ 胡錦濤主持政治局第2次集體學習強調做好宗教工作. (2007/12/19). 《中央政府門戶網站》 http://www.gov.cn/jdhd/2007-12/19/content_838664.htm

²⁰¹ 同註153; 同註157; 유원지. (2020). 중국의 국가-교회 관계를 재고하기: 베이징의 대학기독교학생회 사례를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 26(1). 99-140
[Yoo Wonji. (2020). Rethinking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Campus Christian Fellowship in Beijing. *Cross-Cultural Studies* 26(1). 99-140]

²⁰² 中共中央印發《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2018/3/21). 《新華社》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3/21/c_1122570517.htm : (十四) 中央統戰部統一管理宗教工作。為加強黨對宗教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統籌統戰和宗教等資源力量，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將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央統戰部。中央統戰部對外保留國家宗教事務局牌子。調整後，中央統戰部在宗教事務管理方面的主要職責是，貫徹落實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和政策，研究擬訂宗教工作的政策措施並督促落實，統籌協調宗教工作，依法管理宗教行政事務，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和正常的宗教活動，鞏固和發展同宗教界的愛國統一戰線等。不再保留單設的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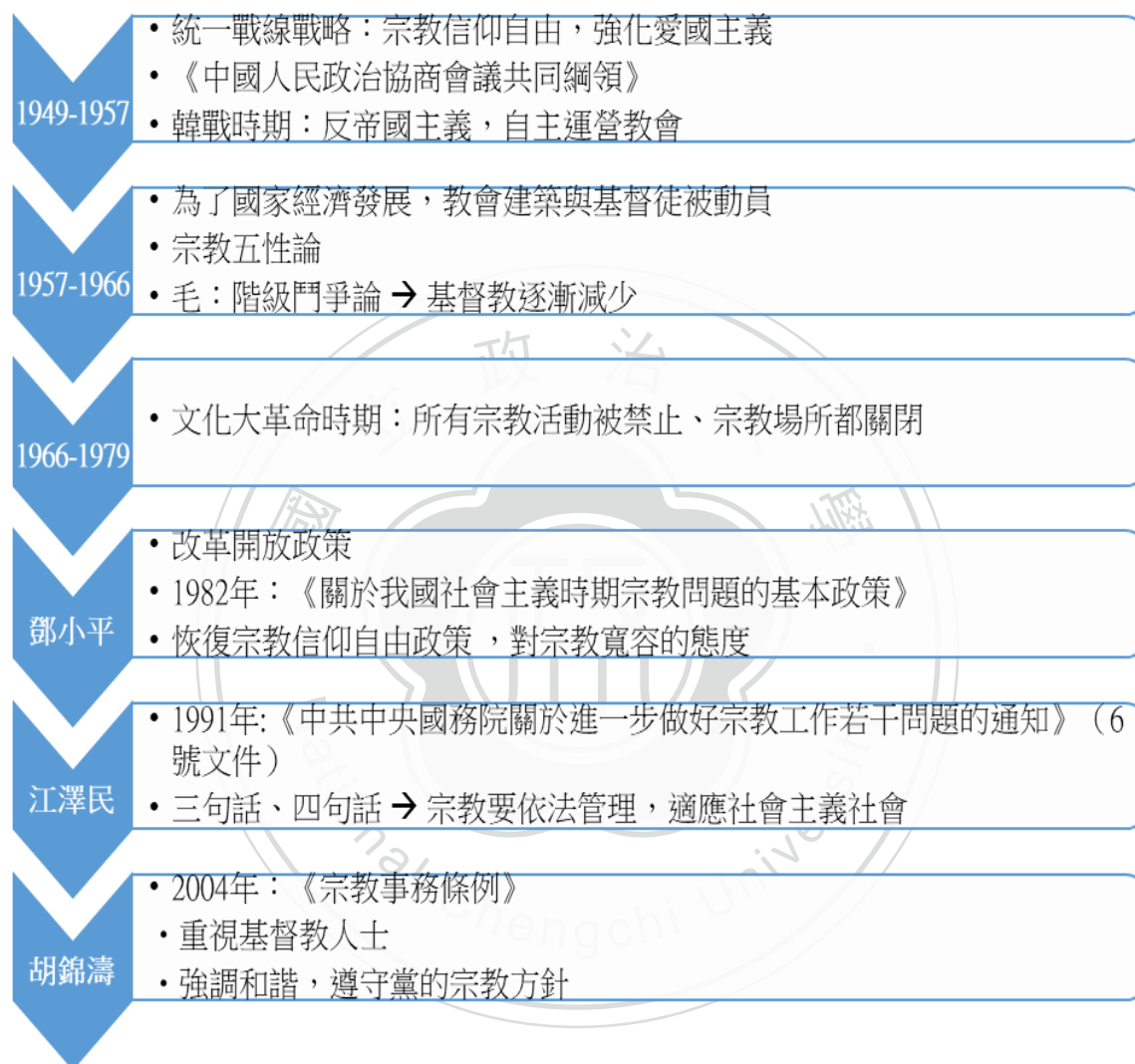
導，全面貫徹黨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針，堅持我國宗教的中國化方向，統籌統戰和宗教等資源力量，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將國家宗教事務局併入中央統戰部」。統戰部實行宗教事務意味着，今後黨將全面出面控制和管理少數民族、宗教、海外華僑等。因此，這意味着比起國家和政府，更重視黨，優先考慮黨的政策和決定。即是，可以看做是「黨將統率一切」。²⁰³



宗教事務局。

²⁰³ (2018/3/22). 중국, 소수민족·종교 통제 강화한다...당 통일전선부 역할 확대. 《연합뉴스》
[(2018/3/22). China Strengthens Ethnic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Control...Expanding the Role of the Party's Unification Front Department. 《Yonhap News Agency》]

表5-1. 中國宗教政策



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第六章 習近平執政後出現對基督教的態度變化

第一節 中韓關係與國際情勢變化的影響

習近平上台以後，宗教政策發生變化，所以筆者根據韓國傳教士的經驗，分析在中國基督教內的變化。首先看中韓關係上出現的幾起事件，對韓國傳教士產生為何的影響。中韓關係從1992年建交開始，至今中國已經佔據韓國第一貿易國的地位。

韓國直接派遣傳教士的時期是，1990年北京亞運會前後。²⁰⁴ 此後，韓國與中國於1992年建交，隨著經濟交流、人才交流也急劇增加。藉此機會，韓國傳教士以學生、企業家、派駐人員等身份進入中國，住在中國秘密進行傳教活動，中國政府也為了經濟發展以及促進與韓國關係，默認韓國傳教士的流入。

人才與經濟交流一起，中韓關係中最具影響力的因素是韓國文化——韓流。韓國的K-POP/電視劇、電視節目等文化因素流入中國，一般人民對韓國的關心逐漸增加。同時，對韓國人也產生了肯定的印象。傳教士們說，因此傳教士第一次與中國人見面時，韓國人要素與韓流要素起到了比較大的幫助作用。²⁰⁵ 最代表性的是，透過流行的韓國電視劇、韓國偶像、娛樂節目等，給了傳教士們更加接近中國年輕人的契機，亦給韓國人留下積極、親密影響的手段。

中國與韓國至2022年已經建交30年。2000年代初，中國與韓國的合作大部分是經濟上的領域，兩國的外交關係被定義為共同防犯北韓的「全面合作夥伴關係」。2008年，韓國的李明博政府與中國的胡錦濤政府，在兩國建交以後，首次實現一年內兩國首腦的互訪，並升級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李明博政府偏重中韓之間的經濟交流，但是針對解決北韓問題上，尚未能得到兩國之間的合作。朴槿惠總統上台，對北韓先實行包容後採取施壓政策。因此，朴槿惠政府比起前任與中國採取更友好的關係。當時在韓國或日本、美國之間，出現「中國傾斜論」，即是韓國的態度向中國傾斜。但是2015年韓國政府的薩德飛彈部署事件，瞬間成為使兩國關係變為對決關係的要素，該事件在現任文在寅政府持續影響。而文在寅政府在北韓的問題上，表現出強烈自主

²⁰⁴ 同註25

²⁰⁵ 作者訪談，訪談人 2:3:4，台灣，2021年 2月25日，3月4日，4月23日

處理的傾向，同時與美國、中國關係保持友好的戰略。²⁰⁶

隨著韓國政府態度的變化，與中國的關係也出現差異。特別是經濟合作關係的擴大，增加了許多韓國人與中國人的往來，其中包括韓國傳教士的入境中國。可是中韓之間政治上、文化上的矛盾，對居住在中國的韓國傳教士亦產生影響，最代表性的事件是，從2015年末開始的韓國政府薩德部署事件問題。

一、 薩德部署事件

在政治上，2013年韓國與中國同時更換新的領導人。韓國是朴槿惠總統開始執政，中國是習近平主席開始任期，所以兩國關係期待進一步發展，與中韓前任政府相比，關係友好飛漲。不僅是兩國首腦會談，朴槿惠總統的訪中、習近平主席的訪韓成功，停滯不前的中韓FAT實行簽署，對北韓問題亦展開積極的合作。特別是，2014年7月，習近平的韓國訪問，給韓國的基督教界帶來肯定的期待。到2016年為止，中國佔韓國出口總額的25%，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也達到30億美元以上。以2016年為基準，韓國企業的當地投資規模約為565億美元，並且為了中韓兩國交流，每年還將召開約10多次經濟閣僚會議，韓中之間的航班每週也達到1000次以上。²⁰⁷ 透過這些數據，可以分析出韓國部署薩德事件之前的時期是韓中關係的最佳階段。

傳教士從事基督教活動，傳教士之間，或中國人與外國人傳教士之間，盡量不涉及政治方面問題。因此，教會內幾乎不受國家間外交關係或政治領域的影響。²⁰⁸ 但是，對於教會場所以外的領域，中國政府的觀點對傳教士則產生了影響。最具代表性的事例有中國與美國之間、韓國與中國之間關係的變化，中國政府對待美國傳教士與韓國

²⁰⁶ 황수영. (2020). 2010년 이후 한국 대통령의 대중 인식에 관한 연구: 이명박, 박근혜, 문재인 대통령의 외교정책을 중심으로. 사회과학연구 28(1). 54

[Su young Hwnag. (2020). A Study of the Korean President's Perception toward China since 2010: Focusing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President Lee Myung-Bak, Park Geun-Hye, and Moon Jae-In. Social Science Studies 28(1). 54]

²⁰⁷ 송세관. (2017). THAAD 배치와 한중관계 발전방향. 전략연구24(2). 90

[Song Se-gwan. (2017). THAAD deploy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Korea-China relationship develop.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4(2). 90]

²⁰⁸ 作者訪談，訪談人 5，台灣，2021年 11月24日

傳教士的態度也有所不同。

中國與美國間的關係，與1999年發生的南斯拉夫中國大使館轟炸事件有關。²⁰⁹ 該事件導致美中關係急速惡化，其影響也波及到在中國的美國傳教士。中國政府不批准美國人簽證，全中國內都有抗美的氛圍。學校在課堂上提及該事件，讓學生對美國產生否定印象，引起反美運動。²¹⁰

中共政府對韓國傳教士的態度開始比較包容，因為認為，韓國比其他美國與歐洲等基督教國家相對軟弱，韓國傳教士容易管理，因此並不重視韓國。而且外表同為亞洲人，只要不做明顯的傳教行為，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韓國人與儒家、佛教等中國文化有相似之處，因此韓國人比其他國傳教士更容易理解中國人。中國人也是以該理由為基礎，對韓國人的關係比較快速、容易親近。但是若個人關係之間存在歷史問題或國家問題，也有中國人對韓國人持否定的態度。²¹¹

2015年是中韓關係中，最具戲劇性變化的時期。2013年，在韓國朴槿惠總統，出現與以往的韓國政府不同，更加重視中國的態度。總統選舉的時候，在朴槿惠的公約上表達，要把中國提升為戰略合作夥伴關係，當選之後最先向中國派遣了特使團。此後，對北韓政策的協商與中韓FTA的簽訂等經濟、安保方面上的合作迅速實現。2015年，兩國舉行了七次的首腦會談，兩國領導人的互相訪問使中韓關係變得比以前親密。但是2015年末以後，兩國關係迅速惡化。其理由是，兩國對北韓開發核彈的立場差異，以及中國對駐韓美軍薩德飛彈部署的反對。²¹²

朴槿惠政府為了牽制北韓，重視與中國的關係，因此透過與習近平的首腦會談，要求中國加強對北韓的制裁，積極對北韓施壓。對此要求，中國政府對朴槿惠政府的對北韓政策、以及東北亞和平合作構成、北韓的無核化給予支持。但是2016年1-2月，

²⁰⁹ 五八事件：1999年 5月7日，曾是北約一員的美軍飛機轟炸了位於南斯拉夫的中國大使館。該事件導致當時3名中國新聞工作者死亡，但美軍主張是誤炸。

²¹⁰ 作者訪談，訪談人 3，台灣，2021年 3月4日

²¹¹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²¹² 서승원. (2017). 박근혜 정부 시기 한국의 대 중국 전략적 사고에 관한 고찰. *아세아연구* 60(2), 115

[Suh Seung-won. 2017. A Study of South Korea's 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 China under Park Geun-hye Era - North Korea Reductionism,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115]

北韓的第4次核試驗與飛彈發射試驗，成為了韓國政府對中國的對北韓政策失望的契機。

213

透過這一契機，韓國政府決定了駐韓美軍的部署薩德飛彈，並再強化韓國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對部署薩德的決定，中國政府公開表示反對。中國的實際行動是，抵制韓國企業商品運動、限制韓國旅行、取消在中國韓國藝人的活動、禁止播放韓國電視節目、禁止進口韓國手機遊戲等等。中國的這種行動對韓國基督教傳教士也產生了影響。

據BBC報道，2017年2月，韓國外交部表示，同年1月，中國驅逐了32名韓國傳教士，2月又有韓國人被捕。²¹⁴ 同時，1名韓國人與包括美國國籍的韓裔傳教士內的4名傳教士，因涉嫌違反出入境相關規定，在中國延邊地區被公安逮捕。²¹⁵ 被驅逐的韓國傳教士認為，中國政府一直關注傳教士的動向，突然採取強硬措施，與薩德部署有關。中國政府已經對北韓與中國邊境地區活動的傳教士，進行嚴格的管制。因此，最近東北三省的韓國傳教士從800人減少到400人，因薩德部署事件，韓國傳教士的活動更萎縮。所以韓國外交部再次對韓國教會建議，傳教活動要尊重當地的法律和習俗。另外，為了不刺激中國政府，韓國政府拜託勿在中國境內舉行韓國傳教士聚會，勿派遣韓國短期傳教團體。在中國，對韓國人簽證比其他國家更加嚴格。由於中國不允許宗教簽證，傳教士透過學生或訪問簽證入境，但在薩德事件發生後，發長期簽證上出現了困難。後來，中國雖然採取放寬對外國人簽證的措施，但是韓國還不適用。韓國的媒體和大眾認為，驅逐韓國傳教士是中國對韓國部署薩德飛彈事件的報復。同時，由於限韓令，反華情緒在韓國也進一步擴散。

韓國政府的薩德部署事件，對幫助脫北者的韓國傳教士也產生了影響。2017年2月，中國公安逮捕兩名幫助脫北者的韓國傳教士，收監在遼寧省的監獄裡。對此事件，韓國政府的一位負責人分析說：「這可能是因為薩德飛彈部署事件而憤怒的中國向韓國

²¹³ 同註212，127

²¹⁴ 同註59

²¹⁵ 문혜성. (2017/3/15). 중국 사드 보복, 선교에도 악영향. 《한국 성결신문》
[Moon Hye sung. (2017/3/15). China's retaliation against THAAD will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missionary work. 《韓國聖潔新聞》] <http://www.kehc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8691>

發出的警告。」一位脫北者支援團體代表解釋，薩德飛彈部署發生之前，中韓關係處於親密狀態時，透過外交部的秘密工作，中國公安釋放脫北者的情況也時有發生，但韓國政府實施薩德飛彈部署後，外交部的介入反而會使情況更加惡化。²¹⁶

外媒也分析，中國政府逮捕韓國傳教士，以及驅逐韓國傳教士是為了報復部署薩德飛彈的決定。並且逮捕韓國傳教士應該是在中國驅逐韓國企業、取消韓國藝人演出等潮流下進行的。但是韓國外交部分分析，這種情況是，透過2017年1月舉行的中國宗教局長會議，中國更強化宗教業務法治問題上的理由。²¹⁷

中國國內也出現對韓國文化的排斥。筆者採訪的傳教士說：「薩德事件發生後，中共政府對韓國進行了負面報道，或限制了韓國電視劇和廣播的播映。」因為韓流已經在全中國影響很大，所以K-POP、化妝品、電視節目，以青年為中心擴散。據悉，中央政府認為這種現象很危險，遂大量限制韓國廣播。²¹⁸ 薩德部署事件發生時，中國政府特意禁止中國人赴韓國旅遊，也給韓國企業帶來了不利影響。但是普通的中國人對政治事件並不關心，因此並未太在意，大學生們理解該情況是政治上的問題，因此與韓國人的個別關係並未受到太大的影響。但是具有民族思想的保守派人士在中央政府的宣傳下，對韓國持否定的態度。²¹⁹

二、 南北韓關係與中韓關係

由於韓國與北韓的關係，中韓關係也出現差異。而且中韓關係下，距離北韓地理位置越近，傳教士的處境越是艱困。特別是，南北韓之間的問題中，與中國有相關的問題是脫北者問題以及朝鮮族的問題。對於該問題，中國的東北地區受到較大影響。

²¹⁶ 지성림. (2017.03.16). 한중 사드 갈등, 탈북자 한국행에도 불똥. 《연합뉴스》

[Ji Seong-rim. (2017/3/16) South Korea-China THAAD conflict sparks fire even as North Korean defectors go to South Korea.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www.yna.co.kr/view/MYH20170316014000038>

²¹⁷ 이은혜. (2017.02.13). 중국 공안에 선교사 줄줄이 체포, 왜?. 《뉴스앤조이》

[Lee Eun-hye. (2017/2/13). Chinese police arrested missionaries in a row. Why? 《Newsnjoy》] <https://www.newsnjoy.or.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08849>

²¹⁸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¹⁹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居住在東北三省的韓國牧師或傳教士們可能會幫助脫北者，因此中國政府爲了與北韓的關係，持續瞭解韓國牧師們的動態。另外，中國政府爲了東北工程，更進一步管理該地區，因爲中國政府不願意讓朝鮮族們培養民族意識，所以居住在東北地區的韓國傳教士的管理，有進一步加強的傾向。²²⁰

東北地區外，其他地區受與北韓關係的影響相對較小。但在脫北者人數較多的時，公安對中國南方省份的韓國傳教士進行了調查。公安警告韓國傳教士，即使見到脫北者也不可幫助他們。²²¹ 另一位傳教士說：「發生在與脫北者相關的傳教士的事件，是中國政府企圖在與韓國的關係中佔據優勢的一種手段。」由於東北地區的重要性，中國政府已經掌握居住在該地區的韓國傳教士，透過逮捕和釋放這些傳教士的過程，在南北韓之間選擇最符合本國利益的態度。

中國的全地區中，在距離北韓地理位置上比較遠的地方，因南北韓關係產生的中韓關係、中北關係產生的影響力較小。從以前開始，大部分中國人不想與外國人以政治主體進行對話。但是中國向國際開放後，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以政治主體開始了對話。一位傳教士說，無論任何地區，計程車司機都會至少一次談論與北韓有關的政治問題。有一位司機表達，薩德部署事件當時，韓國沒有站在中國一邊，並對此一主題持否定態度。對於這種態度，傳教士說：「韓國傳教士作為外國人，又作為傳教士的身份，不能做任何的主题的評論，即使宗教上不被發現，但如果對政治問題說錯話，也不清楚會怎麼樣，所以即使出現與韓國的內容，也要小心。」²²²

與脫北者有關的問題，在南北關係中佔據重要部分。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期，居住在中國東北地區或居住在北韓與中國邊境地區的韓國傳教士曾經幫助脫北者。對脫北者們之間有傳言：「如果到達中國後去朝鮮族居住地，先要去找教會。」因爲在朝鮮族地區的三自教會是中國政府的指導下，所以不能提供實質性的幫助，但是會協助聯繫其他韓國傳教士提供援助。韓國傳教士對脫北者在中國期間提供食衣住行，同時對他們進行傳教活動。²²³ 韓國傳教士們也會盡力為脫北者尋找進入韓國的方法、介

²²⁰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²²¹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²² 作者訪談，訪談人 3，台灣，2021年 3月4日

²²³ 김경진. (2015). 동북아시아 난민 네트워크와 비국가 행위자의 역할: 선교사와 탈북 브로커를 중

紹在韓國的仲介人、積極陪同脫北者一起前往韓國。但是隨著中國政府對傳教士的監視越來越緊密，北韓政府要求遣返脫北者的情況越來越多，並且進入韓國的各種路線與方法被發現，而擴散到中國與南北韓之間的外交問題。因此，已經非傳教士，而是脫北後定居在韓國的脫北者作為仲介人和引導者，與從北韓出來的人接觸後幫助他們。關於脫北者的問題，韓國傳教士在中國能發揮的作用比以前有所減少。儘管如此，以北韓傳教為目的，位於中國與北韓交界地區的韓國傳教士們仍想持續對脫北者進行傳教活動。

南北韓關係之間，另一個重要因素是朝鮮族。朝鮮族在韓國因為生活困難，或為了日本帝國主義時期的抗日運動，而移居到北方開始生活。此後，韓國分裂，中國成立，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從韓國的立場而言，朝鮮族是在外同胞，在南北韓關係、中韓關係中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因為脫北者最先到的地區是朝鮮族居住地區，所以與韓國政府的民族問題相關的政策有著密切的關聯。中國把朝鮮族視為少數民族之一。但由於朝鮮族居住地區是邊境地區，而且有自然資源，中國政府認識到朝鮮族地區在經濟與安保上處於重要的地位。另外，中共政府為了追求一個中國民族，對少數民族給予較多關心與照顧。²²⁴

中國的東北三省地區，基督教從1920年代開始傳教活動。雖然有加拿大或美國等外國傳教部門開始展開傳教活動，但由於語言的困難，外國傳教部門要求韓國長老會，建立教會與派遣傳教士，此後韓國傳教士持續被派遣往東北三省地區。朝鮮族教會在經歷抗日時期後，開始具有民族主義傾向，朝鮮族教會成為抗日活動的中心。但是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朝鮮族地區的教會也遵循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朝鮮族教會的勢力驟減。此後，隨著改革開放政策實施，教會又開始重新建立，並尋求中國教會的認同感開展活動。²²⁵

1992年，中韓建交後，韓國基督教界的關注轉向了中國。但是因為語言上的問題，

심으로. 66

[Kim Kyung Jin (2015). East-Asia Refugee Network and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Focusing on Missionaries and North Korean Brokers. 66]

²²⁴ 同註62，193-194.

²²⁵ 同註223，60-61

無法及時接近當地中國人，所以先接近朝鮮族。韓國教會在朝鮮族地區建立教會、或為了培養朝鮮族教會領導人而提供獎學金的方法等經濟的支援。但是這種方法反而產生了反效果。一些朝鮮族教徒對韓國傳教士先要求錢，一些在韓國學習神學的朝鮮族，收取傳教費後重新回到中國，但用錯誤的方法使用了傳教費。另外，韓國傳教士的講道翻譯成中文時，也有翻譯錯誤或以翻譯為藉口，要求更多經濟支援的事件。²²⁶

雖然朝鮮族教會是三自教會，處於中國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是由於韓國傳教士的持續積極接觸，中國政府更關切朝鮮族居住地。脫北者們也因為語言上的方便性，選擇先在朝鮮族地區定居，他們對脫北者懷有好感並給予幫助，還與外國傳教士聯繫，因此受到中國政府的監視。2000年代以後，隨著韓國直接與北韓進行對話，朝鮮族的角色也相對減少。國際社會對脫北者問題向中國施壓，但是中國政府對朝鮮族與脫北者的政策變得更加強硬。對此，中國政府集中管制朝鮮族居住地的教會，結果朝鮮族教會與韓國傳教士的接觸點越來越減少或是斷絕。²²⁷

南北韓關係對中韓關係與中北關係有極大的政治影響。但是對住在中國地區的韓國人並未受到太大的負面影響。特別對韓國傳教士而言，如果他們不明顯協助脫北者，或公開進行傳教活動，則只會受到警告性的措施。雖然隨著南北韓關係的變化，短期內受到國際關係上的影響，但這些因素只是中國政府對韓國傳教士的管理日趨強硬的原因之一。

三、 韓國總統彈劾事件

韓國朴槿惠總統的彈劾事件，對當時在中國的韓國傳教士產生了影響。中國人對將總統送進監獄的事情，感到非常驚訝，對做出政治性表述感到羨慕。因為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事情，示威的自由、政治表現，政治要求也不能被政府接受。該事件當時對中國政府產生如何影響尚不清楚，但給中國人提供一個比較認識韓國形象的機會，

²²⁶ 同註41，70

²²⁷ 同註223，70

也有助於傳教士的傳教活動。²²⁸ 由於發生在鄰近國家，此案有可能刺激中國內部的民主化，中共政府有意事先切斷有關彈劾的新聞或廣播，防止本國分裂。²²⁹ 因此，從傳教士的立場而言，這是一次讓中國人更容易、更熟悉接近韓國人的機會。

一位傳教士解釋說：「韓國的政治與社會狀態對中國產生影響，但積極地影響並不明確。」由於中國法律限制自由國家主張的宗教自由，即使中韓關係好轉，在當地得到的利益也不大，只是對安全的威脅有所緩解或變得更加寬容。但是國家之間的關係惡化時，損失相當大。中國人受中央政府的宣傳影響，態度變冷淡，在與當地人接觸和傳道時，發生困難。並且，由於與已經擁有良好關係的信徒也產生距離感，所以當地信徒們不願意將傳教士介紹給其他鄰居或家庭教會。特別是在2017到2018年間，與以前時期相比，韓國傳教士們受到更嚴厲的處罰或驅逐出境的案例時有所聞。²³⁰

由於韓國的流行文化在中國年輕人之間擴散，中國人對韓國人的關心更多，成為韓國傳教士們容易進行傳教活動的背景。政治上的因素也成為中國政府的宣傳手段，但一般人民都認為，這是出於政治目的。因此，與韓國傳教士建立個人關係，顯少產生負面的影響。但是，中國中央政府把政治因素作為壓迫或驅逐韓國傳教士的理由。

根據上述的因素進行分析，國際關係可以說明中國對基督教態度變化的因素，但是對於習近平第二期執政後驅逐韓國傳教士卻不足以完全說明。習近平以前，也有很多韓國傳教士，如果被發現違反中國傳教規定，就會被驅逐出境，否則在地方政府的默認下仍可以居住在中國。筆者認為，比起國際關係因素，中國內部宗教政策的變化對韓國傳教士產生更大的影響。該情況可以根據法律上的變化來觀察。

習近平之前，中國也有許多韓國傳教士，如果違規傳教行為被曝光，就會被強制驅逐出境，但由於當時中韓友好關係，以及中國想要進入國際社會的努力，中國地方政府默認外國傳教士的存在，如果沒人「告官」檢舉，通常都不會處理。這種現象在習近平第一個任期時仍然持續。但是，2017年第2屆任期開始後，不僅對韓國人、對外國傳教士的態度，也發生了更加明顯的變化。受當時韓中關係的影響，中國政府對韓

²²⁸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²⁹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²³⁰ 作者訪談，訪談人 6，台灣，2022年 2月5日

國傳教士的關心進一步增加，但僅憑國際關係問題不足以說明韓國傳教士的被驅逐出境情況。筆者認為，比起國際關係因素，中國內部宗教政策在法律體制上的變化對韓國傳教士產生更大的影響。

第二節 法律體制上變化的影響

習近平的執政帶來與以往中國領導人不同的現象，最大的變化是，將以前模糊的管理方法系統性地法治化，強化共產黨的紀律和法治規範。另外，由於執行反腐敗運動以及成立各領域領導小組，習近平自己還兼任許多職務，出現權力的個人集權化。

2018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修改國家主席任期，確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於決定中國的路線和治國方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在社會方面，追求小康社會，更加管控人民的社會參與和組織發展，更使人民在思想上也出現了變化。²³¹

管理方法上的法治化亦適用於宗教領域。2015年召開的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強調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需要法律管理，同時主張四個必須：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²³²，並在習近平的指揮下成立統一戰線工作領導小組，發表《中國共產黨統一戰線工作條例》，強調所有宗教管理政策都要由黨來管理。²³³ 2016年全國宗教工作會議再次確認宗教中國化，主張共產黨要指導宗教，防止國外勢力滲透。同時要重視法律在宗教事務中的運用，透過法律解決宗教與社會之間的矛盾，建立宗教與

²³¹ 陳德昇. (2018). 習近平時代體制變遷與治理策略：機遇與挑戰. 展望與探索月刊 16(5). 41-61

²³² 「習近平出席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2015/5/20). 《人民網》<http://pic.people.com.cn/BIG5/n/2015/0521/c1016-27032234.html>

：習近平強調，民族工作、宗教工作都是全局性工作。去年召開的中央民族工作會議，明確了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民族工作的大政方針和戰略任務，各級黨委要抓好會議精神貫徹落實，促進各民族和睦相處、和衷共濟、和諧發展。宗教工作本質上是群眾工作，要全面貫徹黨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依法管理宗教事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原則，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必須重視發揮宗教界人士作用，引導宗教努力為促進經濟發展、社會和諧、文化繁榮、民族團結、祖國統一服務。

²³³ 同註24

社會共存的關係。²³⁴ 並且習近平對共產黨員說：「要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更強調黨員的思想統一。²³⁵

2017年通過全國工作會議，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宗教理論的必要性，主張需要符合中國情況的宗教理論。同年，在胡錦濤時期實施的《宗教事務條例》中，增加新條款進行修改。2018年2月，國家宗教事務局歸屬於統一戰線部的下屬機構，宗教問題成為由國家單位管理。除此之外，《外國人出入境管理法》、《宗教活動場所登錄法》等的變化，也是基督教傳教士離開中國的主要原因。另外，行政系統的統合，也成為管理外國人傳教士的一個因素。習近平執政前，各地區管理是各自為政。即是，每個省少有與中央聯結或合併管理的情況。因此，即使在A省進行傳教活動時遭到驅逐，也可以前往A省以外的地區持續進行傳教活動。但是，習近平執政後，中國全國性的行政系統被統一管理，若在某一個省被驅逐出境，從國外入境中國被拒絕。再入境中國的話，大約需要7年到10年的時間。²³⁶

2013年習近平開始執政初期，當時韓國基督教界對中國傳教與教會抱有肯定的期待。另外，江澤民、胡錦濤時期，傳教活動沒有太大的困難，所以傳教專家預測認為習近平時期不會改變，反而對基督教更加肯定。²³⁷ 根據媒體報道，中國基督教界將中國教會的領導人派往韓國學習，以及韓國教會在中國協助傳教活動，還有在中國設立神學院等請求韓國基督教界的幫助，這種事件也是韓國基督教界與傳教士內部期待習近平執政後出現變化的因素。²³⁸ 當時，許多韓國傳教士進入中國，對他們的傳教活動沒有強迫的制約，而且中韓之間存在非正式的基督教交流，誰也沒想到新的領導人會對基督教表現出更加強硬的態度。另外，與以前政府相比，沒有特別惡化或好轉的跡象，因為當時對基督教的氛圍是積極的，所以比較充滿期待感。²³⁹ 該種期待感的原因

²³⁴ 孟 璐. (2020). 習近平宗教工作思想視域下的宗教治理法治化研究. 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5). 6-10+14. doi:10.19406/j.cnki.cqkxyxbskb.2020.05.003.

²³⁵ 同註3

²³⁶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³⁷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³⁸ 作者訪談，訪談人 5，台灣，2021年 11月24日

²³⁹ 作者訪談，訪談人 1，台灣，2021年 2月6日

是，中國在經濟上、國際政治上均呈現發展，其影響力擴大，中國內部的基督徒的人口也劇增，新領導人的出現可能會引發新的變化。

習近平執政後，與韓國基督教界與傳教士預想的不同。變化最大的地區是少數民族的地區。中國政府一直對少數民族進行管理。特別是少數民族有特定宗教時，對他們的管理更加嚴格。但是與江澤民、胡錦濤時期相比，習近平執政後對少數民族與宗教的管控更加緊密。

筆者訪談的一位傳教士表示，在傳教的A地區，2012-2015年間，韓國短期傳教團體在進行傳教活動時，經常被公安發現。所以，該地區政府與公安開始觀察韓國人，即使上語言學院，也限制外國學生的年齡等，逐漸出現具體的制裁措施。因此，2012年到2015年之間，外國傳教士的大門逐漸關閉，管理與監督進一步加嚴。中央政府尤其高度警惕宗教與少數民族的聯繫，因此，對於外部勢力的聯合、與外國人的活動等反應敏感。為了切斷外國學生與地區學生的接觸點，還採取了在道路或巷子等處建設鐵門等直接行動。居住的地區也讓外國人與當地人分開居住，即使是當地人，出入時也要向公安出示身份證等，進一步加強保安工作。該地區的傳教士推測，不僅是短期傳教團體的傳教活動，或者是A地區民族的反政府態度，都是導致中共政府更加嚴格管理的因素。不僅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主張的政治教育，在習近平時期更強調，透過一週一次的政治教育，學到胡錦濤強調的「三個代表」，更加強對「中國夢」、「小康社會」等思想教育。²⁴⁰

在少數民族密集地區，宗教政策運用作為民族政策的一環。尤其是，有宗教信仰的少數民族，宗教與民族性結合，易出現反抗中國政府的現象。因此，為了阻止少數民族的從中國分裂，試圖進一步控制防止少數民族聯合的宗教發展。同時，外部活動頻繁的基督教也成為與外部勢力結合的通道，因此中央政府採取同時管理民族政策和宗教。居住在該地區的基督教傳教士，因為長期間從事傳教活動，所以在某種程度上，順應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對基督教的政策，但韓國人短期傳教團體比起長期居留傳教士，更公開、積極地進行傳教活動，所以引起當地人和地方政府官員、公安的注意。因此造成韓國傳教士受到在中國所屬學校或公司等團體的管理人員召集起來加以警告，

²⁴⁰ 作者訪談，訪談人 3，台灣，2021年 3月4日

切勿進行積極地宗教活動，亦不可向當地人傳道或提及宗教問題。²⁴¹

習近平執政的最初5年內，表面上對待基督教採取容納與寬容的態度，但是實際上並未顯現明確的變化，當地的反應是，對中國教會開始實行強制性管制。²⁴² 在第一任期內，習近平在政治上穩定了權力，培養自己的勢力，掌握了實權。與此同時，在基督教部分把握傳教士的動態。一位傳教士分析說：「習近平初期5年間，確認哪些人是以傳教士的身份入境的，還將他們分為中國政府需要的人和不需要的人，雖然是傳教士但身為必要的人士，就可以留下，而必須被驅逐的人士，就直接驅逐出境。這種區分是為了未來實行宗教政策，所作的前期工程。」從2016年開始驅逐外國傳教士，在此期間，全國範圍內實行有關宗教的新法律，似乎事先確認哪些法律最有效，如何才能得到最佳效果。因此，根據從2016年開始實施的各種宗教條例，無論是哪個國家傳教士，除了10~20%的傳教士外，都出現驅逐的趨勢。尤其是韓國傳教士最多，他們大多被驅逐出境，目前所剩人員寥寥無幾。²⁴³

一、新宗教事務條例

習近平的第二次任期開始後，出現以穩定的實權為基礎，管理屬於思想、文化領域的宗教現象。²⁴⁴ 最具代表性的是，在宗教界出現法律上的變化，即2018年實行的新宗教事務條例。事實上，習近平執政後每年發表一次有關教會的宗教條例。這種現象並未發生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而這些條例的一大特點是，強調違反條例要處以鉅額罰款。據受訪傳教士表示：依照胡錦濤時期的宗教事務條例，信徒們無所畏懼，但在新的宗教條例下，黨國試圖透過罰款控制教會，並取得明顯的效果。²⁴⁵

中國政府要求，在人民聚會時須向政府申報。基督教根據登記與否，分為政府登

²⁴¹ 作者訪談，訪談人 3，台灣，2021年 3月4日

²⁴² 作者訪談，訪談人 5，台灣，2021年 11月24日

²⁴³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²⁴⁴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²⁴⁵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記的三自教會，以及未登記的家庭教會，政府曾勸未登記的家庭教會，登記進入宗教活動場所的三自教會的框架內。但從2017年，不再進行懷柔政策，而直接強硬規定家庭教會進行集會登記。因此，大城市內的大型家庭教會逐漸浮出檯面，只得向政府登記。但是這項看似單純的行政命令，實質上成為控制教會的一種方法。具體來說，中國政府除了控制在教會內聚會的人數，而且對於中國教會與外國傳教士相關的部分，比以往更為敏感。

2018年2月，新宗教事務條例開始後，中國內部的宗教也出現了變化。以基督教為例，在政府登記的三自教會也發生新的現象。在新宗教事務條例通過之前，儘管中國憲法規定，未滿18歲的學生不能去宗教活動場所，但政府對未成年人參加三自教會時，表現出了寬容的態度。²⁴⁶ 但是本條例施行後，三自教會的主日學完全消失，對未滿18歲的學生去教會也進行更徹底的管制。²⁴⁷

另外，宗教事務條例對中國教會試圖與外國人或外國團體聯合或建立關係一事，進行更徹底的調查與干涉。同時，在聖地巡禮方面，以往政權與習近平政權的對策也有所不同。前政權允許中國人前往以色列朝聖，但在新宗教事務條例實施後，禁止朝聖。對出版物也進一步管控。未經政府批准的組織或個人不得印刷、製作宗教資料，因此家庭教會等非認可團體編輯、印刷或製作的內部資料也被視為非法。條例通過之前，基督教書店等公開場所也比較開放，但條例通過後，對書店等場所也進一步嚴密監視。

新宗教事務條例通過後，最先出現的變化是警察的態度。筆者訪談的一位傳教士說：「以前靠地方官員，或地方警察的關係可以順利過關，但在新條例通過執行後，更經常地接受調查。首先是以對外國人進行調查為藉口傳喚到派出所，其次是以韓國人為對象接受調查。調查過程都有錄像，警察們對傳教士說：『因為是上級的命令，所以一定要做的。』」

另外，傳教士曾用自己的手機直接撥打公安電話確認，警察回答：「你是來自韓

²⁴⁶ 未成年人保護法 第三條：國家保障未成年人的生存權、發展權、發展權、受保護權、參與權等權利。未成年人依法平等地享有各項權利，不因本人及其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民族、種族、性別、戶籍、職業、宗教信仰、教育程度、家庭狀況、身心健康狀況等收到歧視。

²⁴⁷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國D城市的a教會吧?」。由此可以看出，中國政府已經確實掌握國內的外國傳教士的背景、動態、活動領域等，並且已經完成了所有調查。

雖然受宗教事務條例的影響，對傳教士的管控加緊。但是習近平執政以前，公安隨時到傳教士的住處，一邊說「10分鐘內打包行李出去」，一邊押送到上飛機，或者嚴重時直接移送公安部拷問等。而習近平細化制定許多法律，根據法律依據遣送傳教士出境。一位傳教士把習近平的這種態度形容為「非常Nice的態度」。大部分法律依據是不延長簽證，或拒絕發放簽證。或者在簽證到期前一個月找到相關傳教士，勸其簽證到期當天必須離開中國。無論學生簽證、旅行簽證、商業簽證，均適用。²⁴⁸

在延長簽證方面，習近平執政後變得更加複雜。江澤民、胡錦濤時期，韓國傳教士們簽證面試的時候，只聽取宗教活動的注意事項，從習近平執政2-3年後開始，有關宗教的提問就更多，更多的公務員直接告誡不要參加宗教活動。另外，申請延長簽證也不一定能成功，經常接到申請旅行簽證不能通過的通知。同時，隨着社會信用體系的發展，每50米安裝監視器，更詳細瞭解人們來往情況，網絡搜索詞彙也更多的限制。如果在網吧搜索基督教相關的詞彙，10分鐘內警察即到達，還得去警察局接受調查。這些情況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是沒發生過的。²⁴⁹

宗教相關法律的系統化也適用於外國人的組織。即是，非政府機構(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團體相關的內容。中國為了解決社會福利問題，需要NGO團體的協助，但習近平警惕防止透過NGO滲透西方思維。因為大部分NGO團體的外國人都是基督教徒，西方基督教勢力的資本流入團體。因此，公然使用NGO一詞是危險的。為了警惕這種的NGO團體，中國在2017年1月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實行非政府組織登記制。儘管如此，隨着世界化在中國內部逐漸擴散，出現政府無法管理的領域，不可能完全禁止NGO的活動。因此，韓國基督教團體和傳教士分析，不要放棄透過民間團體進行傳教活動的可能性。²⁵⁰

上述原因，引起中國政府或中國人民對待韓國傳教士和美國傳教士的差異態度。

²⁴⁸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⁴⁹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⁵⁰ 同註27，176-177

²⁵¹ 美國或西方的傳教士們習慣以學校或醫院等公共利益為手段，透過政府可以容忍的方法進行傳教。但是，由於韓國傳教士們追求建立教會或直接向一般中國人民傳教，所以對於中國政府而言，成為需要進一步管理的對象。所以筆者訪談的B傳教士說：「我跟別的韓國人和西方人一起活動的NGO合作工作，在那個團體工作的外國人逐漸被驅逐出中國，還接到將NGO職員全部換成中國人的命令。」²⁵²

另一個受注目的組織是國際學校。習近平上台之前，在英國或美國經營的中國內部國際學校，幾乎不受中國政府的控制。在中國的大部分國際學校都是以基督教精神為基礎建立的，學校的教師和行政人員也擔當着傳教士的角色。但習近平要公安機關派員到這些國際學校，進行扣押搜查，並驅逐大批教師和與學校有關的傳教士。²⁵³ 同時，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中，對宗教學校的法令更加具體細化，中央政府的影響力，也進一步擴大到學校行政和教育事務上。宗教教職部分以前也由學校內部決定，但中央政府逐漸直接管理外國教授等教職人員的任命，國家更加管控對宗教的執行能力。

²⁵⁴

習近平希望把基督教和在中國的所有宗教法制化。透過黨政機構的改編也可以觀察到這一點。2018年，已管理少數民族的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以及宗教管理局被分配到統一戰線部的監督下，中央宣傳部被改編為負責管理全國新聞、出版物、網路媒體事業等，並將中央網路安全與信息化領導小組提升為中國共產黨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

作為宗教法治化政策的一環，對網絡的管制也進一步增強。隨着網絡的發展，許多海外教會或外國傳教士將聖經、聖經註釋等與信仰相關的書籍製作成文件普及到中國教會，如果不能直接去中國，還利用視頻會議等方式到神學院講課或引導禮拜。但習近平政府開始後，警惕與外部世界相連的網絡，給中國帶來威脅以及政府無意中發生的變化。²⁵⁵ 透過2017年 11月實施的《互聯網域名管理辦法》，中國共產黨依法在網

²⁵¹ 作者訪談，訪談人 2:3，台灣，2021年 2月25日，3月4日

²⁵²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⁵³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⁵⁴ 同註175，196

²⁵⁵ 왕빈. (2017). 제2기 시진핑 체제 등장과 중국 교회의 길. [웹진] 중국을 주께로 (통권173호). 중

路上，不僅擴大黨的宗教政策，而且擴大共產黨政策的宣傳，檢查也變得強硬。

某一位受訪傳教士說出以下經驗：

「教會的一名中國信徒，在網吧搜索福音中國等基督教詞彙時，被警方逮捕。該信徒在警察局接受約40-50分鐘的調查。這種事件在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是沒有發生過。」

256

宗教事務條例等法令的施行，與其他宗教相比，對基督教會比較不利。即使是已經向政府登記的教會，未註冊的家庭教會也更加不利。不得不在宗教事務局的控制下向政府登記，而一部分未登記的教會，爲了不受國家的控制，便更隱蔽地走入祕密組織。²⁵⁷ 傳教士表示說：「政府登記的教會強調基督教的中國化，並強力實行，因此在家庭教會內引起紛爭。」中共政府意圖透過家庭教會內訌，讓欲擺脫中央政府的控制的家庭教會，進入政府的控制之下，不僅是三自教會，對家庭教會的管制也進一步加強。

由此可以看出，習近平之後對傳教士入境的限制變得更加嚴苛。但是傳教士的管理和驅逐也大多以規範和法律爲主，而不是直接強迫的行動。這可以得出習近平執政後強調的法治主義實際運用的結果。

二、宗教中國化

宗教的中國化，是建國後一直被提及的政策。特別是對基督教，至今已提出兩次。第一個階段是，1920年代以本土化的名義推進，第二個階段是，1949年建國至今以三自化推進。²⁵⁸ 與以前政權相比，習近平執政以後，該政策實行得更加實際。

국어문선교회

[Wang Bin (2017). The Second Xi Jinping System and the Path to the Church of China. [Webzine] 173. China to the Lord. Chinese Literary Church] http://www.chinatogod.com/main/z2s_c_v.php?no=3734&ctg_no=173&div=2

²⁵⁶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⁵⁷ 作者訪談，訪談人 5，台灣，2021年 11月24日

²⁵⁸ 조은식. (2016). 탈북자를 위한 중국교회의 역할. 선교신학 41. 397

[Eunsik Cho (2016). Roles of Chinese Churches for 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 Korea Society of Mission Stu

習近平打着中國夢的旗號，極力執行共產黨主導的統治。爲此，既需要外部勢力的協助，又需要不斷牽制外部勢力，以免對共產黨構成威脅。這適用於宗教的是「宗教的中國化」。即是，基督教必須適應中國社會，並且教會是社會體制的基層結構，教會系統必須得到中國社會的認可。²⁵⁹ 習近平2015年5月，在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上表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必須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必須辯證看待宗教的社會作用。」²⁶⁰ 接著在2016年4月，舉行的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主張宗教中國化：「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支持我國宗教堅持中國化方向。」²⁶¹ 這也可以看作是，習近平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在這次會議上，他提出兩個目的以及一種方法。兩個目的是：第一，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要徹底指導宗教工作；第二，宗教要中國化，不能接受外國的干涉。一種方法是指要按照宗教法管理宗教。²⁶² 習近平執政後，中國政府認爲，宗教弱化人民社會主義的意識體系，邪教和宗教極端主義勢力被用於反政府活動，因此爲了政權和社會穩定，將宗教作爲重要問題進行處理。²⁶³ 爲此，習近平強調在強有力的法制化治理下執行宗教政策。因此，習近平強調宗教中國化時，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和中國基督教協會於2017年12月發表《推進我國基督教中國化五年工作規劃綱要》，最先作出反應。但是未註冊教會的反應卻不相同。²⁶⁴

強調宗教中國化的原因是，基督教或伊斯蘭教逐漸成長，宗教成爲反對政權的勢力的可能性變得嚴重。²⁶⁵ 因此，要警惕宗教的極端主義，事先防止宗教活動對社會穩定構成威脅。宗教中國化政策首先運用於穆斯林的少數民族，並逐漸擴大到其他宗教。

dies 41. 397]

²⁵⁹ 同註255

²⁶⁰ 習近平出席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2015/05/20). 《人民網》. <http://pic.people.com.cn/BIG5/n/2015/0521/c1016-27032234.html>

²⁶¹ 習近平：全面提高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2016/04/23). 《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²⁶² 同註157，71

²⁶³ 同註175，192-193

²⁶⁴ 作者訪談，訪談人 1:3:4，台灣，2021年 2月6日，3月4日，4月23日

²⁶⁵ 同註151，144

佛教和道教等民間信仰，已經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實現中國化，因此沒有強烈反對或拒絕宗教中國化政策的態度，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是從西方傳入的宗教，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和他們的教義不一致，因此對這一政策表示擔憂。

基督教中國化的應用在三自教會。三自教會接受政府主張的宗教政策方向，因此，獲得宗教活動的合法性。中國化是指接受外部文化、同化後變成中國文化，強迫中國文化進入其他文化圈，使其文化化。²⁶⁶ 其適用於宗教，能稱為宗教的中國化，具體而言，即使外來宗教進入中國，也要保持原有的獨特性，接受和適應中國文化，從內容到形式都體現中國特色，與中國政治、社會、文化相協調。同時，該政策也意味着，不僅是從外來宗教，中國內部發生的宗教，隨着中國社會的發展，也要適應其變化，不斷發展。²⁶⁷

基督教中國化的三種革新要素，可以看作是「對中國政治的認同」、「對中國社會的適應」、「對中國文化的表達」。這就是基督教的「政治的中國化」、「結構和體系的中國化」、「文化部分的中國化」。²⁶⁸ 另外五進五化政策也相當於基督教的中國化。五進是中國共產黨與政府要進入教會內的五個領域，即是「宗教政策法規進教堂」、「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知識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這一領域具體化的就是「五化」，即是「宗教本土化」、「管理規範化」、「神學本土化」、「財務公開化」、「教義適應化」。

該政策在浙江省和江蘇省試行，例如，禮拜堂正面要左右懸掛毛澤東和習近平的肖像，拆除教會外部和內部的十字架，在講道前對愛國愛教進行訓話等。²⁶⁹

除此之外，還有在三自教會升國旗、禮拜開始前唱國歌、監視週日講道的內容、建議使用中國的詩歌而不是西方國家的詩歌、讚揚中國政府、講道中強調中國的優越性、牧師穿着中國式服裝登上講臺、將中國的傳說或故事插入聖經等。另外，在教會內部懸掛以政府宗教法規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內容的標語，牧師們使用中國傳統

²⁶⁶ 同註258，397

²⁶⁷ 同註175，194

²⁶⁸ 同註129，62-63

²⁶⁹ 同註175，201

文化進行宗教活動，並學習習近平語錄或孔子思想。²⁷⁰

透過在教會內設置監視器，不僅對三自教會，對家庭教會的管控也變得更加嚴格。因此，在家庭教會內，也分為想要轉移到三自教會的群體，以及想要維持家庭教會的群體。或者，家庭教會的所有信徒都轉移到政府公認的三自教會。但是其中也有信徒，對三自教會的神學教義感到反感，重新回到家庭教會。²⁷¹

基督教中國化政策的另一個實際事例是，始於浙江省的十字架拆除事件。浙江省有關部門，以拆除違建宗教建築為名，拆除十字架。浙江省政府強調，十字架是宗教建築的非法狀態，並主張政府對此正在執法，不侵犯實際宗教信仰自由。中國政府解釋說，基督教會的十字架象徵着西方國家的價值觀，並且威脅和反對中國的政治理念，所以誘導中國教會不要使用西方傳教士的信仰，以及價值觀中出現的宗教性表達方式，而應該使用符合中國情況的、符合社會主義的表達方式。²⁷²

許多傳教士對宗教中國化的擔憂是，黨對基督教教義以及教規的控制。宗教局局長王作安在2017年「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60週年紀念會」上主張：「推進有中國特色的神學思想，並強調基督教中國化的核心是神學思想的中國化。」²⁷³ 對此，韓國基督教學者和傳教士分析，這意味着中國共產黨將為神學的中國化發揮積極作用。

其中《聖經》的再翻譯以及註釋工作，是基督教中國化過程中韓國基督教界和傳教士最擔心的部分。據說，中國內部除了聖經之外，讚美詩也有為適應中國而重新創作的動向。²⁷⁴ 中國政府向神學研究者強調，中國新聖經應包括中國傳統的理論、文化表現和詞彙，福音應結合中國傳統文化，應結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中共綱領的內容，

²⁷⁰ 유미경. (2020). 중국기독교 규장제도와 기독교중국화. 중국학 (70). 77

[Yoo Mi-Kueng. (2020). A Study on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Chinese Studies (70). 77]

²⁷¹ Sarah Lee, Kevin J. O'Brien. (2021). Adapting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Protestant Pastors and the Xi Jinping Effe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²⁷² Ying, F. T. (2018). The Politics of Cross Demolition: A Religion-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ree Rectifications and One Demolition" Campaign in Zhejiang Province.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 44-54

²⁷³ 王作安局長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60週年紀念會上的講話. (2017/12/5). 《中國基督教網》<https://www.ccctspm.org/cppccinfo/9684>

²⁷⁴ 作者訪談，訪談人 2，台灣，2021年 2月25日

應追求合理的科學知識。²⁷⁵

基督教之所以強調中國化，是因為恐懼基督教成爲一教獨大的宗教。特別是，到習近平時期，中國的基督教有爆發性的成長。有人說，基督教信徒的數量比共產黨員多，共產黨員之間也出現非公開基督教信徒。另外，黨幹部的子女們從西方留學回到中國時接觸基督教，學習基督教的教義，並向他們的家人和朋友說明基督教，在知識分子中表現出承認基督教並肯定的態度。這使中國政府感到對維持政權的威脅，習近平開始遏制這種情況。

另一個原因是基督教是代表西方的宗教。隨着國際化的持續擴散，中國內部也有可能透過基督教流入民主思想，因此習近平正在警惕基督教。另外，爲了強調中國共產黨追求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思想，認爲最大的障礙就是基督教。因此，要求基督教建立受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共產黨領導的教會，同時，如果教會在政治上成爲妨礙因素，中國政府就會公開施壓或採取強制性行動，並爲實施這一制度加強現有的宗教政策和內部管制。²⁷⁶

宗教中國化作爲宗教政策的一環，希望整合中國人民，防止宗教極端主義，與外部勢力聯合，而且是自主管理宗教。但是該政策被外國傳教士認爲是，與基督教教義相反的中國思想。²⁷⁷ 韓國傳教士們主張，如果基督教的教理和文化與中國文化相結合，基督教就會失去宗教的特徵。另外，如果政府對十字架的拆除等基督教的象徵性東西進行鎮壓，中國教會人士的態度有可能轉變爲反基督教的態度。對此，中國政府爲了中國內部的團結和對政權的穩定性、正當性，特別加強對外國傳教士的管理監督，其結果顯示，在中國佔最多人數的韓國傳教士被大規模驅逐出境。

²⁷⁵ 성경을 다시 기록하려는 중국의 계획. (2018/11/13). 《한국VOM (Voice of the Martyrs)》 [China's Plan to Re-record the Bible. (2018/11/13). 《Korea VOM》]

²⁷⁶ 作者訪談，訪談人 4，台灣，2021年 4月23日

²⁷⁷ 作者訪談，訪談人 1:3:4:5，台灣，2021年 2月5日，3月4日，4月3日，11月24日

第三節 小結

習近平執政後，宗教界的最大變化是政策在法律執行層面上的變化。特別是在與韓國傳教士有關的領域，雖然韓中關係中發生的各種事件也會產生影響，但是國家之間關係中發生的事件，只在相對有限時間內發揮的影響力。根據筆者採訪傳教士的資料，中韓關係的結果可能影響整體中國內部的氛圍，但對傳教士和中國人民之間的個人關係沒有太大的影響。

但是中國共產黨決定的法律上變化，不僅對韓國傳教士，對中國人民的行為也產生直接影響。由此可見，開始嚴格管理外國人和中國人民的接觸，並且進一步加強宗教活動場所、外國人的出入境管理。這種法律的變化更加適用於以外國勢力為代表的基督教，居住在中國的韓國傳教士也受到了壓力。因此，習近平與前政權相比，更注重對宗教的直接管理，加強中央集權體系。



第七章 結論

本文以非西方傳教士的韓國傳教士為例，考察習近平政府的宗教政策。雖然基督教流入韓國的時間，比基督教流入中國的時期慢，但其增長速度更快。韓國基督教更從1910年代開始向中國派遣傳教士，並取得成功。但隨着中國內部政治的變化和國際局勢的變化，中國的宗教政策屢次發生變化，這也影響到韓國傳教士在中國的發展。

在中國，經過1920年代的非基督教運動、本土化運動，建國後形成了三自愛國運動，共產主義下的宗教政策有其近代史上的根源。中國共產黨透過各種法律規範承認宗教信仰自由，但各宗教團體的設立和宗教活動等，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進行，並切實要求遵守和支持黨的政策。從毛澤東時期到習近平時期持續不斷，另一個大的基調是「統一戰線」戰略。根據這一戰略，中國共產黨為了處理不同時代出現的矛盾，與以前敵對關係的對象聯合起來，而相對於與美國鬥爭或是追求經濟增長，宗教只是一個次要矛盾。因此，中國共產黨為了應對主要矛盾，還會聯合具有相反思想的宗教，特別是基督教，這在改革開放時期表現甚為明顯。為了經濟的發展，中共政府允許外國傳教士非公開地流入，甚至以基督教做為工具，促進中國與國際的交流。

中國共產黨和基督教的關係，是習近平執政後出現較大的變化。1990年代，韓國與中國的經濟、人才交流不斷擴大，韓國傳教士進入中國的迅速增加。此後，韓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在中國擴散，韓國基督教界派遣到中國的傳教士所佔比率最高。但隨著2017年習近平第二任期執政開始，出現大規模驅逐韓國傳教士的現象。所以筆者的問題意識在於「習近平時期驅逐韓國傳教士的原因是什麼？」筆者以中國內部因素、國際關係的影響、韓國傳教士內部問題為假設，透過採訪在中國直接進行傳教活動的韓國傳教士，分析其原因。

筆者透過與傳教士的採訪得出的結論如下。習近平時期，在中國出現韓國人傳教士被驅逐的原因，可以檢驗前述三個假設。從國際關係的影響而言，特別是韓中關係的外交部分。但這種政治事件，只在一個時期內產生特定的強烈影響，因此不足以說明整體原因。韓國傳教士內部的問題也產生影響。由於存在不理解或接受中國內部情況，而隨機進行傳教活動的情況，因此中國政府與中國人民，有時反而對一些韓國傳教士的作法持否定觀點。

但除了上述兩個解釋，最大的原因還是中國內部因素。特別是習近平執政後，中國內部發生的變化，對韓國傳教士也產生很大的影響。習近平執政之前，基督教相關規定、外國人相關規定已經存在，但中國內部由於各地方不同的行政法、地方間的經濟差異、地方間宗教政策和執行該政策的人的差異，未能完全掌握韓國傳教士的傳教活動，傳教士和地方公務員的關係，傳教活動也被默認。習近平執政後，中國經濟增長和國際地位上升，中國內部監管相關技術進步以及習近平追求的政治目標等的原因，對中國國內佔多數的韓國基督教傳教士，得以直接的施加壓力。

透過2018年實施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為代表的法令，以及黨可以直接介入宗教結構的變化，反映習近平追求中國夢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實現所有宗教的中國化的想法。其中主張基督教的中國化，並實際實行，不僅是對反對基督教的中國內部基督教信徒，對外國傳教士也實行了高壓政策。與以前的中國相比，變化最大的法令是與互聯網相關的法令。限制基督教相關搜索詞彙或最近隨着《互聯網宗教信息服務管理辦法》的施行，在國外通過網路對中國國內基督教信徒進行的傳教活動開始受到懲罰。習近平執政後，非自願從中國撤出的傳教士們一直通過網路進行講道、小組聚會、神學講座等，這些事情近期也被禁止。

因此，習近平執政後，由於中國內部監視功能技術的發展與習近平追求的政治目標，韓國傳教士開始受到壓迫，並且以更具體化、細緻化的法律，將更加嚴格地適用於黨的宗教政策，對各宗教也加強黨的領導力。特別是外部勢力介入的可能性較大的基督教，透過減少外國傳教士和中國人民的接觸點，可以看出習近平想要追求中國社會內部的封閉性。另外，對具有許多西方特徵的基督教實行宗教中國化政策，比起基督教的教義，更強調中國特色的思想和共產主義思想，謀求思想與信仰上的統一，可以看出習近平更追求中央集權體制的內部穩定性。由這些證據可知，習近平追求的社會治理方向與中國內部因素的變化，對驅逐韓國傳教士產生最大的影響。

今後有機會時，直接去中國繼續研究韓國傳教士的情況，以及透過以其他身份進行傳教活動的傳教士事例，分析中國的宗教政策實際上是如何執行的。另外，不僅韓國人，可以尋找其他國家傳教士的事例，比較中國政府對不同國家傳教士的態度中出現的共同點和差異點，研究中國的宗教政策與對外關係政策

是否有關聯。



參考文獻

一， 書籍

《中文》

- 邢福增. (2007).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香港：道風書社
- 葉至誠、葉立誠. 民88年. 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台北市：商鼎文化
- 羅竹風. (1987). 中國社會主義時期的宗教問題. 上海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羅偉虹. (2014). 中國基督教(新教)史 / 羅偉主編 (第1版 ed.). 上海市：上海人民.

《英文》

- Kang, W. (1997). *Christ and Caesar in modern Korea: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and politics*.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Robert E. Buswell Jr. and Timothy S. Lee eds. (2006). *Christianity in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Wielander, G. (2013). *Christian values in Communist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
- Yang, F. (2012). *Religion in China survival and revival under Communist rule / by Fenggang Ya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韓文》

- 金仁洙. (1994). 韓國基督教會史. 首爾：韓國長老教出版社
- 김경환. (2017). 씨 뿌리는 자—중국선교이야기. 서울 :생명나무
[Kim Kyung Hwan. (2017). *Seed Sowers—The Story of Chinese Missionary Mission*.

Seoul : a living tree]

- 김태연. (2017). 한국교회와 중국선교: 2030 중국 글로벌 예측신학. 서울:기독교문서선교회
[Kim Tae yeon. (2017). The Korean Church and The Mission For China: 2030 Chinese, Global Theostatics. Seoul: CLC: Christian Literature Center]
- 류대영. (2018). 한권으로 읽는 한국 기독교의 역사. 서울: 한국기독교역사연구소
[Ryu Dae Young (2018). A History of Protestantism in Korea. Seoul: The Institute of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Korea]
- 배본철. (2009). 세계 교회사 (성령, 일치, 선교). 서울: 도서출판영성네트워크
[Bae Bon-cheol. (2009). 世界教會史 (聖靈, 一致, 宣教). Seoul: spiritual network co. ltd]

二， 期刊論文

《中文》

- 丁 威. (2018). 习近平宗教工作思想视域下宗教治理政策探析. 新疆社会科学 1. 70-78
- 石家松. (2002). 江泽民與馬克思主義宗教觀. 淮陰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4(4). 429 - 432
- 邢福增. (2007). 反帝愛國與宗教革新－論中共建國初期的基督教<革新宣言>.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56. 91-141
- 邱均平，鄒菲(2004). 關於內容分析法的研究. 中國圖書館學報 30(2). 12-17
- 范麗娟. (1994). 深度訪談簡介. 戶外遊憩研究 7(2). 25-35
- 林祥庚. (2003). 我國宗教界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 黨史研究與教

學 (1). 10-16

- 金龍雲. (2012). 宗教與韓國對外關係研究狀況述論. 世界宗教文化 6. 111-115
- 孟璐. (2020). 習近平宗教工作思想視域下的宗教治理法治化研究. 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05). 6-10+14. doi:10.19406/j.cnki.cqkjxyxbskb.2020.05.003.
- 查時傑. (1984). 民國基督教會史(三)非基運動與本色化運動時期(1922~1927). 台大歷史學報. 10&11期. 375-436
- 馬嶺. (2009). 宗教自由內涵探析. 上海政法學院學報:法治論叢 24(2). 1-11
- 陳誠, 丁如. (2004). “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與宗教工作“四句話”. 中國宗教 (06). 15-17 5doi:CNKI:SUN:ZGZJ.0.2004-06-005
- 陳德昇. (2018). 習近平時代體制變遷與治理策略:機遇與挑戰. 展望與探索月刊 16(5). 41-61
- 孫曉娥. (2012). 深度訪談研究方法的實證論析[J]. 西安交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 101-106
- 盛亞軍. (2013). 建國初我國的宗教政策與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研究. 大慶師範學院學報 33(5). 128-133
- 張爾葭. (2017). 抗美援朝與湖南省基督教“三自”運動. 南通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33(2). 97 - 102
- 張踐. (2017). 中國政教關係的結構與特點.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 2. 91-98
- 彭學寶. (2011). 試析建國初期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 商丘師範學院學報 (08). 49-52
- 劉明定. (2013). 胡錦濤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宗教觀研究. 喀什師範學院學報 (02). 6-9. doi:10.13933/j.cnki.j.kashgar.teach.coll.2013.02.019.

- 劉建平. (2010). 抗美援朝時期中國基督教界的控訴運動. 二十一世紀 (121). 12 3-133
- 劉福軍. (2010). 江澤民宗教工作思想探析. 中共山西省委黨校學報 33(1). 15 - 18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9-1203.2010.01.004>
- 蘇文, 朱方長. (2012). 新時期胡錦濤的宗教思想研究. 經濟研究導刊(07). 214-2 15 <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3-291X.2012.07.092>
- 譚平, 梁昱慶. (2003). 試論江澤民的民族宗教思想. 中共成都市委黨校學報 4. 16 - 20 <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8-679X.2003.04.005>

《韓文》(姓名順序)

- 강승삼. (2002). 한국교회 해외선교에 NEVIUS 선교정책 적용에 대한 회고와 전망. 신학지남 69(3). 7-46
[Sung Sam Kang. (2002). Retrospective and Prospec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NEVIUS Missionary Policy to Overseas Mission in Korean Churches.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Quarterly 69(3). 7-46]
- 구성모. (2014). 초기 한국교회의 선교사 파송에 관한 연구. 신학과 선교 45(서울신학대학교 기독교신학연구소). 278-310
[Ku Seong Mo. (2014). A Study of The Early Korean Church's Despatch of Missions. Theology and Mission 45. 278-310]
- 김광성. (2013). 중국 종교자유정책에 대한 역사적 고찰. 복음과 선교 23(3). 9-38
[Kim Kwang Seong. (2013). Appropriate Mission for China in relation to Understanding the Chinese Religious Policy. EVANGELICAL MISSIONOLOGY 23(3). 9-38]
- 김광성. (2019). 중국의 종교정책이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에 미친 영향: 기독교

교 중국화에 대한 선교 실천적 대응. 선교와 신학 48. 43-81

[Kwang Seong Kim. (2019). The Effect of Chinese Religious Policy on Chinese Mission in Korean Church: Mission Practical Response to Sinolization of Christianity. Mission and Theology 48. 43-81]

- 김석주. (2016). 개혁 개방 이후 중국교회 현황과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 기독교사상 696. 73-82

[Kim Suk joo. (2016).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教會的現況以及韓國教會的中國傳教. 基督教思想 696. 73-82]

- 김성건. (2013). 고도성장 이후의 한국교회.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 38. 5-45.

[Kim Sung-Gun. (2013). The Korean Protestant Church after Its Rapid Growth :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Religion,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 (38). 5-45]

- 김성민. (2016). 시진핑 지도부의 사회-경제 정책과 그 선교적 함의. 복음과 선교 35 (한국복음주의선교신학회). 47-75

[Kim Sung Min. (2016). Xi Jinping Leading Group's Social-economic Policy and the Missional Implication. EVANGELICAL MISSIONOLOGY 35. 47-75]

- 김성환. (2013).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역사의 방향. 복음과 선교 23(3). 39-81.

[Kim Seong Hwan. (2013). The Orientation of Mission History for Chinese of Korean Church. EVANGELICAL MISSIONOLOGY 23(3). 39-81]

- 김영동. (2004). 한국 교회의 선교—선교초기부터 6.25이전까지. 선교와 신학 14. 33-67

[Young Dong Kim. (2004). Korean Churches Mission: From the Early Mission Period to the Korean War(6.25). Mission and Theology 14. 33-67]

- 김영동. (2012). 한국 장로교 선교 100년. 장신논단44(2). 105-128

[Young Dong Kim. (2012). One Hundred Years of Mission of the Korean Presbyterian Church: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Mission Theology. Journal of Presbyterian College and Theological Seminary 44(2). 105-128]

- 김영동. (2019). 입국거부와 추방 선교사의 역사적 통찰과 전망. 선교와 신학 47. 13-40
[Kim Young Dong. (2019).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Insights and Prospect of the Expulsion of Chinese Missionaries: Focus on the Communization of China and Recent Cases of Banishment. Mission and Theology 47. 13-40]
- 김영호. (2015). 기독교의 중국화에 대한 비판적 연구. 선교신학 40. 43-79
[Kim Young Ho. (2015). A Critical Study on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 Korea Society of Mission Studies 40. 43-79]
- 김은수. (2008). 한국교회 해외선교정책.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28). 5-37.
[Kim Eun-Soo. (2008). A Typological Study on Korean Churches' Overseas Mission Policy.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 (28). 5-37]
- 김종철. (2013). 일반논단: 종교의 자유와 그 한계에 관한 소고. 연세 공공거버넌스와 법 4(1). 35-80
[Jong Cheol Kim. (2013). The Concept of Religion and Limits of Freedom of Religion. Yonsei Journal of Public Governance & Law 4(1). 35-80]
- 김주덕. (2008). 한국 교회와 선교 신학의 상관관계. 대학과 선교 (15). 277-302
[Kim, Juduk. (2008). A Research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urch and the Theology of Mission in the Korean Church. University and Mission (15). 277-302]
- 김형석. (1995), 역사적 맥락에서 본 한중관계와 중국선교 문제. 한국기독교와 역사(4). 262-284
[Kim Hyung-seok. (1995). 從歷史脈絡看韓中關係和中國傳教問題. 韓國基督教與歷史(4). 262-284]
- 마민호. (2019). 모순론의 관점에서 종교중국화정책이 기독교에 미치는 영향. 복음과 선교 48(4). 173-214
[Minho Ma (2019). The Impacts of Sinicization of Religion on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radiction Theory. EVANGELICAL MISSIOLOGY 48(4). 173-214]

- 민경운. (2015). 산동을 중심으로 살펴 본 한국교회의 초기 선교사 파송. 한국기독교 역사연구소 소식 (112). 71-83 : 제340회 학술 발표회 주제발표1 발표문 (2015.11.07)

[Kyung-Woon Min. (2015). The dispatch of early missionaries from the Korean Church, which focused on Shandong.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 112. 71-83 (韓國基督教歷史學會第340屆學術發表會)]

- 박만준. (2006). 중국 제4세대 종교정책의 과제와 전망. 중소연구 29(4). 97-131

[Park Manjun. (2006). The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of China's Fourth Generation Religious Policy. Sino-Soviet Affairs 29(4). 97-131]

- 朴滿濬. (2019). 시진핑정권의 종교중국화공정이 중국종교정책에서가지는 역사적 함의. 중소연구 42(4). 119-164

[Park Manjun. (2019). A research on 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 of Xij Jinping regime's "changing religion into sino-enculturation" project in modern PRC religious policies. Sino-Soviet Affairs 42(4). 119-164]

- 박보경. (2010). 1950년 한국 전쟁 당시 한국 교회의 역할. 선교와 신학 26. 105-140 [Bokyoung Park. (2010). The Role of Korean Churches During the Korean War of 1950. Mission and Theology 26. 105-140]

- 박용규. (2004). 초기 한국장로교 해외선교. 신학지남 71(1). 83-108

[Yong Kyu Park. (2004). Early Korean Presbyterian missions overseas. The Presbyterian General Assembly Theological Seminary 71(1). 83-108]

- 박응규. (2019). 교회와 국가관계를 중심으로 본 3·1운동과 한국교회. 생명과 말씀 23(1). 153-195

[Edward UngKyu Pak. (2019). March First Movement and the Korean Church from a Perspective of Church and State Issue. Life and Word 23(1). 153-195]

- 서승원. (2017). 박근혜 정부 시기 한국의 대 중국 전략적 사고에 관한 고찰. *아세아연구* 60(2). 114-149.
[Suh Seung-won. (2017). A Study of South Korea's Strategic Thinking toward China under Park Geun-hye Era - North Korea Reductionism, Middle Power Diplomacy, and Fatalism of Penins. *The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0(2). 114-149]
- 송세관. (2017). THAAD 배치와 한중관계 발전 방향. *전략연구* 24(2). 87-114
[Song Se-gwan. (2017). THAAD deployment and the direction of Korea-China relationship develop.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4(2). 87-114]
- 신혜란. (2007). 심층인터뷰 연구방법론: 타인에게 배우는 데이터 수집·분석기법. *국토 (통권 307호)*. 60-68
[Shin Hye-ran. (2007). In-depth interview research methodology: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techniques learned from others. *Country of origin (Total No. 307)*. 60-68]
- 우심화. (1992). 중국 문화와 중국 교회의 역사. *기독교사상* 36(11). 16-29
[Yu Shin Hwa. (1992). Chinese Culture and History of the Church of China. *Christian thought* 36(11). 60-68]
- 우심화. (2012). 한국교회의 중국선교에 대한 진단과 제언. *기독교사상*. 50-63
[Yu Shin Hwa. (2012). Diagnosis and suggestion for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by Korean churches. *Christian thought*. 50-63]
- 유미경. (2020). 중국기독교 규장제도와 기독교중국화. *중국학* (70). 53-81
[Yoo Mi-Kueng. (2020). A Study on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Chinese Studies* (70). 53-81]
- 유원지. (2020). 중국의 국가-교회 관계를 재고하기: 베이징의 대학기독교학생회 사례를 중심으로. *비교문화연구* 26(1). 99-140.
[Yoo Wonji. (2020). Rethinking the Church-State Relationship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Campus Christian Fellowship in Beijing. *Cross-Cultural Studies* 26(1). 99-140]
- 윤진숙. (2010). 종교의 자유의 의미와 한계에 대한 고찰. *법학연구* 20(2).

113-136

[Yun Jin Sook. (2010). Articles: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Its Limitation. THE YONSEI LAW REVIEW 20(2). 113-136]

- 이광순. (2004). 한국선교 120년. 선교와 신학 14. 15-31
[Lee Kwang Soon. (2004). 120 Years of Korean Mission, Mission and Theology 14. 15-31]
- 이영희. (2007). 인터뷰조사기법: 질적 연구를 위한 인터뷰 성공기술. 국토 (1) 통권303호. 109-116
[Lee Young-hee. (2007). Interview Investigation Techniques: Interview Success Techniqu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Land (1) Customs No. 303. 109-116]
- 이찬석. (2018). 중국선교와 기독교의 중국화. 신학과 실천 62. 505-529
[Lee Chan Seok. 2018. Chinese Mission and the Sinicization of Christianity. Theology and Praxis 62. 505-529]
- 이현모. (2010). 변화된 중국 상황에서 한국 교회의 선교 방안. 복음과 실천 45(1). 301- 326
[Lee Hyun-Mo. (2010). 在變化的中國情況下, 韓國教會的傳教方案. 福音與實踐 45(1). 301-326]
- 이현주. (2017). 동아시아공동체 부상과 한국교회의 선교전략: 아세안과 중국 AIB 출범을 중심으로. 복음과 선교 40. 145-187
[Lee, Hyun Joo. (2017). The Rise of East Asian Community and the Mission Strategy of Korean Church: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AIB in ASEAN and China. EVANGELICAL MISSIOLOGY 40. 145-187]
- 잉푸쥡(邢福增),이혜원. (2012). 개혁개방 이후 중국에서의 국가. 기독교사상 (2). 76-94
[邢福增, Lee Hyewon. (2012). State in China After Reform and Openness. Christian thought (2). 76-94]
- 장규식, 유관지 (2006). 군사정권기 한국교회와 국가권력. 한국기독교와 역

사(24). 103-137

[Chang Kyu-Shik, Ryu gwan ji. (2006). Church and State during the Military Regime: Alliance of Church and State and the Overcoming of the past. Christianity and History in Korea (24). 103-137]

- 장훈태. (2014). 동북아 정세 변화와 한·중 관계 속에서 선교. 한국기독교신학논총 94(1). 271-299

[Chang Hun Tae. (2014). Toward Mis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Korea and China in Circumstance Change of North-east Asia. Korean Journal of Christian Studies 94(1). 271-299]

- 정경호. (2017). 세계 종교의 흐름 속에서 본 중국교회의 선교전략 (서북지역을 중심으로). 신학지남 84(1). 209-238

[Gyeong ho Jung. (2017). The Mission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Church in the Flow of the World Religion. 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Quarterly 84(1). 209-238]

- 정천구. (2006). 제7장 조선족, 탈북자 그리고 한중관계. 통일전략 6.1. 189-214

[Jeong Chun-koo. (2006). Korean Chinese and North Korean Defectors in Korea-China Relations. Unification Stratrgy 6(1). 189-214]

- 조은식. (2014). 한국교회의 선교 정책 비교. 한국기독교신학논총 94(1). 301-329

[Eun Sik Cho. (2017). A Comparative Study on Mission Policies of Korean Churches, Korean Journal of Christian Studies 94(1). 301-329]

- 조은식. (2016). 탈북자를 위한 중국교회의 역할. 선교신학 41. 391-421

[Eunsik Cho. (2016). Roles of Chinese Churches for North Korean Defectors. The Korea Society of Mission Studies 41. 391-421]

- 주승민. (2019). 미국 남장로교회의 한국선교에 관한 소고. 신학과 선교 55. 7-46

[Chu, Seoung Min. (2019). Mission Strategy of American Souther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Korea. Theology and Mission 55. 7-46]

- 진미수. (2018). 중국교회 삼자애국운동(三自愛國運動)연구: 1949~1954년을 중심으로. 복음과 선교 43. 251-288.
[Jin Mi Soo. (2018). A Study of ‘Three-Self Patriotic Movement’ among the Chinese Church: 1949-1954. EVANGELICAL MISSIOLOGY 43. 251-288]
- 최성일. (1998). 한국 개신교 성장의 역사와 전망. 신학연구39. 199-242
[Choi Sung-il. (1998). The Church Growth and the Future Prospect of the Korean Protestantism. Theological Studies 39. 199-242]
- 최진호. (2019). 선교사 입국 거절 상황과 대응. 선교와 신학 47. 77-117
[Choi Jin Ho. (2019). Missionary Entry Refusal Situation and Response: Focusing on the Korean Church. Mission and Theology 47. 77-117]
- 허명섭. (2004). 한국전쟁과 한국 교회 구조의 변화. 한국기독교신학논총 35(1). 155-177
[Myung Seob Heo. (2004). Korean War and the Sturctural Changes of the Korean Church. Korean Journal of Christian Studies 35(1). 155-177]
- 허원. (2014). 개혁 개방 후 중국의 종교신앙자유정책. 역사와 담론 72. 155-199.
[Huh Won. (2014).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HISTORY AND DISCOURSE (Journal of Historical Review) 72. 155-199]
- 허재철. (2011). 개혁·개방 이후 급속히 늘어나는 종교. 중국 사회주의의 동반자가 될 수 있을까?. 민족21(7). 110-113
[Heo Jae-chul. (2011). 改革開放後，宗教迅速增長，能否成爲中國社會主義的夥伴？. 民族21(7). 110-113]
- 홍강. (2021). 중국교회의 현주소와 중국선교: 중국 신학자들의 신학 사상에 대한 고찰을 중심으로. 선교와 신학 53. 489-518
[Gang Hong. (2021). A Study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the Chinese Church and the Mission in China. Mission and Theology 53. 489-518]

- 홍진철. (2017). 개혁과제로서 미학적이고 한국적인 선교신학 방법론. 신학과 복음 3. 6-36
[Hong Jin-Cheul. (2017). aesthetic and Korean missional theological methodology as a reform task. THEOLOGY and GOSPEL 3. 6-36]
- 황규영. (2015). 한국성결교회와 중국선교. 성결교회와 신학 33. 68-81
[Hwang Kyu Young. (2015). Korean Holiness Church and Chinese Missionaryism. Evangelical Holiness Church and Theology 33. 68-81]
- 황수영. (2020). 2010년 이후 한국 대통령의 대중 인식에 관한 연구: 이명박·박근혜·문재인 대통령의 외교정책을 중심으로. 사회과학연구 28(1). 44-79
[Suyoung Hwang. (2020). A Study on the Korean President's Perception toward China since 2010: Focusing on the Foreign Policy of President Lee Myung-Bak, Park Geun-Hye, and Moon Jae-In. Social Science Studies 28(1). 44-79]

《英文》

- Bowen, Glenn (2009). Document Analysis a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Qualitative Research Journal. 9. 27-40.
- Frey, B (2018). The SAGE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Vols. 1-4).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7
- Hickman, A. W. (2014). Christianity's shift from the Global North to the Global South. Review & Expositor 111(1). 41-47
- Kang, W. J. (1990). Korean Minority Church-State Relation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ternational Bulletin of Missionary Research 14(2). 77-82
- Leung, B. (2005). China's religious freedom policy: The art of managing religious activity. The China Quarterly (184). 894-913.
- Rosenblum, K. (1987). The In-Depth Interview: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ability. Sociological Forum 2 (2). 388-400. Retrieved January 5, 2021

- Sarah Lee & Kevin J. O'Brien. (2021). Adapting in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Protestant Pastors and the Xi Jinping Effec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DOI: 10.1080/10670564.2021.1893556
- Ying, F. T. (2018). The Politics of Cross Demolition: A Religio-Political Analysis of the “Three Rectifications and One Demolition” Campaign in Zhejiang Province. *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5(1). 43-75.

三，報導

- (2007/12/19). 胡錦濤：要關心生活困難信教群眾培養教職人員隊伍. 《新華網》
- 정재용. (2008/4/3). 28년간 해외선교사 파송 160배 증가했다. 《*igoodnews*》
[Jung Jae-yong. (2008/4/3). 28年間海外傳教士的派遣人數增加了160倍. 《*Igoodnews*》] <http://www.igoodnews.net/news/articleView.html?idxno=19022>
- 백성호. (2009/7/9). 한국과 중국, 신학생 교류 시작한다. 《*중앙일보*》
[Baek Seong-ho. (2009/7/9). 韓國與中國，開始神學生交流. 《*中央日報*》] <https://www.joongang.co.kr/article/3679856#home>
- 천지우. (2012/11/18). 시진핑 시대 중국선교 변화는? 희망론 “개방된 인물들” —신중론 “통제, 세련되게 변할 뿐”. 《*국민일보*》
[Chen Ji woo. (2012/11/18). 習近平世代中國傳教的變化呢？希望輪——開放的政治人物，慎重輪——控制變得更老練， 《*國民日報*》] <https://news.kmib.co.kr/article/view.asp?arcid=0006639320>
- (2015/5/20). 「習近平出席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人民網*》 <http://pic.people.com.cn/BIG5/n/2015/0521/c1016-27032234.html>
- (2016/3/23). 「習近平出席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人民網*》 <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423/c1001-28299513.html>

- (2016/4/23). 習近平：全面提高形勢下宗教工作水平. 《新華網》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 Charlie Campbell. (2016/4/25). China's Leader Xi Jinping Reminds Party Members to Be 'Unyielding Marxist Atheists'. 《Time》 <https://time.com/4306179/china-religion-freedom-xi-jinping-muslim-christian-xinjiang-buddhist-tibet/>
- (2017/2/11). 中國驅逐32名韓國傳教士 皆因薩德之爭?. 《BBC NEWS 中文》. <https://www.bbc.com/zhongwen/trad/chinese-news-38944081>
- 이은혜 (2017/02/13), 중국 공안에 선교사 줄줄이 체포, 왜? 《뉴스앤조이》 [Lee Eun-hye. (2017/2/13). Chinese police arrested missionaries in a row. Why?] <https://www.newsjoy.or.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08849>
- 문혜성. (2017/3/15). ‘중국 사드 보복’선교에도 악영향. 《한국 성결신문》 [Moon Hye sung. (2017/3/15). China's retaliation against THAAD will also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missionary work. 《韓國聖潔新聞》] <http://www.kehcnews.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28691>
- 지성림. (2017/03/16). 한중 사드 갈등, 탈북자 한국행에도 불똥. 《연합뉴스》 [Ji Seong-rim]. (2017/3/16) South Korea-China THAAD conflict sparks fire even as North Korean defectors go to South Korea.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www.yna.co.kr/view/MYH20170316014000038>
- 王黎明, 杜海川. (2017/6/12). 這對把中國人帶到巴基斯坦傳教的韓國夫婦，還能神秘多久? 《環球網》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3oQa>
- 李軍、青木、曹思琦. (2017/6/16). 深度報導：熱衷傳教，何以成韓國標籤. 《環球時報》 <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K3wzK>
- 高峰. (2017/12/5). 紀念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委員會成立60週年紀念暨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閉幕詞. 《中國基督教網》 <https://www.ccctspm.org/cppccinfo/9685>
- (2017/12/5). 王作安局長在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成立60週年紀念會上

的講話. 《中國基督教網》. <https://www.ccctspm.org/cppccinfo/9684>

- (2018/3/22). 중국, 소수민족·종교 통제 강화한다...당 통일전선부 역할 확대. 《연합뉴스》
[(2018/3/22). China Strengthens Ethnic Minorities and Religious Control...Expanding the Role of the Party's Unification Front Department. 《Yonhap News Agency》]
- 진병태. (2018/5/30). 美, 중국을 '종교자유 특별 우려국' 또 지정..."교회에 CCTV 강제". 《연합뉴스》
[Jin Byeong Tae. (2018/5/30). 美國再次將中國指定為宗教自由特別關注國家，教會強制要求監控錄像. 《Yonhap News Agency》]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80530109800009>
- 江濤 (2018/8/26), 山東當局迫害韓國傳教士, 《BITTER WINTER(寒冬)》
[山東當局迫害韓國傳教士 - 紀實 \(bitterwinter.org\)](http://bitterwinter.org)
- (2018/11/13). 성경을 다시 기록하려는 중국의 계획. 《한국VOM (Voice of the Martyrs)》.
[(2018/11/13). China's Plan to Re-record the Bible. 《Korea VOM》. 檢査日: 2022.01.26
- 李明軒. (2019/7/19). 隨時被遣返韓國傳教士在中國處境愈發艱難. 《BITTER WINTER(寒冬)》 [在華韓國傳教士隨時遭抓捕遣返 警稱「外國人在中國講道犯法 - 新聞 \(bitterwinter.org\)](http://bitterwinter.org)
- 김용두. (2019/11/17). 2019 한중기독교교류회 열려. 《순복음가족신문》
[Kim Yongdoo. (2019/11/17). 2019 韓中基督教交流會召開. 《The Full Gospel Family Newspaper》]
<http://www2.fgnews.co.kr/html/2019/1117/19111712222018170000.htm>
- 김영권. (2019/12/23). 미 국무부, 북한 종교자유 특별 우려국 재지정. 《VOA》. 검색일: 2020년 4월 7일
[Kim Young Kwon. (2019/12/23). 美國國務院再次指定北韓為宗教自由特別關注

國家. 《VOA》] 檢査日：2020年4月7日 <https://www.voakorea.com/korea/korea-politics/5214902>

- 이지희. (2021/2/27). 2020년 한국교회 선교사 168개국 2만 2,259명. 《기독일보》. 검색일: 2021년6월 20일

[Lee Ji-hee. (2021/2/27). 2020年 韓國教會傳教士 168各國 2萬2,259名. 《基督日報》
<https://www.christiandaily.co.kr/news/100940>. 檢査日：2021年6月20日

- (2021/12/13). [百個瞬間說百年] 2001，“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提出，《新華網》
http://www.news.cn/politics/2021-12/13/c_1211475400.htm 檢査日：2022.05.18

- (2015/5/20). 「習近平出席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人民網》<http://pic.people.com.cn/BIG5/n/2015/0521/c1016-27032234.html>

- (2016/3/23). 「習近平出席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1/2016/0423/c1001-28299513.html>

- (2019/4/25). 遭認定「邪教」20年，中國現在還有人練法輪功嗎？《德國之聲》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1213089?page=1>

四， 網路文獻資料

- Eleanor Albert & Lindsay Maizland. (2020), Religion in China,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religion-china>

- 《宗教事務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9/07/content_5223282.htm

- 문석윤. (2019). 기독교의 대안: 중국은 어떤 종교를 필요로 하는가—중국 신학의 건설:1920년대 반기독교운동에 대한 중국교회의 대응. [웹진] 중국을 주제로 (통권 204호). 중국어문선교회

[Moon Seokyun, (2019), Alternative to Christianity: What Religion Does China Need?—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Theology: The Chinese Church's Response to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 in the 1920s, [Webzine] China to the Lord. Chinese Literary Church]

http://www.chinatogod.com/main/z2s_c_v.php?no=4414&ctg_no=204&div=2

- 정 암. (2019). 중국삼자교회의 형성과 발전. [웹진]중국을 주께로 (통권 207호). 중국어문선교회[Jeong Am. (2019).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Party Church in China. [Webzine] China to the Lord. Chinese Literary Church]
http://www.chinatogod.com/main/z2s_c_v.php?no=4482&ctg_no=207&div=2
- 江澤民的宗教政策“四句話” <http://tzb.xaut.edu.cn/info/1035/1046.htm> (檢査日：2021.12.29)
- 왕빈. (2017). 제2기 시진핑 체제 등장과 중국 교회의 길, [웹진] 중국을 주께로 (통권173). 중국어문선교회
[Wang Bin (2017). The Second Xi Jinping System and the Path to the Church of China. [Webzine] 173. China to the Lord. Chinese Literary Church]
http://www.chinatogod.com/main/z2s_c_v.php?no=3734&ctg_no=173&div=2
- USCIRF 2022 Annual Report. <https://www.uscirtf.gov/news-room/releases-statements/uscirtf-releases-2022-annual-report-recommendations-us-policy>
- 2020년 한국선교현황보고. KWMA
[2020年 韓國傳教現況報告, KWMA(The Korea World Missions Association).]
- 2018年 韓國宗教現況, 文化體育觀光部 (2018)
- 2019년 12월 한국 선교사 파송 현황, KWMA(The Korea World Mission Association) [2019年 12月 韓國傳教士派遣現況, KWMA]
- 한국인의 종교 1982-2021(1) 종교현황. 조사일: 2021/4/7. <한국갤럽갤럽리포트 >
[韓國人的宗教 1982-2021 (1) 宗教現況, 調查日: 2021/4/7, 《Gallup Korea》]
<https://www.gallup.co.kr/gallupdb/reportContent.asp?seqNo=1208>

-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http://www.gov.cn/guogqing/2018-03/22/content_5276318.htm

五， 大陸與兩岸情勢報告

- 王韻. (108年 1月). 中共「全國宗教局長會議」及近期管控宗教作為的觀察
台北：大陸委員會（陸委會）
- 王韻. (108年 5月). 近期中共宗教治理觀察. 台北：大陸委員會（陸委會）

六， 學位論文

- 김경진. (2015). 동북아시아 난민 네트워크와 비국가 행위자의 역할: 선교사와 탈북 브로커를 중심으로
[Kim Kyung Jin. (2015). East-Asia Refugee Network and the Role of Non-state Actors Focusing on Missionaries and North Korean Brokers]

《附錄》訪談提問

1. 您在中國傳教的時期幾年幾月到幾年？、在中國哪一個地方？
2. 您選擇中國作為傳教地理由是什麼？、去中國的契機是什麼？
3. 在宣教地工作的內容是什麼？
 - 1) 建立教會→ 有沒有與當地的三自教會及家庭教會聯合或矛盾？
 - 2) 福利→ 有沒有與地方政府合作或摩擦？
 - 3) 大學→ 初期學生的反應如何？ + 以後的結果呢？
4. 專業傳教士和非專業傳教士²⁷⁸的比例有差異嗎？ 這兩個範圍的人之間有沒有合作？
 - ；如果有的話，在哪些方面會出現合作？ 結果如何？
 - ；如果沒有的話，您認為需要這樣的合作嗎？
5. 當一位韓國傳教士，韓國的政治、社會狀況對中國傳教有影響嗎？特別是發生薩德事件、總統彈劾事件等政治事件時，感覺如何？ 另外，南北韓關係的變化也有影響嗎？
 - ；如果有的話，正面影響和消極影響中，哪個影響更大？ 有案例嗎？
 - ；如果沒有的話，韓國這個因素對傳教有什麼影響？
6. 中國人對韓國傳教士和其他國家的傳教士的態度如何？ 有差異嗎？
 - ；如果有的話，一般的原因是什麼？ 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 ；如果沒有的話，因為是韓國人，有更有利的地方嗎？ 或者有更不利的地方嗎？
7. 在中國傳教時，韓國的短期傳教團來了之後，情況有變化嗎？
由於積極變化或消極變化，中國政府機關是否出現過壓力或監督？
8. 根據韓國教派的不同，傳教方式有差異嗎？ 在中國傳教中，哪個教派或傳教團體最多？ 根據教派或團體，傳教士與中國地方/中央政府或三自教會之間

²⁷⁸ 專業傳教士: 專業傳教士是有傳教的使命，在某些特定領域或身份上以專家的形式，在其他文化圈傳遞福音的人。 只以傳教為目的，在其他文化圈內的傳教士被稱為專職傳教士。

的關係有變化嗎？

9. 去中國傳教時，初期定居時，與當地人及地方政府曾發生什麼困難嗎？怎樣解決問題？ 如果未解決的話，理由是什麼？
10. 在中國宣教時，有與當地三自教會合作的經驗嗎？
 - ；如果有的話，在哪些方面進行了合作？ 結果如何？
 - ；如果沒有的話，不合作的理由是什麼？ 跟政府的有關係嗎？
11. 習近平上台初期，在韓國的基督教界對中國傳教預測持樂觀論。²⁷⁹ 若當時您在中國，有沒有因為這樣的領導人變化而產生直接的感受？
 - ；如果有的話，你最大的經驗是什麼？
 - ；如果沒有的話，理由是什麼？
12. 習近平執政初期，在傳教地方的教會或傳教士們之間，有沒有“對宗教政策如何”相關的消息嗎？
 - ；如果有的話，消息的來源在哪？
13. 您的傳教初期與習近平執政開始後，感受最大的變化是什麼？
 - ；如果有的話，你感受最深的是什麼？
14. 在適用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後，有沒有首先出現的變化？ 或者有傳教士自己經歷的變化嗎？
 - ；如果有的話，是什麼樣的？您覺得那種變化的原因是，與政策的改變相關嗎？
 - ；如果沒有的話，與政策適用前沒有什麼區別嗎？
15. 聽說，中國的宗教政策根據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傳教士所在的地區如何？根據領導人的程度不同？還是相似？管理宗教的體制與體系如何？
 - ；如果您去其他地區，與其他地區相比，哪些部分更強，哪些部分更鬆散或更靈活？

²⁷⁹ Chen Ji woo, 習近平世代中國傳教的變化呢？希望輪——開放的政治任務，慎重輪——控制變更老練，國民日報，2012.11.18, 探索日：2021.01.12

16. 聽說年一次，政府發表有關教會的條例與相關的法令？這些法令或條例，傳教士所在的地區是如何適用？然後對這些條例，傳教士的反應如何？
17. 中國官方通知您需要離開的原因是什麼？是自願的還是非自願的？
18. 您從中國出來後，是否知道現在中國的教會或信徒的情況？若您知道的話，現在他們情況如何？
19. 來臺灣的理由是什麼？您認為臺灣教會今後在中國傳教方面會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